

HUANGPU

黄埔

黄埔军校同学会主办

| 为黄埔同学立言 为祖国统一尽力 |

双月刊 总第 219 期

2024.

6

先母胡严淑铭的黄埔情缘

哈军工创建和发展中的黄埔军校学员

“黄埔军官学校”校名之佐证

创建黄埔军校

陸軍官學校



目录

特别策划

创建黄埔军校 / 贾晓明

- 4 决定创建军校
 - 8 选址黄埔岛
 - 13 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
 - 16 选拔军校教官、干部
 - 21 到黄埔去!
 - 26 师生进入黄埔军校
-

时政

两岸时评

- 29 台湾岛内出现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原因探析 / 彭韬

两岸纵横

- 31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4 年 8—9 月 / 吴亚明

军事天地

- 36 军工解码: 现代战争中战斗机的常用战术(上) / 石稼

情系黄埔

- 43 发扬黄埔精神, 为促进祖国统一发挥黄埔人的独特作用
—— 参加纪念黄埔百年活动有感 / 陈蔚东
-

人物

人物春秋

- 48 和平将军张治中(下) / 张静生

我的黄埔前辈

- 53 先母胡严淑铭的黄埔情缘 / 胡葆琳
- 57 殷殷之情皆源家风 寸寸丹心皆为家国
——忆我的父亲孙白琳 / 孙华嵘 孙华岑
-

历史

黄埔往事

- 61 从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到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傅正模求学历程 / 傅克刚 傅小平

黄埔研究

- 69 哈军工创建和发展中的黄埔军校学员 / 李世辉

黄埔收藏

- 75 “黄埔军官学校”校名之佐证 / 单补生

黄埔日历

- 82 1926年6月5日,燕塘检阅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部
第一、第二团 / 贾晓明
-

文化

锦绣中华

- 86 红土圣地黄埔缘
——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办学地江西省瑞金市 / 谢周逢 方亮

黄埔连载

- 92 你不知道的台湾: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二十一) / 熊子杰



创建黄埔军校

□ 贾晓明

百年前，黄埔军校甫一创立，便受到国人瞩目。作为中国近现代最为著名的军事学校，它的存在就如美国的西点、苏联的伏龙芝和法国的圣西尔，它秉持孙中山先生“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之理念，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时至今日，这所军校的影响依然存在，关于它创建的故事依然被世人所乐道。

本期“特别策划”便聚焦黄埔军校的创建，对军校之筹备作较为详细的解说。文章并非以时间为序的事件罗列，而是选取关乎建校的几个关键点，讲述孙中山先生于何时、何地、如何决策建立军校，讲述中国共产党参与筹建军校，讲述军校筹备委员会从保定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选拔教官，讲述选址黄埔岛等，通过关键点搭起黄埔建校之脉络。在对建校历史的梳理中，可见当时中国各方力量对黄埔建校的支持。这体现出当时的中国对以革命救中国、以革命之军队促统一的企盼。

在纪念黄埔军校建校百年之际，“特别策划”刊发6篇文章，意在回望百年峥嵘，钩沉历史、对照现实，始终不忘黄埔建校之初衷，不忘两岸黄埔人共同的革命记忆，不忘黄埔军校创建人孙中山先生所期许的“统一是中国全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是受害。”

决定创建军校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孙中山已经开始了筹建新型军校的准备工作。他通过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认识到只有创造革命军，才有革命事业的成功，遂决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的苏维埃组织、军队和教育组织等经验，并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必须建立一个军事学院，为革命奠定武装基础”的建议。

1923年5月，苏联政府通过越飞电告孙中山，提出苏联政府为帮助孙中山建设军队，同意援助200万金卢布（以一年为期分次付款），每次5万金卢布，同时还准备提供包括“8000支日本式步枪，15挺机枪，4门奥利萨卡炮和2辆装甲车”的军事援助。但苏方希望孙中山用这批“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学校”，“而非野战部队”，这也直接促使孙中山决心“先建军校，再建党军”。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

经过多次沟通，孙中山决



/ 马林。

定派出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并商讨建立军校事宜，代表团负责人为蒋介石。因为国民党同苏联的关系还没有正式公开，所以1923年8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以《蒋介石又有欧洲之行》为题报道：蒋介石“拟分赴欧洲各国，从事主义宣传”。8月5日，蒋介石奉孙中山指示到上海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商谈。

代表团以蒋介石为首席代表（实为团长），其他3位代表分别为张太雷（此前先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沈定一和王登云。



/ 鲍罗廷。



/ 张太雷。

代表团出发前，孙中山写信给苏联领导人介绍蒋介石情

况，随后又向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去信告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的性质和任务——“将讨论我们的朋友靠什么方法和途径，能够对我在我国的工作给予帮助”，还称蒋介石是“我的总参谋长和最新可信赖的代表，（他）已被授予全权，可以用我的名义进行工作”。

1923年8月16日，代表团一行乘“神田丸”轮船自上海出发，由大连进入东北地区，然后乘西伯利亚铁路列车前往莫斯科。9月2日，一行人到达莫斯科火车站，有苏联外交官员迎接。

7日上午，代表团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鲁祖塔克会晤，全程2个多小时。鲁祖塔克提议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讨论如何协调国民党同俄共中央的共同合作行动，建议最好有一名国民党代表常驻莫斯科。代表团一行拜访了维经斯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此前双方就认识），相谈甚欢。当天下午，又拜访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并向斯克良斯基提出下列请求：“一、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



/ 孙中山宴请切列潘诺夫等苏联军事顾问。

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苏联）红军编练中国军队，派去的人愈多愈好；二、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孙中山代表提供方便，以考察红军；三、代表团请求共同商讨中国作战方案。”关于第一个问题，斯克良斯基答复说，已有波里亚克、格尔曼、切列潘诺夫、捷列沙托夫和斯莫连采夫等人于当年夏天奉命前往广州，“要视派去的同志在南方军队中发挥作用如何，再作决定”。关于了解苏联红军的问题，苏联军事学校管理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向代表团介绍了有关苏联红军的情况。

在莫斯科期间，代表团

成员与马林进行了会谈，商议党事，多次拜会苏联红军领导人托洛茨基、彼得罗夫斯基等，先后参观了苏联红军和各军事学校，对其政治教育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详细了解到“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学习他们先进的建军经验，并商谈了双方军事合作问题，双方对于在中国南方创办军校一事“详加研究，得若干红军将领之助，乃制定设立军官学校之计划”。代表团还邀请苏联派遣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赴华帮助开展工作，并协商了“在库伦以南邻近蒙中边界组建国民党军队的问题”。

关于苏联帮助国民党开办

军校的事宜，斯克良斯基答复：“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没有多少了解中国并且懂得汉语的干部……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俄国为中国人成立专门的军事学校。”双方经过交换意见达成协议：一、在俄国境内为中国学员开办军校，此事应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协商。二、开办两所军校，一为高等军校，培养不低于营级的指挥人员，招收具有一定俄语知识的人，约30名，地点在莫斯科或彼得格勒；另一所在中国，为培养中等人才的军校，在靠近中国的伊尔库茨克或海参崴，可招收多少经过军事训练的人500名。（此后，孙中山派代表与在北京的苏俄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商定，将军校校址定在广州）斯克良斯基还提出：可以允许“中国同志”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参谋部学院可以接受3—7人，军事学校可以接受30—50人。“不过，在选派到俄国来的同志时，必须遵循以下条件：首先必须是那些完全忠于党、经过仔细挑选的人。这一点特别重要。已有军龄、不低于团级或营级的指挥员，可以派到苏联的学院学习。派往军事学校学习的也需要有一定的军事素养。”



/ 国民党“一大”会场。

代表团还与军事人民委员、“红军之父”托洛茨基举行了一次长谈。当晚，代表团即向齐采林辞行。

11月29日，除了张太雷留在莫斯科，“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提前回国。12月8日，代表团返回上海。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去广州作详细汇报，而是匆匆忙忙乘船赶回浙江溪口，拜祭去世的母亲。在此期间，孙中山致电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屡次电函蒋介石邀其赴粤报告访苏的情况，但蒋介石多方推脱拖延。之后，蒋介石在奉化时将其所

写的《游俄报告书》寄给了孙中山。

后经孙中山、廖仲恺、张静江等多次来电催促，蒋介石才于1924年1月16日抵达广州，并列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他向孙中山口头报告了访苏情形。

确定建校方案

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国民党恳亲会上提出建立陆军讲武堂的建议；11日，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党务会的演说中又再次强调“党之基础”全“在于军队”，认为应“效法俄人”“以党治国”和“速建党军”。15日，中国国民党党务讨论会

研究了建立军官学校的问题，通过了“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拥护共和”的提案（一说会议提议孙中山亲任校长）。19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决议“先招有军事学识党人约十数人，日间为学生讲习军事学及党义，夜间教练义勇军”。此后，孙中山主持召开了数次会议，对创建军校问题进行论证。11月13日，因陈炯明叛军进犯广州，苏联顾问鲍罗廷建议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建立义勇军（或称志愿师）。此后不久，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议定成立义勇军学校，决定把陆军讲武堂改为“国民军军官学校”，为即将建立的“党军”培养初级军官，以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因蒋介石正在苏联访问考察，所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委托廖仲恺暂时负责筹备创建军校事宜。11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做出如下决定：“一、军校名称定为‘国民军军官学校’；二、蒋介石为校长；三、陈翰誉为教练长；四、廖仲恺为政治部主

任；五、廖仲恺负责军校筹备工作；六、校址定为东山。”12月，廖仲恺受命与孙中山聘请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共商军校人员配备诸事宜，着手开展创办“国民军军官学校”的一些筹备工作。

1924年1月23日，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明确了建立“党军”的思想，提出“党之基础……在于军队”的主张。1月24日，孙中山指定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8日，孙中山亲自确定以黄埔岛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旧址为陆军军官军校校址。

据研究，建立军校尚处于讨论时期，有人提出校名定为“讲武堂”“国民军军官学校”。据黄埔军校1期生宋希濂回忆，当时军校的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但另据黄埔军校1期生李奇中回忆：“学校名称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后来蒋介石说到这个学校的名称时总是说成‘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大概是在企图肯定这个学校是属于国民党而不属于共产党也不是国共两党共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本质和发展。”1924年3月，军校筹委会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陆军军官学校筹备

处布告》，用的是“陆军军官学校”校名。“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名在1925年2月军校出师东征使用。第一次东征时向老百姓散发的《告东江人民书》里，最后的署名“中国国民党党立”字样“应是校长蒋介石所加”。1925年6月23日为沙基惨案发表的军校通电，署名“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而1926年2月军校为援助省港罢工发表的《慰问罢工工友公开信》，仍署名“陆军军官学校”。因此有学者表明：1925年至1926年间，“这两个校名是并行使用的”。到了1926年3月，陆军军官学校扩大改组，黄埔军校校名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8年5月，位于黄埔岛的黄埔军校由副校长李济深决定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9月10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给该校加入“黄埔”二字，称该校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1930年9月，广州的黄埔军校停办，北迁南京，与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合并。1946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恢复1924年军校成立之初的校名，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



选址黄埔岛

1924年1月28日，经孙中山亲自选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长洲岛。长洲岛是珠江的江中之岛，岛上陆地面积大约为8.5平方公里，岛上地形以丘陵和冲积平原为主，中北部为丘陵，其余为平原，最高点海拔不足百米。岛上植被繁茂，河流密布，宋代就有居民在此繁衍生息。

明代时，长洲岛上就有船舶修理厂。清康熙年间开海禁，设立了粤海关。清政府规定广州为对外贸易唯一口岸，粤海关就在长洲岛上的黄埔村设立了黄埔挂号口（黄埔海关的前身），对进出船舶进行查抄、征税，行使海关的职能，掌管中外商船出入黄埔的货物装卸、过驳等事宜。长洲岛周围水域是当时外来船只的停泊地，是黄埔挂号口税吏兵丁们的作业区域。所有外来船只的维修都集中在长洲岛上的船坞。

长洲岛南连虎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鸦片战争时期，虎门炮台是守卫广州的第一道防线，而长洲岛上修建的白鹤

岗、大坡地等7座炮台组成的长洲要塞就成为守卫广州的第二道防线。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黄埔地区的人民就非常支持禁烟运动，协助官军收缴了近两万箱鸦片送往虎门销毁。鸦片战争期间，黄埔乌涌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力抗击英军侵略，后世称为“乌涌战役”。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曾要求清政府割让长洲岛，由于番禺十三乡居民强烈抗议才没有得逞，英国人继而强迫割让香港岛。1845年，苏格兰人约翰·柯拜修建了黄埔船坞。后来，清同治年间，粤海关黄埔分关黄埔挂号口迁到长洲岛北岸，仍用“黄埔”旧名。久而久之，长洲岛就被人们称为“黄埔岛”。

清咸丰年间，黄埔挂号口改建为黄埔分关。岛上的要塞建于1870年。直到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时，岛上还保留着当年保卫海岸用过的大炮。黄埔分关建成后，国内外商贾云集，交流密切，不少外国商人

和水手在岛上居住，对外贸易十分活跃，还有外国人在这里创办实业，发展经济，例如开办船舶制造厂、修理厂等，长洲岛迅速繁荣起来，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的产业工人。

黄埔岛上曾建有多所军校。1880年，两广总督张树声用刘坤一赠款在黄埔创办广东西学馆（另有一说是，1876年两广总督刘坤一花费白银8万两开办了广东西学馆）。西学馆自1881年1月动工兴建，1882年1月竣工，“计前后楼房4进，左右住房22间，更楼、厨房、茶房、俗房、厕所俱备”，“其规模程式，兼用中西”。张树声仔细斟酌核定了学馆章程，委任丁忧在籍的翰林院编修廖廷相为学馆总办，从福州船政学堂及各处选调了精通外语和算术者充当教习，同时还与驻英公使曾纪泽联系，请他代为物色聘请“精通驾驶、饶有才略之人”赴粤担任学馆洋教习。1882年开学时，又更名为广东实学馆，旨在培养军事科技人员。实学馆



/ 1996年，广州市人民政府按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原位、原面貌、原尺度”原则，重建已毁的黄埔军校校本部。

分制造与驾驶两科，学习内容除中文、英文、算术（包括代数、几何、三角、测量）外，制造科学生学习重学、微积分、化学、格致、汽机、造船、造炮等，驾驶科学生学习航海诸法、天文、船艺等，5年为期，首届招生50名，是为广东海防教育的发端。

1884年7月，张之洞接替张树声任两广总督，把学校改名为广东博学馆。张之洞认为：“到外洋诸国于水陆两军皆立专学。近年天津福州皆设水师学

堂，而天津兼设武备学堂以练陆师。广东南洋首冲，较他省为尤急。”可见张之洞倡办广东水陆师学堂，是总结了中法战争教训，认为广东为国家南大门，位置十分重要，天津、福州都有水师学堂，天津还有武备学堂，广东更应该创办水陆师学堂。同年，设广州黄埔鱼雷局，1886年附设鱼雷学堂，培养鱼雷艇官弁，共办5届，招生数十人，及格毕业生19人。1887年8月3日，张之洞在博学馆原址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

这是中国最早的两所军事学堂之一。除了黄埔船坞，张之洞又在岛上征地47亩，用去白银约5000两，建造校舍和机器厂、铸铁厂、储料场、打铁厂、工匠房、操场、演武厅以及码头、石堤等设施，之后又新建了一座制造管轮的机器厂。

广东水陆师学堂分为水师和陆师两部，新学堂建成后，八卦山以东的旧堂舍专居陆师学生，称陆师诵堂；八卦山以西的新校舍住水师驾驶、管轮专业的学生，称为水师诵堂。整

个校舍分为水师讲堂、水师操场、陆师诵堂、陆师操场、陆师马步炮操场五部分。水师学生学习英语，设管轮、驾驶两专业。管轮专业学生学习机轮理法、制造运用；驾驶专业学生学习天文、海道、驾驶、攻战之法。陆师则学习德文，设马步、枪炮、营造三个专业，开设海道、驾驶、攻战等课程。创办之初，水师、陆师各招学生70人，后来水师的管轮、驾驶各招70人，共有学生210人，学制3年。

1889年11月，学堂又增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等五所西艺学堂。学堂总办为吴仲翔，后为魏瀚。因当时学堂认为英国海军最先进，德国陆军最先进，提出“水师学英国，陆师学德国”，聘请英国人李家孜为水师教习，德国人欧披次为陆师教习。詹天佑也担任过该校教习。学生每年9个月在学堂学习，3个月在兵舰或兵营实习。水师学员毕业后，需到兵舰实习1年，后延至3年。学员除了在广东招生，还招收福建船政学堂及天津的武弁和文童。广东水陆师学堂的学生来源分为三部分：一是“内学生”，从“博物馆旧生”中挑选30名；二是“营学生”，从军

营武弁中挑选20名；三是“外学生”，招收16到30岁文生20名。

张之洞认为这样的搭配可以发挥互补作用。“内学生”的文化水平较高，缺乏实践经验；“营学生”有实践经验，但文化知识欠缺，他们在一起学习，便可以互相取长补短。“营学生”与“外学生”年龄较大，学习外语有一定困难。张之洞考虑到这一点，除了请外籍外语教师，又聘请翻译一名，在课堂“转相解授”。有论者指出，广东水陆师学堂的创办，不但是广东官办学堂之始，还开了广东近代军事教育的先河。

1893年，两广总督李瀚章将广东水陆师学堂中水师、陆师分开办理，陆师诵堂停办，水师诵堂则改为广东黄埔水师学堂。黄埔水师学堂规制、课程仿照马尾、天津水师学堂成法，并根据广东实际情况，略作变通，设管轮、驾驶两专业，学制3年。

1904年，总办魏瀚将黄埔水雷局附属鱼雷班并入广东黄埔水师学堂，增设鱼雷生名额40名，并改称广东水师鱼雷学堂。学生除了学习驾驶，兼学管轮、鱼雷课。这是中国海军早期航轮兼宜制度的尝试。

1906年，魏瀚在水师鱼雷学堂同一校舍办海军工业学堂，改校名为广东水师工业学堂。1912年后，收归海军部管理，学堂改组，广东水师工业学堂的学生归并于水师，广东水师工业学堂改名为广东海军学校。广东海军学校以肖宝珩为校长，学生定额130名，以“实施海军教育，养成海军人才”为教学宗旨，并定出校训四条：爱国、服从、名誉、乐群。修订学制：预科、本科各修3年，共12个学期毕业。预科开设课目：算术、代数、几何、量积、平面三角、物理、化学、英文、国文、历史、地理、绘图、操练、舢板、游泳等。本科学习课程：弧三角、航海、天文、微积分、解析几何、高等代数、运用术、炮术、轮机、水鱼雷等。在此期间，孙中山曾到黄埔对海军学生讲话，训勉大家要爱国、振兴海军。直至1921年12月，该校因经费原因暂时停办，招生至第18期。黄埔水师学堂自开办起，共毕业驾驶班学生10名、管轮班学生198名。其第八至第十届驾驶班学生均前往北洋海军练习。

1902年，广东武备学堂（广东陆军中学堂）在广东黄埔水陆师学堂旧址成立，总办魏

瀚，下设总教习、教习和助教，聘日本校尉官担任教习、助教。所招学生多属武秀才或文人出身，如李济深、姚雨平、黄任寰、张我权、张醜村等人。该校共办两期。第1期送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有31人，第2期学生约有100人。1906年改称广东陆军中学堂，将武备学堂第2期学生改为中学堂学生。

1905年5月，广东陆军小学堂成立，校址位于黄埔岛平岗武备学堂旧址。清末，清政府改革陆军学堂制度，仿效德国、日本将军校分为小学、中学、军官3级制。小学以高小毕业生或初中一年级学生为对象，授以最基本的军事课程。广东陆军小学堂总办虞汝钧（后韦汝聪、黄土龙），下设监督、提调、文案、司事、司书等8人，教员设普通教员、兵学教员、音乐教员及官语（国语）、英语、德语、日语教员等共25人。从1905年至1910年，广东陆军小学堂共招收5期学生，480人，学制3至4年。毕业后即升入陆军中学堂。毕业生中，有邓演达、陈铭枢、蒋光鼐、张云逸、陈济棠等人。

1906年，清政府为编练新军培养初级军官，令广东成立

陆军速成学堂。于是，位于黄埔的广东陆军中学堂与两广总督岑春煊于1904年创办的广东随营将弁学堂合并，改称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校址迁至广州大东门外北横街，总办韦汝聪。陆军中学堂生编为第1区队，将弁学堂生编为第2区队，均属步科；另招收部分新生编成炮、工、辎重三科。共办两期，学制均为一年，第1期学生400名，于1907年6月毕业，毕业生李济深、陈章甫等人被选送保定军官学校深造，其余则分配到广东新军的学兵营及第一、二标（相当于团）任初级军官。第2期生300人，分编步、炮、工、辎四队，于1909年5月毕业，毕业生除11人送保定军官学校深造外，其余均分派到广东新军各标营任初级军官。教学内容：战术学、野外战术实施、军制学、地形学、筑城交通学、兵器学、数学、国文、操练、技术、品行；炮兵、工兵、辎重兵增加马学。

1909年6月，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改称广东陆军讲武堂，其编制分上级、下级两等，每级讲堂又分甲、乙两班。上级学员为陆军中职以上者，其中能听懂外语讲课者为甲班，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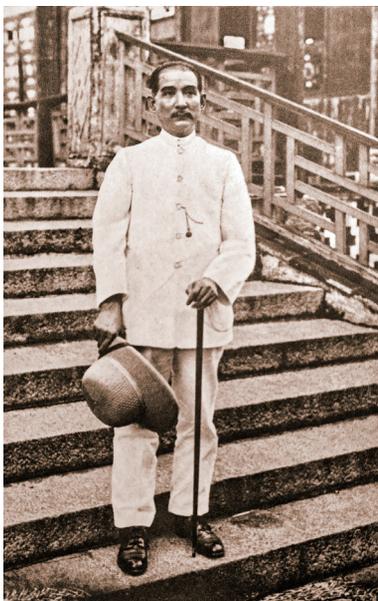
懂外语者为乙班；下级学员为陆军中职以下者，分批调集入堂学习，程度较高者为甲班，程度较低需补习者为乙班。初开办时，因广东新军仅有一个混成协，陆军中等职级以上军官为数不多，上级学员先未分班，后又改分班学习。一班毕业，再办一班。下级学员甲班，从督队官到事务长共约200名，分3期集训，第1期4个月；乙班40名，修业期半年。广东讲武堂总办为韦汝聪，下设正副监督各1人，提调1人，总教官、副教官、分教官、各科教练员、助教官等17人，文员、物资保障人员和勤杂人员112人。至军阀龙济光据广东时下令停办。

1906年5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大东门外北横街批准设立了广东陆军测绘学堂。该学堂隶属两广督练公所参謀处，总办罗照沧，有教员20人。学堂设测绘简易科，分高等和寻常两个班。寻常班半年毕业，高等班1年毕业。后学制改为2年。第1期招生60人，于同年9月开学。共办5期（其中第4、5期合并），学生300人。此外，岑春煊还于1905年9月在广州北较场创办广东军医学堂，附设随营病院，后将随营病院

院改为陆军军医局。1909年，又成立了施诊所、医兵学习所和兵事研究所等机构。

1912年后，广东都督胡汉民将黄埔岛上的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易名陆军速成学校。陆军速成学校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个科，报考条件是中学毕业或相当程度学历、身体健康的18岁以上25岁以下男青年。后因学生增加，操练场地狭小，于是从黄埔岛迁到广州东门北横街。不久，二次革命爆发，陆军速成学校学生多参加反袁军事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该校学生各奔前程，自寻出路。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时，不少速成学校的毕业生加入粤军。

孙中山对黄埔岛非常熟悉，黄埔军校建立前，曾多次登上黄埔岛。孙中山曾经在长洲黄埔公园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护法战争期间，孙中山最为倚重的军事力量——海军护法舰队就停泊在长洲岛，著名的永丰舰（中山舰）就在其中；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曾率领海军驻扎在黄埔，指挥平叛。当时，孙中山平叛的军事作战方针是依靠海军力量坚守黄埔，命令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他曾在永丰舰召集舰队官兵，发表演



/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



/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里的孙中山纪念碑。

说，决心“由舰队先发炮，攻击在省叛军，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在”，然后“还驻黄埔，以候北伐诸军之旋师来

援，水陆并进，以歼叛军”。孙中山亲率各舰由黄埔出动，炮击珠江沿岸叛军，但由于没有可靠的陆军配合，炮击行动不足以取得成效，舰队随即退回黄埔，与长洲要塞成犄角之势，与叛军相持。坚持数日，海军某些首领发生动摇，孙中山依然坚持“设行营于黄埔，专待北伐大军之回戈”的决策。另一方面，他说服海军坚守黄埔。7月9日，叛军占领长洲炮台，为避炮击，孙中山率舰队移泊新造河面。

1923年10月，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程潜在黄埔岛建立中央陆军教导团，驻扎在黄埔岛前广东陆军速成学校的营房里，以培养军队基层骨干。

当时，陆军军官学校的创办已提上日程，但还没有将校址定在黄埔。很多人主张，当时驻在广东的各派军事力量都办有自己的军事干部学校，完全可以在这些军校中选择一个加以扩充，不必重新建立。孙中山最初考虑把校址选在广州“测绘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医院”，为此“还形成了正式文件”。但到了1924年1月28日，孙中山决定把黄埔岛作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

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

1924年2月1日，孙中山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等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军校筹备委员会正式办公，推进各项具体筹备工作。其间，苏联军事顾问小组也对军校筹办给予了热情的指导与帮助。2月3日，国民党中央任命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

1924年2月7日，军校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2月8日，筹备委员会在广州市南堤设立筹备处，其下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五个部门，暂定王柏龄、李济深（由邓演达代理）、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为各部主任，分管各部筹建。

从2月8日至5月9日，陆军军官学校筹委会前后召开了32次会议，明确了办学宗旨为“本校希望对于军队有彻底的改良进步，故拟使全国热心有志堪以造就之青年，得有研求军

陸軍軍官學校考試委員會啟事
本會奉 帥令組織執行定章規定之職
權所有考試及審查方法一以公正無私
細密謹嚴之旨行之以期選拔優才無負
重托而連日以來本會各職員接獲各方
同志友好推舉要錄之函件甚多稍有徇
私不特無以示大公亦違本會組織之本
旨與五權憲法中考試權獨立之精神相
抵輒貽弊滋多尙祈信仰主義各守規律
之各同志友好深予體諒不勝厚幸特白

/ 1924年4月7日，黄埔军校考试委员会在《广州国民日报》刊登的招生启事（部分）。

事学术之机会，并教以三民主义，俾养成良好有主义之军人，以为党军之下级干部”，并研究讨论了军校的各种规章制度、教练计划、教职员的甄选、学生的招考以及修建校舍等各项事宜，制订第1期的教学计划，决定全校师生必须加入国民党，选定服装和教育书籍式样、种类及购置办法等。在学校筹备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托列席了会议，他说：“创办本党军官学校事，近日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代表大会

上获一致通过。这次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各项政策，决议在苏俄帮助下，接受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本党共同奋斗……同志们，中国共产党之加入本党，与本党携手联合奋斗，这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上，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我们所期望的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到了。在这个高潮中，本党军官学校的筹办，将是涌于潮头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朵浪花，它将更有力、更迅速地推动这个潮头澎湃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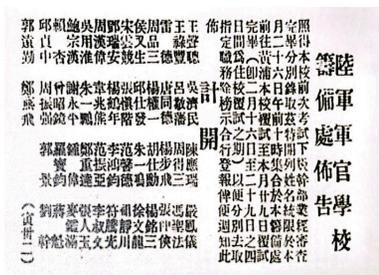
修缮校舍

2月14日，管理部主任林振雄率士兵和工匠入驻黄埔岛，对校舍、教学场地、道路进行修缮整理，工程历时两个多月。蒋介石聘请建筑设计师郑校之（当时称“画测师”，曾担任过大元帅府参军处技师）为筹备员，带多数办事人员同往黄埔校址勘验，校内工程“概归郑校之担任”。4月17日，校舍基本修缮完毕，校园内建筑焕

然一新，道路也变得平坦整洁。“以前蛇鼠丛众之墟，一变而为跃马谈兵之地，于是弹丸孤岛之黄埔，遂为本党武力发祥之地矣。”经过修缮的军校校舍“内可容学生300余名”，但是教员及办事人员，仍要到前海军学校住宿，因此黄埔军校自开学之日起，就面临校舍紧张的问题。为解决校舍问题，军校曾在大操场四周临时用芦席搭成棚子作为校舍。此后，军校还陆续在长洲岛上及广州市内建设房舍，设立分驻地。短短3年间，校舍就从扯旗山下扩展到本岛的平岗炮台、蝴蝶岗炮台、大坡地炮台，以及珠江对岸的鱼珠炮台、沙路炮台和广州北较场、陈家祠、曾家祠、四标营以及虎门等地。1927年，学校修筑大俱乐部和动工兴建东征阵亡将士墓时，黄埔岛上的校舍格局才基本定型。

开展招生工作

由于军校筹备委员会7名委员之一的李济深还负责粤军第1师和西江讲武堂事务，工作繁忙，便呈请第1师第3团团团长邓演达代理负责军校筹备工作，得到孙中山的批准。随着招收、考试工作日益紧张，孙中山又任命邓演达为筹办黄



/ 1924年4月24日，《广州国民日报》刊载的筹备处布告。

埔军校入试委员会委员，“专司负责制定各种招考办法及各项具体考试事宜”。筹委会很快制定了《考选学生简章》：

一、本校为养成革命军干部军官，完成国民革命起见，特续招入伍生，施以军事预备教育。

二、入伍生期限6个月，期满后甄别及格者，升入本校为学生，修习军事学术，一年毕业。

三、投考者须于8月25日以前，持二寸半身相片3张，中学或与中学相当之学校毕业文凭，及党证或各地区党部之介绍书，分赴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本校驻省办事处”，上海“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报名（党证报名时验毕发还，文凭试毕发还）。

四、投考者之资格如下：
A. 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内。
B. 学历：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

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C. 身体：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疾、肺病、花柳病等疾患。D. 思想：中国国民党党员，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性，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有本党党员之介绍者。

五、试验之种类：A. 学历试验：按旧制中学修了之程度出题，求笔记之答案。B. 身体试验：准陆军体格检查之规定，分身长、肺量、体重、目力、听力等项。C. 性格试验：用口试法，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

六、在广州投考者，无论从何地来试，录取与否，均不发给川资；在上海、开封录取者，则给予川资来粤。

七、入队后，服装、书籍、食费、零用，概由本校供给。

八、本简章之外，关于试验手续、课目调制、成绩等，另有细则。

约在此时，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中级以上人员，只能依赖各方举荐，经考察后，凡革命意志较坚强者，多予任用；中下级干部则需要经过选考和培训。”蒋介石表示同意。军校



/ 黄埔军校校景。

筹委会于23日发布《陆军军官学校采用下级干部布告》，公开招考区、分队长等教官。10日，军校筹委会确定第1期招生324名，并给各省、各军分配了招生名额：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共50名；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每省12名，共168名；湘、粤、滇、豫、桂五军，各15名；本党先烈家属20名，尚余11名；另招备取生30至50名。

在军校筹备过程中，蒋介石突然于2月21日呈文辞去筹

委会委员长职务。廖仲恺虽然不是军校筹备委员，但他是大本营指定筹办军校事务的负责人。第二天，廖仲恺来到筹备处，明确表示：“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亲自要办的，是党要办的，不是某人的奇想。第一，军校肯定要办，不管蒋先生他来不来当校长，不管他个人意见如何，我们都要办。第二，你们许多同志都是蒋先生找来的，同蒋先生共事多年。君子爱人以德，你们要从大处爱他。他走了，我们照常办，照常开学，争取他能回来与我们共同工作，这才是道理。如果

党要办，蒋先生不办，或因此而致军校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开罪于天下。将来，他如果又想回来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大元帅让我转告各位，现在我们不但不能因蒋先生离去，有半点懈怠，而且，各项筹备工作还须进一步加快。”2月23日，孙中山正式委派廖仲恺代理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一面奉劝蒋介石复职，并派邓演达到上海劝告蒋介石，一面领导筹备工作继续进行。■

选拔军校教官、干部

黄埔军校对军事教官的招聘有严格的规定。1923年10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曾经为黄埔军校登报招聘军事教官，并列四个条件：国民党党员或志愿入党者；年龄在20岁到40岁间；在本国的陆军大学、军官学校毕业；能尽力，不受薪金。

当时主持筹备处的廖仲恺遵循国共合作原则，依靠筹备处中两党热心军校工作的邓演达、叶剑英、张申府等人，大

力延揽招纳有志人才，一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如严重、季方、何应钦、王柏龄、钱大钧、顾祝同、刘峙、陈继承等陆续来到军校任职。

军校筹备时期，各机构负责人都是国内各大著名军校如保定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且许多人有带兵经验和实践经验，是当时中国政界、军界的精英分子，还有从苏联和日本、欧洲等地招收的留学归国人员，其中不少是军事院

校、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军校的中上级干部（指区长以上的职务）系由各方举荐，经考察后任用，很多人都参与了军校的筹备工作。1924年6月21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刊载了孙中山的任命：林振雄为学校管理部主任，周骏彦为军需部主任，宋荣昌为军医部主任，梁广谦为上校教官，钱大钧、胡树森、陈继承、顾祝同、文素松、沈应时、严重为中校教官，邓演达为总队长，王俊、刘峙为少校教官，俞飞鹏为军需部副主任，张崧年为政治部副主任，张家瑞为中文秘书，吕梦熊、茅延楨、金佛庄、李伟章分别为第1、2、3、4队队长。

在国内军界具有传统影响力的保定军校毕业军人在黄埔军校教官中所占比例最高，居重要职务者也多。据学者统计，第1期到第3期军事教官中保定军校毕业的有69位，接近80%。在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的7名委员中，邓演达和沈应时两人为保定生；在军校入学考试委员会的9名委员中，有



/ 何应钦。



/ 严重。



/ 钱大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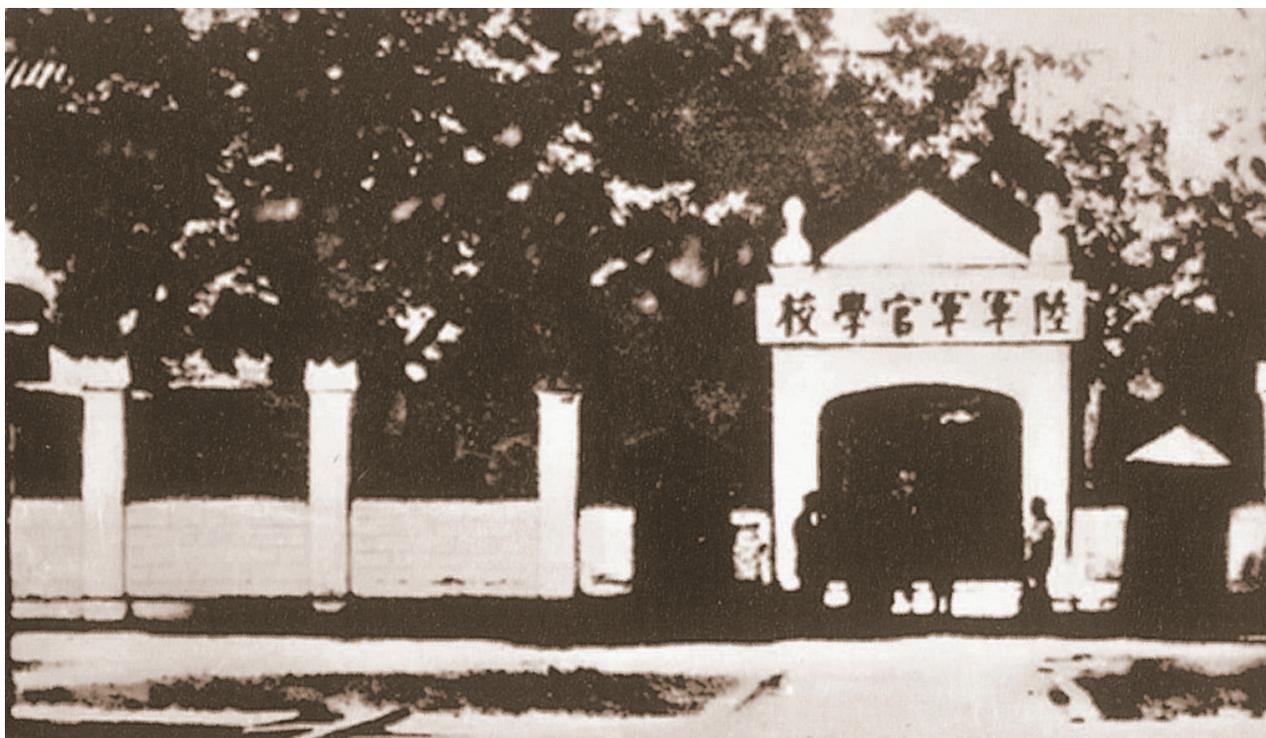
/ 季方。



/ 王俊。



/ 刘峙。



/ 军校大门。

邓演达、严重、胡树森、简作桢 4 人为保定生；在首届军校特别区党部的 5 名执行委员中，有陈复、金佛庄 2 人为保定生；军校首期学生总队正、副总队长均为保定生，分别为邓演达和严重。在第 1 期学生总队的 4 名队长中有 3 名是保定生，分别为金佛庄、吕梦熊、茅延桢；第 3 期学生总队总队长、总队副、代总队长分别为保定生王懋功、张治中。除担任军事教官和学生队长外，一些保定生还担负了校本部及下属各部、办、处的重要职务。如邓演达任教练部副主任和军校教育长，

严重任教授部主任，顾祝同任管理部主任，赵锦雯任管理处处长，钱大钧为军校参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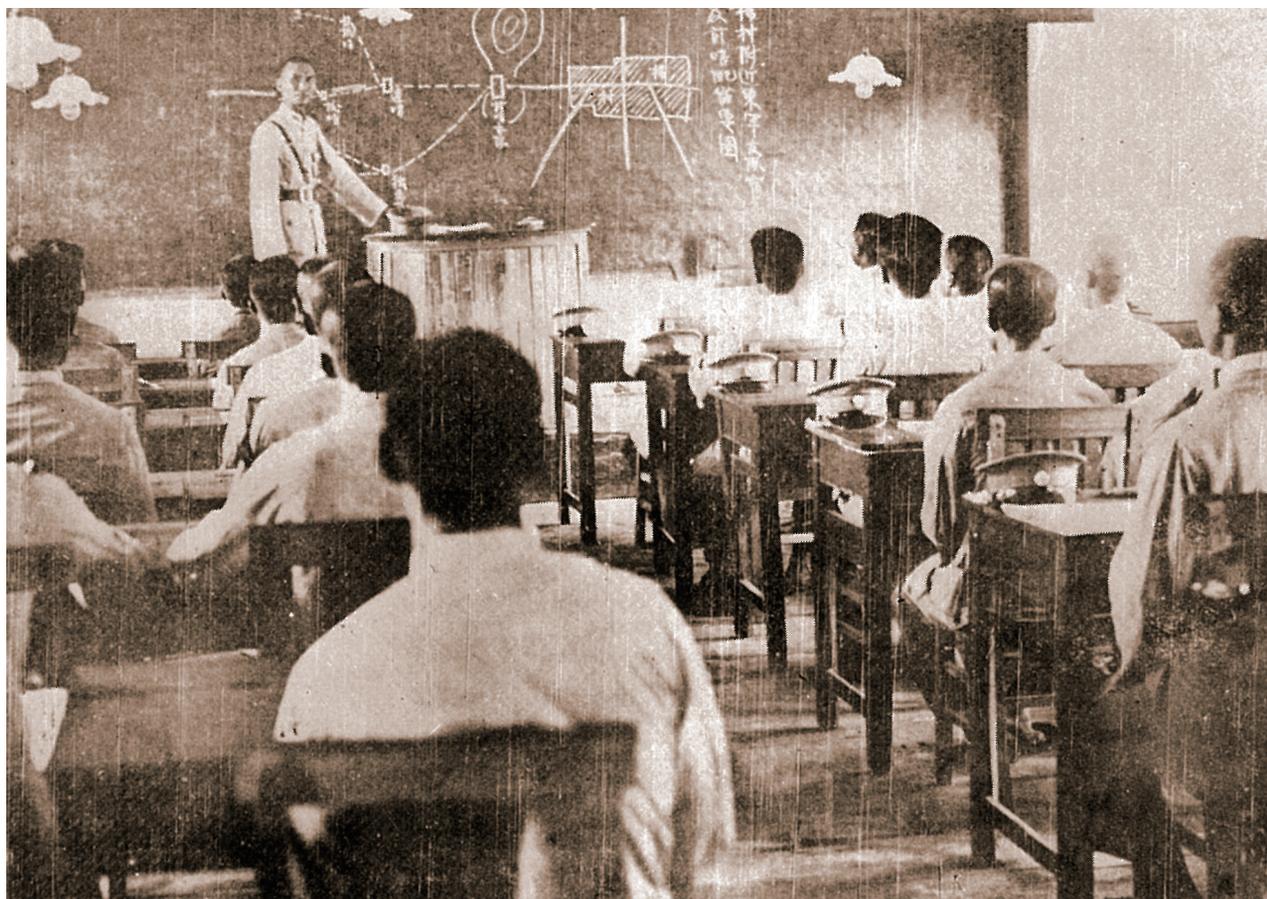
黄埔建校初期的教官中，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军人数量排第二，有 11 位，如何应钦、陈继承、缪斌、梁广谦等。

黄埔军校教官的另一个来源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始建于 1907 年，1909 年正式开学，1912 年改称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1924 年黄埔军校筹办时，调云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长王柏龄、工兵科长帅崇兴、步兵科长刘跃扬、骑兵科长林振雄及部分毕业生到

广东，协助创办黄埔军校。王柏龄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林振雄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管理部主任，帅崇兴、刘跃扬亦在黄埔军校任职。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中，叶剑英、徐成章、严凤仪、杨宁和崔庸登 5 人在 1924 年后成了黄埔军校的重要教官。

此外，还有来自陆军测量学校、南洋大学等院校的教官。这些教官不但有扎实的军事理论，而且有一定的带兵经验。

军校还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官。据宋希濂回忆：“除苏联教官外，军校还从日本聘请了两



/ 教官讲军事课。

三个日本陆军军士，专门教劈刺、投掷手榴弹等动作。这几个日本军士教练3个月左右就走了。至于战术、兵器、筑城、地形等教程，基本上都是采用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那一套。”

黄埔军校的区、分队长等下级干部先由各方举荐，填写履历表，然后加以面试、考核，再酌情录用。黄埔军校筹备期间，下级干部多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广东省警卫军讲武堂、

西江讲武堂和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等军校出身的毕业生中公开招考。

1924年2月19日，黄埔军校筹备处在《广州民国日报》登载《陆军军官学校招考下级干部布告》，声明“本校开创伊始，端赖贤才始臻完备，诚恐一方之见闻未周，有埋没贤豪之叹。特登报招考，凭才取录，以示大公”。规定“一，投考区队长之资格：甲、曾在保定军官学校及其他相当程度学校毕业

者；乙、年龄在30岁以下，体格强健，无不良嗜好，品性端正者。二，投考分队长之资格：甲、曾在军事学校毕业，或在军队服务（准尉军士）多年者；乙、品性纯正，年力强健，操练纯熟，文义粗通者。三，考取后入校服务之待遇：甲、区队长，阶级为中、少尉，中尉每月实薪72元，少尉54元，由校供给寝处；乙、分队长，阶级为上、中士，上士每月实薪20元，中士18元，其与学生共

同寝处，由校供给被服”。并说明凡有以上资格志愿者，“限于本月23日以前，投递简明履历于东堤2号洋楼本筹备处。再候定期试验，以为去取”。

3月24日，经过登报征召，军校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内举行下级干部初试。对投考资格的要求除了年龄、学历、身体条件，最为重要的条件是必须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对于国民党有同情而未入党者，暂时准许参加考试，一旦考取，必须后续加入国民党）。考试科目也很全面，包括国文、三民主义、算术、典范令、实兵指挥（单人教练、班教练）、身体检查6项。

当时，广州各军下级军官投效黄埔军校、以期发挥自身才能的热情很高。如蒋鼎文，1923年3月已任大元帅大本营兵站总监部上校参谋，得知黄埔军校招收干部后，毅然辞去兵站工作，不惜连降四级，出任黄埔军校第1期第2学生队区队长，不久任上尉军事教官。

对于下级干部的选拔，王柏龄、何应钦可谓“功不可没”。1923年4月，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育长职务达7年之久的王柏龄从云南来到广东，1924年1月，被孙中山任

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7位委员之一。王柏龄是军事科班出身，不但战斗经验丰富，又有多年的教学经验，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他撰写了兵器教程、军校章程和服务细则等教材和规章制度，主持课程编排、军装设计、枪械准备、制订教育计划等诸项工作，是黄埔军校教学“学科始创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教授部，差不多做了主体，一切计划、一切行事由它推动，人事、创作，都不能卸责不问……我至少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三四个月下来，人并不觉苦，内心的热忱，也并没有减低，真是精神振奋，身体就不成问题。”黄埔军校建立时，军事教官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王柏龄引荐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以及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

1923年，曾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务长的何应钦抵达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参议，因当时滇桂军器张跋扈，何应钦不久便离开广州前往上海。1924年2月，黄埔招生工作开始后，何应钦再次应王柏龄、蒋介石之



/ 何应钦的委任状。

邀到广州，参与军校筹备工作。何应钦到广州后，曾建议先选拔训练下级干部，然后再招生，“并主张用士官学校所学到的、在贵州讲武学校所实行过的那一套来考选和训练”，被蒋介石采纳。3月24日，举行下级干部考试，廖仲恺和蒋介石责成何应钦主持。面试由王柏龄、何应钦评分，遴选出四五十名合格者，再报校长蒋介石审定录取为军校第1期队官。随后，由何应钦负责对他们进行战术、应用战术、交通、兵器、筑城等强化训练，使他们不到一个月就掌握了一定的军事理论和一整套熟练的战术动作，在开学后能迅速承担起训练学生的任务。

4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刊载《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布告》：“照得本校前次考试下级干部，业经审查完毕，分别录

取。兹特开列姓名，统限于本月26日午前10时，集合于本筹备处前往黄埔本校复试，至本月29日复试完毕（即26日至29日之4日间为住校复试之期），以便分别去取指定职务。除榜示，合行登报，俾便周知。”4月25日，军校正式进驻黄埔岛，下级干部也随之进校。

黄埔军校开学后，继续“广纳贤才，充实师资”。1924年8月，黄埔军校鉴于教官不足，于26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再次刊登《陆军军官学校招考军官布告》，针对所需少校以下军官的现状，决定采用考试方法选拔。要求报考者毕业于军官学校及其他正式军事学校，并提供一份详细履历、毕业证书以及一张本人最近相片。

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教育长、代校长方鼎英回忆：

当时校内教职员，保定军官学校及云南陆军讲武堂出身的多，而留学的很少。蒋是留日陆军士官出身，故学校制度大都仿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旧框框，主要教职员上校以下级别的居多。我因建议要想教好学生，必须先有好先生。且今留学外国归来，稍有资望的差不多都是少将以上的地位。从前士官学校的校长



/ 方鼎英。

是少将，教育长是上校，今则教育长以上皆是中将级，甚至主任教官也是将级地位的居多，望今后用人尺度要放宽些。蒋采纳此议后，军校的规模逐步扩大，凡我们所希望要的人，差不多都乐意来就，并得到适当的安排，如黄慕松、张华辅、周斌诸人，皆留日陆军士官第4、5、6期同学，曾入日本陆大，且任过将级职务多年。与陆军士官学校第3期蔡锷同班的周仲玉等，都曾以中将级待遇罗致来校。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军校的政治工作很快打开局面，政治部专门聘请了萧楚女、恽代英、张秋人、高语罕、周逸群、韩麟符、许德珩等新文化运动中的名人或学术领域中的专家来校任教。如萧楚女有“青年运动

之师”的美称；高语罕因提倡白话文运动而在进步青年中名重一时，以至“只要提到他的大名，无论识与不识，都是敬重的”；恽代英在军校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很多学生在校前就在《新青年》上读过他的文章。这些教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具有极大的革命热忱，较高的理论修养，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深受学生的爱戴，被视为“军校的革命灵魂”。

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除设有专科军事教官外，还设有特别官佐（“候差军官”）。第1期的特别官佐有季方、陈诚、徐成章、徐坚、吴嵎、简作桢、刘宏宇、江志航、符腾光、严伯威、杨本烈、徐光武等人。对于一些特殊专业的老师，校方也会根据需要，临时公布资质条件招聘使用。例如，军校曾以大约100元的高薪聘请懂军乐及中外音乐的教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启事》刊载：“本校现需音乐教授数员，月薪以100元左右为度，如有音乐专门学校毕业，对于军乐及中西音乐均称谙熟，愿就斯职者，请即通函黄埔本校教育处，并附履历住址，以便择优聘请。”

到黄埔去！

孙中山十分关心招生工作，尤其关注学生的来源。在筹建过程中，廖仲恺根据孙中山的意见，特别强调：“请各代表对于介绍青年军官学生特别注意，必其人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选。”为了改变过去军阀在组建军队时强调封建地域观念的恶习，筹委会决定面向全国招生。但是，当时除广东以外，各地均为军阀所控制，无法公开招生。为此，筹委会委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代表，回到本省后秘密介绍各地进步青年到广州参加考试。

据统计，军校第1期总报考人数超过了2700人，是计划招生人数的3倍多。筹委会要求报考者须有“中学或中学相当之学校毕业文凭”，但由于多种原因，30%以上的报考者具备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学历，有从国外学习归来的留学生，有大学生，但也有的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甚至有的则连小学也没读过。在报考前，很多人已经从事各个行业的工作，大

多数是出身于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的家庭。从政治态度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信仰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抱着献身中国革命的理想，为革命而入军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则是其中的中坚和骨干。

按照军校筹委会的设计方案，报考者一般要经过三次考试，入学后还需再进行一次考核，通过四关才能获得1期生的资格。第一关为初试，即全国各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进行第一轮筛选；第二关为复试，即初试合格者再参加上海、重庆等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进行第二轮的淘汰；第三关为总试，即通过复试者由复试地区负责人提供旅费，并持证明书自行前往广州参加陆军军官本校安排的“终试”（另有总复试等说法），获得入学录取资格；第四关为甄别试，即相当于入学后的中期考查，不合格者将被饬令退学。

军校筹委会规定：“须取得省党部介绍信；其有无党派之革命青年愿往者，均可临时会

之加入K.M.T.（指国民党）前去（无省党部的地方，能有民校要人的介绍信亦可取入）。”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都很重视选调青年报考黄埔军校。由于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尚未建立党组织，必须依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党团组织担任招生工作。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代表，受军校筹委会的委托，会后立即在各省市积极开展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中共组织向各地发出通知，希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指中共党员）、少校同学（指共青团员）及民校（指国民党）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

由于除广州以外的其他各地均被北洋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军阀所控制，招生只能秘密进行，对报名者或就地考试，或动员青年直接到广州投考。如1期生侯镜如，他投考黄埔军校的时候，为逃避反动军阀的搜查，将介绍信写在白布上，缝在衣服里面，花了5天5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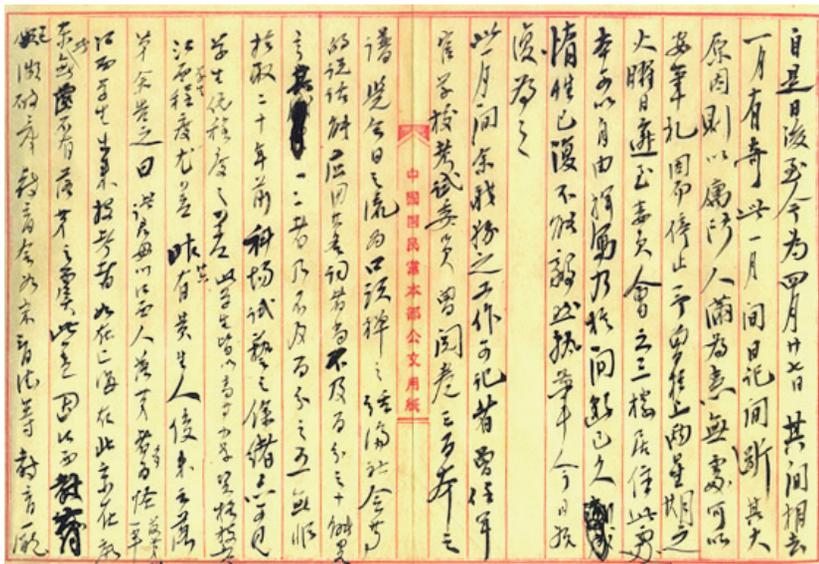


/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舍。1924年3月27日至30日，黄埔军校以此地为考场，举行第1期新生考试。

时间，在上海通过复试后，领了20块银圆路费，又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转到广州，经过总考试，通过后进入黄埔军校。

经过各地初试、复试筛选后，约1300名考生到广州参加总复试。军校筹委会、入试委员会对前来参加总考试的各省考生，除进行必要的政治审查与严格的体格检查之外，还进行面试和笔试（国文、数学），然后择优录取。

3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总复试的时间地点：“筹备处……经奉大元帅批行在案，特定本月24日午前11时，在文明路高师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试验。”3月21日，



/ 彭素民 1924年4月27日的日记，详细记载了当天黄埔军校入学考试情况。

在孙中山的亲自领导下，入学考试委员会开始筹备全国总复试工作。当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出布告：“凡经各省代表或党

员两人以上向本会介绍之投考陆军军官学生，如未在军官学校筹备处填写投考人详细调查表及粘贴相片者，须于本月25

日以前携带相片，来本会填写此项表格，以完手续，否则无效。27、28日考试体格，29日考验国文数学。”

总复试的国文试题由戴季陶负责拟定，数学试题由王登云负责拟定，张申府和几位苏联顾问协助出题，还负责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

总复试分别在当时的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内进行。第一门考试为作文，要求学生论述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并提出救国良策，侧重考查投考学生是否具有一定的革命思想；第二门考试为数学（几何、三角和代数等），要求学生能进行简单的数学运算，考查报考者的逻辑能力；此外还有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题。经过三天笔试后，报考者接受口试，由张申府任主考官。除笔试、口试外，军校还对投考学生进行体格检查。由于投考学生中成绩优秀者颇多，因此考试委员会经商议决定“酌量多录”。

4月28日发榜，在1200多名考生中，录取“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20人”。第1期黄埔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还有海外华侨，年龄大的有30多岁，小的只有16岁。

投考黄埔军校的考生大多数是爱国、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俊杰。从西安省立中学到广州报考军校的王泰吉（1期生，入校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离开西安赴广州时曾吟了一首诗：“七尺男儿汉，足立天地间，满目不平事，蹈履待何年。”表达了献身革命的豪情壮志。陈赓、宋希濂原先已经考入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主办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但当他们看到黄埔军校的招生布告后，认为“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于是果断决定退学，报考陆军军官军校。据宋希濂回忆：

正好我到广州后，在这两三个月中，阅读了孙中山的一些讲演，特别是国民党改组后发表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曾读了又读，基本上领会了这些文件的重要意义，我就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结合试题加以发挥，至于其他如数学、历史、地理等，我都考得一般。考试完后心情是不平静的，能不能考取？总在脑海里打圈，过了半个月，还没有发榜，一直等到4月28日才发榜公布，陈赓和我都被录取了。我真是喜出望外。

他们的这一行动也影响了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的其他十余名在校学生。为了防止教官发现并阻止他们应考，这十余人以各种理由请假，不过只有邓文仪、桂永清、张际春、黎道善4名被录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4人私下请求教官同意。但教官不准，邓文仪、桂永清、张际春3人各想办法脱离出去，进入黄埔军校就读。黎道善被关押禁闭3个月，在关押期间不幸病亡，为报考黄埔军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因路途遥远，且一路上困难重重，一些报考青年误了报名日期或考期。如郑洞国，当年没有赶上报名日期。当时他约了几个同学辗转千里，好不容易才到达广东，却听说军校的报名已经截止，心情极度郁闷。这时已经报上名的王尔琢、黄鳌和贺生洋来看他，这三位都是他的同乡兼好友。黄鳌得知情况后说，他当时怕一次考不上，就报了两个名，多出的名额正好可以让给郑洞国。郑洞国立即用黄鳌的名字进了考场，结果“两个黄鳌”都顺利通过考试。进入黄埔军校后，“两个黄鳌”竟然编在了一个队里，郑洞国觉得尴尬，就

鼓起勇气向军校说出了真相，并得到了谅解，把名字改回了郑洞国。

关麟征考入军校1期的情况和郑洞国类似。关麟征原名关志道，陕西鄠县人，15岁小学毕业后，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后因家中迭遭变故，负债累累，他中途辍学。1924年初，关麟征的一位朋友、陕军见习排长邓毓玫告诉他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此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处推荐邓毓玫和吴麟征前往报考，陕军部队也给他们开了介绍信。但吴麟征嫌广东太远不想去，于是他问关志道想不想去广州投考军校。关志道听了喜出望外，立即答应。他们把推荐信上的“吴麟征”改为“关麟征”。从此，关志道就改名关麟征。关麟征从西安步行到河南灵宝，换乘火车到了上海，找到了同盟会元老、陕西同乡于右任。当时，聚集在上海、准备报考军校的陕西籍青年有11人。不久，关麟征等11名陕籍青年（包括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阎揆要、张耀明、邓毓玫等）从于右任处取得了介绍信，乘船南下广州，可当他们到达广州时，考期已过。幸亏有于右任的介绍信，当时孙中山正在准备北伐，向



关麟征。

军校筹委会提出应该招收一定比例的北方学生，于是他们11人获准同其他误了考期的20多人一起补考，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第1期。

招生工作考试虽然严格，但也不乏“根据时事，灵活变通，宽严相济，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情况出现。

军校筹备委员会考虑到时局和交通等因素，会形成新生“南方人多北方人少”的局面（报考者以广东籍、湖南籍最多），加之孙中山为了准备北伐，也需要在未来的革命军中培养一定数量的北方学生，因此在黄埔1期录取中，便注意适当多招来自北方的爱国青年。1期生徐向前回忆，他听说广州的国民政府要办军官学校，并要在

上海招生，心情十分振奋。在一位军官的保举之下，他悄悄串联了几个青年同乡，带了8块钱的单程路费，从太原奔赴上海应试。到上海后，才知道黄埔军校招生的具体章程，徐向前等人在上海参加的考试既有笔试，又有口试。笔试考了作文、政治、数学；口试则考查学生对三民主义的了解及个人志趣、品格、判断力等。

通过上海考试后，徐向前等前往广州参加总复试，等候期间还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说，“更加坚定了考取黄埔军校的决心”。但总复试的结果让徐向前喜忧参半：政治考试结果不错，作文也可以，但数学因为没基础，“几乎交了白卷”。好在最后还是和十几名山西来的同学一起被录取了。

5月9日，筹委会结束工作，下属部门改为军校驻省办事处。12日，军校发出布告：“本校开学在即，所有录取各生均限于本月10日以前一律进校，逾期一概不收。”

由于军校报考者众多，每期招考过后，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革命意志坚决的进步青年落榜。招生考试后，很多落榜者不仅心理遭受打击，许多人甚至连住宿费、差旅费都拿不

出来。鉴于此，军校呈请国民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帮助“落榜生”。

第1期招考结束后，黄埔军校校方和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于右任等人发出了收纳落榜考生、给予援助的函电。他们的函电《为军官学校落第考生请命书》，刊登在1924年5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上。《请命书》描述了落榜生的境况“即如此返里，不唯无面目见故乡父老甚至发生意外之惨剧。诚所谓欲进不能，退又不可；求生无路、求死不得”，并建议孙中山“本爱护青年之心、施天地好生之德、俯念学生等不远数千里而来、立飭军校收纳、以补余额、而资造就”。在这些热心人的关心下，许多落榜者获得了再次深造的机会。

孙中山指示广州革命政府、黄埔军校对于“落榜生”和因特殊原因没能赶上考试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施以援手，为他们开放了多条入伍渠道，一些“落榜生”因此获得了进入黄埔军校的机会，还有一些人进入了各军开设的其他军校。

卢德铭听说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后，从四川启程，一路跋山涉水，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路途遥远错过第1期考



/ 徐向前。

期，后通过老同盟会会员李筱亭推荐，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看到李筱亭写给他的举荐信，直接出考题“当今国民革命之首要任务”。卢德铭即席应试，文章“激情飞扬，有理有据，忠胆毕露”。孙中山阅后极为满意，当即推荐入学，并提点他务必言行一致。最终，卢德铭被破格批准入黄埔军校第2期步兵队。

1924年4月，郑介民闻知黄埔军校创办，和黄珍吾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黄珍吾顺利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步科，但郑介民未被录取。后来，军校相关人士推荐郑介民去大本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军士队报考学兵，很快被录取。他在广州住在同乡邢森洲家（也是黄埔

1期生），积极补习功课，8月，黄埔军校第2期招生时，郑介民顺利考入步科。

黄埔军校还在每期落榜生中补录一批军事服务人员，作为从事学校后勤服务的专职人员。后来沿袭下来，常常在入伍生录取之外，也补录一些落榜学员做勤务兵。这些人在服务一段时间后，有机会重新考为学员，或者直接入伍参加革命军。勤务兵是学校的正式服务人员，他们的工作主要有晨起打扫校园（包括房间、路面和操场等）卫生，文件、物品的传递，校外人员的接待工作，服务官长饮食起居和公务。每当官长起床之后，他们要替官长整理床铺，白天为官长送公文、买东西。官长对勤务兵的使用方式，多以摇铃为信号。铃响时，勤务兵就必须马上进来探问：“有何公事？”然后，依照官长吩咐做事。勤务兵的月饷，大约10—20元，与正式学员相当。勤务兵的每月伙食开支较少，因为他们的部分开支可以不定量地搭入官长们的津贴中，自己仅需花费三四元，约为一般个人生活开支的一半。除了吃饭，勤务兵的剩余饷银有六七元，可以寄往家乡去弥补家庭开支。■

师生进入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这天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蒙难两周年的日子。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江团号”炮艇，由“江汉号”军舰护卫，从大本营出发，前往长洲岛（一说在珠江更换“大南洋号”电船），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从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到1925年3月孙中山辞世，黄埔军校共招生3期（每期人数均有多种说法）。

第1期黄埔生5月5日入校，据研究，其中“正取生”编为第1、2、3队；备取生和保送生编成第4队，由邓演达任学生总队长（后为沈应时），严重任副总队长。第1期均为步兵科。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11月19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生158名并入黄埔军校第1期，编为第6队。第6队虽然时间上比较晚，但是这批学生老兵多，实战经验丰富，军校教导团东征陈炯明叛军又急需军官，所以并入黄埔后被划归第1期，并立即开赴前线。



/ 黄埔军校第1期均为步兵科，图为第1期学生在进行战斗训练。

第1期学生于11月30日考试完毕（第6队于1925年2月毕业），1925年6月25日补行毕业典礼，共645人毕业。除部分留校工作，部分派往海军、空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单位担任政治工作和军事教练外，大多数分配到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教导团。1期生在校期间，第5队是吴铁城警卫军讲武堂并入的学生，虽然该校学生和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差不多同一时间并入，但是时间上与前四队相差较远，且学习、受训课程不同，因此被划归第2期。四川保送学生20名也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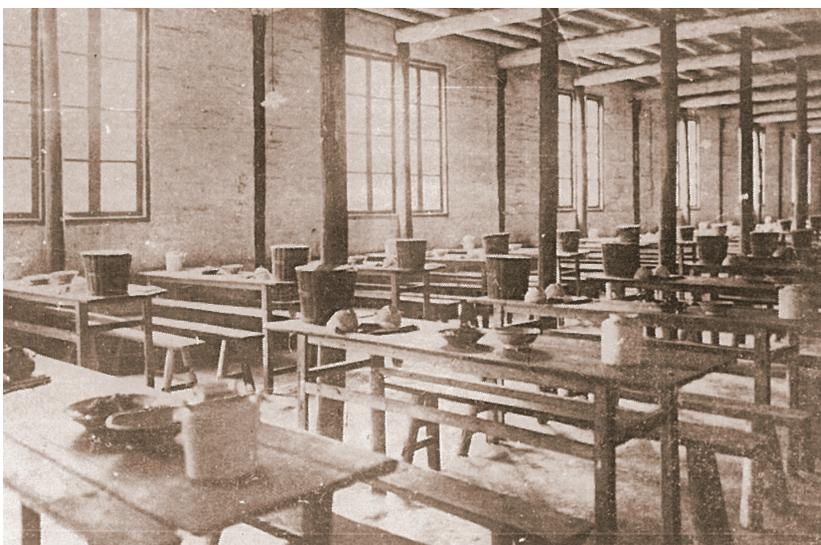
编入第5队第1区队。

第2期学生于1924年3月至11月间分批入学，共招收学生462名（1924年10月，广东警卫军讲武学堂学生160名并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编为步兵科两个队，炮兵、工科、辎重科、宪兵科各1个队。成立学生第2总队，先后由严重、王俊、胡树森任总队长，张治中任副总队长。第2期设步兵科、工兵科、炮兵科、辎重科和宪兵科。经过1年学习，2期生1925年9月毕业，共毕业生457名，主要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1军工作。

从第2期开始，由于军校学生数量增多，黄埔岛上校舍已不够用，于是军校分地训练，其中在广州北较场陆军讲武堂旧址设“陆军军官学校省分校”，工兵科、炮兵科、辎重队和第3队等军校学生以及校政治部于1925年1月初迁移至此，宪兵科也设于此。黄埔本校则专驻教导团。

1925年4月第2期宪兵科开学，训练期限11个月，1926年2月毕业。宪兵科的开学和毕业时间都非常晚，远远晚于军校2期其他队科，反而跟黄埔第3期接近。第3期的入伍生队第2营曾于1925年4月15日至30日间移驻北较场“省分校”，之后开回本校训练。宪兵科学生与第3期生相互熟识，互称“同学”，因此有人把第2期宪兵科称为“3期生”。宪兵科所授学科教育有宪兵学、射击教范、一般之军事学、陆军现行惩罚令、陆军警察学、军制大要、马学马术教范、捕绳学、侦探学、陆军礼节等；术科教育则有步兵教练、乘马教练、手枪射击术、劈刺术、捕绳实习、实弹实习、器械体操等。

第3期于1924年12月入学，共招收学生1235名，增设骑兵科。第1期、第2期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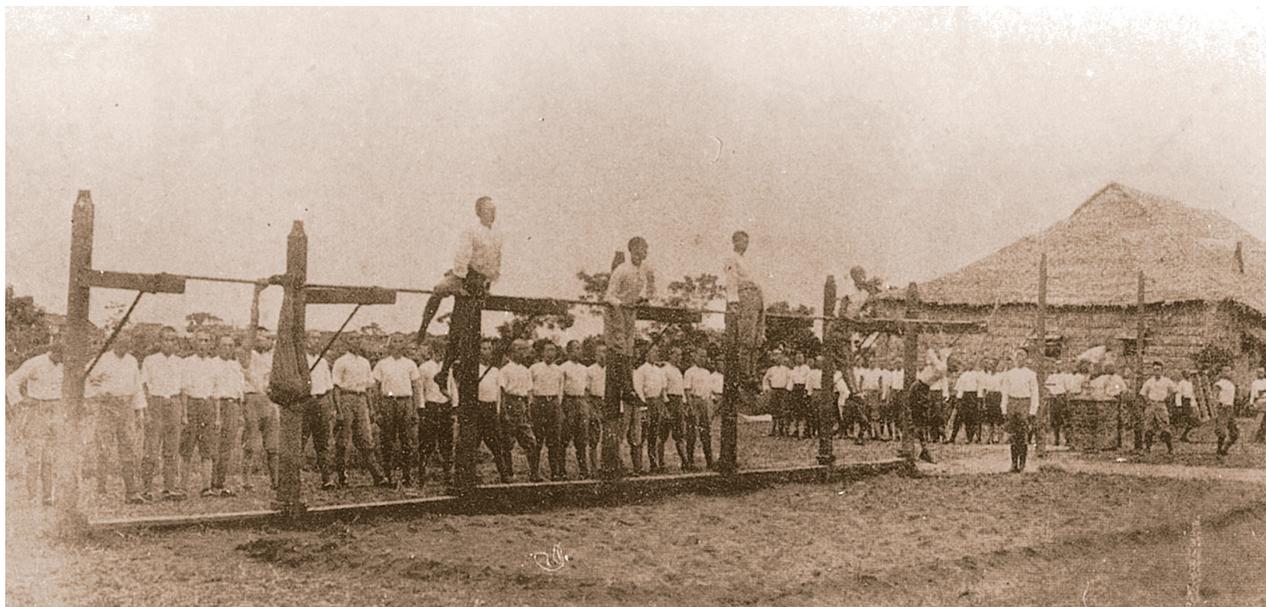
/ 食堂。



/ 寝室。

伍训练时间很短。从第3期起，军校入伍生制度开始步入正轨，第3期新入生接受为期3个月的入伍生教育，期满合格者成为军校的正式学生，编入学生队。入伍生总队长为王懋功，副总队长张治中。第3期学生编为3个大队，下分9个

步兵队，3个骑兵队。1925年6月平定杨、刘叛乱后，有滇、桂军校起义学生80名编入第3期学习。1926年1月，第3期生毕业，加上在潮州分校修业期满的学员335人，这期毕业生共1233人。多数分在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4军工作，少



/ 军体训练。

数分配到其他各军工作。

实际上，对已经成功考入黄埔军校的学生来说，通过招生考试也只是第一步，从入伍生阶段开始，就要应对各种各样的考试。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部队发展很快，扩编也很多，各部队指挥机关——司令部纷纷成立，因而各级司令部的幕僚人才很缺乏。为了应急，就在黄埔军校开设高级班，期以培养训练各级指挥机关司令部的幕僚人员。同时预计以高级班为基础，取得经验，进一步扩充为陆军大学。高级班办学地设在广州长堤天字码头左侧的前海军司令部旧址，分为军事科、无线电科及化学科等三科，军事科和无

线电科设在长堤，化学科则设在黄埔军校本校校内。军事科招考学生分两批进行：第一批考选现役军官，第二批招考高中以上或相当文化程度的学生；第二批学员入学是在第一批开学后的两个月，两批学生共有45人。高级班考试分为保送试验与入学试验两种方式。考试科目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政治、数学、理化、口述，等等。《宪兵招考简章》中，明确要求报考者五官端正，无嗜好；身体强壮，无暗疾；高小毕业（或与高小有相等之程度），文理通顺，同时要求两名中国国民党党员作为介绍人。

随着生源不断扩大，黄埔军校也成为带有国际色彩的军

校。比如，1924年底，越南人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广州，以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秘书和翻译身份参加革命工作。1925年6月，胡志明将越南人在广州的进步团体“心心社”改组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成为越南共产党的前身。为了培养革命骨干，胡志明主持开办了特别政治训练班。许多越南青年如陈富、阮良朋、黄文欢、范文同等人冲破了法国殖民者设置的重重障碍，来到广州，加入同志会，参加训练班。同时，胡志明还挑选了一批批越南青年，通过周恩来的关系，送进黄埔军校学习，为越南革命培养军事骨干。此外还有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学生也陆续进入黄埔军校学习、训练。■

台湾岛内出现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原因探析

□ 彭韬

民进党当局凭借其“全面执政”的优势，以“切香肠”式的方式推动“去中国化”进程。他们在“立法”层面不断推出凸显“台湾主体意识”的相关规定，在历史文化和教育宣传层面削弱“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意识和元素，捏造“台湾民族、台湾文化、台湾历史”等虚假概念，否认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归属。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甚至声称“炎黄子孙只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华民族论述是一个陷阱”。“台独”分子通过改造“台湾人”的概念，将“台湾国家民族”这一“国族认同”通过偷换概念、张冠李戴、历史重述等方法灌输给台湾民众，使得台湾同胞属于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被剥夺、削弱、偷换，“台湾国族认同”兴起、壮大，并通过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学者的宣扬，上升为“台湾国家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如今两岸的政治对立，严重阻碍了台湾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伤害了两岸民众的感情和团结。这背后有深层的历史、教育以及

现实原因，具体如下：

历史遗留：历史上的三次“分隔”导致“分离”

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华文化遗产者、中华文明创造者，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但台湾民众逐渐偏离“中华民族”这一“国族认同”而趋向“台湾本土化”确有历史源头。甲午海战清政府惨败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遭受了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推行同化政策，禁用中文，建立以日语教学为主的学校体系，禁止在校内学习中文和台湾本土文化等，有意识地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试图将台湾改造为“日本一部分”。“日据”时代的台湾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水平上曾得到一定的发展，导致部分台湾人在战后对“日据”时期产生某种程度的怀念。蒋介石退守台湾后，沿用“国民政府”旗号，实行“反共救国”路线，即便不再反攻大

陆，但从未认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也未能很好地维系两岸人民的民族认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出现了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台独”倾向，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到赖清德，“台独”的表现愈演愈烈。赖清德直接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攻击“炎黄子孙说”。目前已经出现“台湾国家民族”意识取代“中华民族”这一趋势，尤其在年轻人中间更为明显。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下降，其原因既有殖民统治带来的文化割裂，也有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对立，还与近年来台湾内部本土化倾向的兴起密切相关。

教育断代：不断推行“去中国化”的历史课纲

台湾的历史教育，越来越重本土历史、文化，忽略与祖国大陆之间的联系，“去中国化”的现象日趋严重。从上世纪90年代李登辉执政至今，台湾的历史课纲先后发生过6次变化，分别是“88课纲”“95暂纲”“98课纲”“101课纲”“104课纲”和

“108课纲”等6个版本。除马英九执政期间对课纲进行少许逆向修正外，历次修改大都是把与中国有关的部分越改越少。其中2019年的“108课纲”，完全把中国史从历史教科书中抹去，换成东亚史。在该课纲下，小学教育中没有中国史；初中历史18个单元中与中国相关的只有3个单元；高中的中国史被碎片化地嵌入东亚史，中国和东亚国家位于同等的地位，以主题分类取代时序脉络，中国史被切割得支离破碎。“108课纲”将2400年历史缩减为1600字，历史上著名人物、关键事件被一笔带过。不仅如此，教科书还颠倒历史黑白，如将清朝写成“占领”台湾，日本写成“治理”台湾，不仅不承认上千年两岸互相依存的关系，还美化荷兰、日本殖民统治。新的历史课本中“台湾地位未定论”也被拿出来讨论。台湾当局有意为之的“去中国化”和“台独”历史教育，模糊了台湾青年对自身文化根源的清晰认识，削弱了青年一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历史是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记忆，记录着国人抗击外敌、共创文明的历程，如果缺失了对历史的了解，就无法形成文化认同，无法凝聚民族精神，更无法成为中华

民族共同体中紧扣的一环。民进党多年来推行的“去中国化”历史课纲使得台湾出现历史认同断代，一代又一代“天然独”的台湾人正悄无声息地被塑造出来，长此以往，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当局掣肘：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在台湾的现实阻力

“台独”势力是台湾同胞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最大现实阻力。从李登辉到陈水扁、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去中国化”意图逐渐不加遮掩，切割台湾与祖国大陆联系的举动愈演愈烈。

上世纪90年代，李登辉逐步推行以“两个中国”“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核心的分裂路线，对“台独”势力极力纵容与扶持。李登辉上台伊始便允许“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于1988年8月在岛内召开年会，会议公开通过六项“政治决议”，宣称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还公开提出“奶水论”（即要为民进党成长壮大提供营养）、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使得“台独”势力恶性膨胀。陈水扁则主张“一边一国”论调，发起“入联公投”“公

投制宪”“公投立法”“台湾正名”等极端“台独”主张，试图突破“一中”框架，将台湾海峡置于战争的边缘。蔡英文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实行“渐进式台独”，即以理性谦卑示外，以不触碰底线为掩护，以“切香肠”式小步快走方法逐步扩大和深化“去中国化”进程，以量变求质变，以时间换空间，促使法理“一中”彻底虚化甚至“伪化”，以达到“台独”目的。赖清德宣称“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主权在民”，并称自己将延续所谓“四个坚持”路线，还直指“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公然挑战一中原则。“台独”领导人强行切割两岸联系，阻碍台湾岛内民众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淡化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地位和影响，让年轻一代逐渐疏离自己的文化根源。

民进党当局不断削弱民众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试图通过篡改历史、淡化文化传承来推进“文化台独”，通过“灭其文”“去其史”，一点一滴地磨灭台湾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记忆，割断两岸之间的文化连结，从而嵌入“台湾国家意识”来蒙蔽台湾民众。这种行为既背离了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4年8—9月

□ 吴亚明

8月

2024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棒球文化节在福建连城开幕

2024年东森杯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文化节开幕式6日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金福，台东县县长饶庆铃等两岸嘉宾看望参赛台湾青少年球员、教练和老师，并应邀为比赛开球。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故意将广大台湾同胞同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混为一谈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8日答记者问指出，民进党当局故意将广大台湾同胞同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混为一谈，企图拉无辜民众为“台独”垫背，企图借抹黑大陆来阻挠两岸交流往来，只能说明其色厉内荏、颠倒黑白，完全是徒劳的。

福建宁德：创新平台深化闽台乡建乡创合作

乡村振兴已成为闽台融合发展的新载体。近年来，福建宁德市以深化闽台交流合作为契机，鼓励台湾青年建筑师和文创团队到当地助力乡村振兴。截至目前，宁德累计引进27个台湾团队、86名台湾人才参与乡建乡创，为53个村庄项目提供“陪护式”服务。

400余名台湾同胞在陕西感受传承与发展

13日，为期7天的2024陕台文化交流周在陕西省启幕，400余名台湾同胞组成文化参访团、教育参访团、青年参访交流团等12个团队，参与两岸同胞黄帝陵祭祖典礼、文化教育领域研讨会、青年创业就业研习营、青年科技实践创新交流赛，参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

(接前页)

教育的初衷，更对岛内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以及两岸关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为一些极端思想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当前，两岸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并强烈呼吁拨乱反正，恢复中华文化教育的正常秩序。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根基和灵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情感的归宿。任何试图“去中国化”的行为，都无法改变深植于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更无

法割断两岸之间深厚的历史联系和血脉亲情。民进党当局这种背离历史、背叛民族的行为，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强烈反对和谴责。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

博物馆等。

福建福州：暑期实践搭建台青就业创业“第一站”

今年暑期，共青团福州市委联合人社、文旅等部门策划了“好年华 聚福州”实践活动，推出10多条免费观光旅游线路，并面向台湾学子设置专属实践岗位，提供职业规划、就业推荐等服务，为台湾学子搭建在福州就业创业的“第一站”。

第六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与抗战精神传承研讨会在云南举办

2024年是抗战胜利79周年，也是滇西抗战暨腾冲光复80周年。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与抗战精神传承研讨会15日至16日在云南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退役将领、专家学者、教师和学生代表、媒体记者等近200人参加活动。会议旨在倡导加强两岸抗战历史教育和抗战精神传承，激励两岸同胞尤其是年轻一代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守护两岸共同家园，携手共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2024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山东青岛举办

以“铸牢民族认同 共促民族复兴”为主题的2024年两岸关系研讨会17日在山东青岛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140余人参会。

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

巡航执法行动

17日至18日，交通运输部所属福建海事局、东海救助局共同实施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2024年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香港举办，王沪宁致信祝贺

2024年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20日在香港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代表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金门县民意代表参访团呼吁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由金门县议会议长洪允典、民意代表陈玉珍率领的金门县民意代表参访团访问北京，就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加强金门与大陆交流合作等向有关部门表达意见建议。

2024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在厦门启幕

2024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23日在厦门海沧金沙书院启幕。作为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年度汉字评选将延续往年形式，继续面向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界代表性人士征集其心目中的年度汉字。

海峡两岸人文学论坛聚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六届海峡两岸人文学论坛23日在福建厦门举办。来自海峡两岸哲学、文学、历史、经济、艺术、社会学等领域近100名学者与会，

共同探讨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国台办：两岸同胞要行动起来，坚决反对赖清德当局“台独”挑衅和冒险行径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3 日答记者问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威胁，是导致台海兵凶战危、岛内社会撕裂对立、民众利益受损的祸根乱源。两岸同胞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坚决反对赖清德当局的“台独”挑衅和冒险行径，还台海以和平，还民众以安宁。

两岸台胞在京纪念郑成功诞辰 400 周年暨收复台湾 362 周年

两岸台胞民间交流促进会 27 日在北京举办纪念郑成功诞辰 400 周年暨收复台湾 362 周年两岸交流活动，以“向心成功 共创福祉”为主题，广邀岛内政党团体、宗亲团体代表和两岸专家学者、青年学生等 200 余人，共同缅怀郑成功丰功伟绩，传承台湾同胞爱国爱乡光荣传统，展望祖国和平统一光明前景。

第十九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举办

第十九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 30 日在江西九江举办，内容包括赣台电子信息、现代农业、文旅等产业对接和合作推介活动。

20 岁啦！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台北庆生

30 日上午 9 时许，台北动物园刚开园，大熊猫馆门前便排起长龙，大家正翘首等待向这

位“人气明星”送上 20 岁的生日祝福。

9 月

第 28 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吸引 260 多名台湾企业家参会

第 28 届鲁台经贸洽谈会 1 日至 3 日在潍坊举办，共有两大主题活动、七项专题活动，吸引 10 余个工商团体的 260 多名台湾企业家参会。

评恢复台湾文旦柚输入，国台办：一家人的事好商量好解决

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符合祖国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基础上，海关总署决定自 2 日起恢复台湾地区文旦柚输入，输祖国大陆文旦柚须来自获得注册登记的包装厂和果园。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好解决。我们愿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与岛内相关方面商谈台湾农产品输入大陆的事项，为台湾同胞特别是基层民众谋利造福。

黔台经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以“凝聚共识 推进融合 共促发展”为主题的 2024 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3 日开幕，来自海峡两岸 300 余名嘉宾齐聚贵阳，共商黔台交流合作，共促两岸融合发展。

台北地院再开庭裁定对柯文哲羁押禁见

台北地方法院 5 日再次召开羁押庭，以图利犯罪嫌疑重大、有灭证及勾串共犯或证人之虞为由，裁定将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羁押于

台北看守所，并禁止会见、通信。

国台办：国家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审理台湾居民杨智渊犯分裂国家罪一案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日答记者问表示，经向有关部门了解，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智渊犯分裂国家罪一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于2024年8月26日一审公开宣判，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杨智渊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第十六届“重庆·台湾周”举办，聚焦渝台合作新篇章

第十六届“重庆·台湾周”10日在重庆开幕。开幕式上，集中签订两岸经贸合作重点项目9个，投资总额118.7亿元人民币，项目涉及新能源、创业服务、新材料等领域。

1至8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70%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1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据统计，今年1至8月，两岸人员往来近300万人次，同比增长70%。进入暑期后，尽管依然面临民进党当局种种干扰阻碍，但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热情持续高涨，各领域交流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亮点特色突出。

第九届两岸和平发展法学论坛在北京举行

第九届两岸和平发展法学论坛11日在北京举行，两岸法学法律界近百位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围绕“加强法学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主题研讨交流。论坛由中国法学会所属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主办。

台湾民间团体谴责美国政界及岛内“台独”势力恶意扭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

由台湾数十个政党团体组成的“反分裂反干涉联合行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当前美国政界及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恶意扭曲1971年联大第2758号决议，谬称该决议不适用于台湾，意图在国际上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专家：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歪曲践踏挑战

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发谬论，妄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无关”。权威专家就此表示，民进党当局无视历史和法理事实，与国际社会大多数对抗。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歪曲、践踏和挑战，任何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公然挑战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共识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国台办：赖清德鼓吹“台湾人民自救”暴露谋“独”险恶用心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4日答记者问表示，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真正理解民主自由的真谛，认清“绿色恐怖”就是对民主自由的践踏，认清“台独”分裂就是对台海和平、自身安全的威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和大陆同胞一道，共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

“一轮明月照家国”中秋晚会在京举行

由台盟中央、全国台联主办，中央民族歌舞团承办的“一轮明月照家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秋晚会14日晚在北京举行，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赏歌舞，共话团圆，共迎祖国华诞。

岛内政治学者：台湾不应沦为美国霸权主义的炮灰

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等机构14日举办主题为“强权即公理：这就是美国——‘9·11’事件后的美国霸权”学术研讨会，邀请岛内知名政治学者剖析美国霸权主义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多数与会学者认为，美国霸权主义行径危害世界与台海和平稳定，台湾应停止配合美国的对抗思维，避免沦为美国的工具。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停止执行对台部分农产品进口零关税政策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近日发布公告称，自2024年9月25日起，停止执行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相关农产品进口关税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金门迎来疫情后首个祖国大陆旅行团

时隔4年多，金门22日上午迎来首个祖国大陆旅行团。这个20余人组成的旅行团当日从厦门经“小三通”抵达金门，预计展开为期2天1夜的观光行程。

2024辽台经贸交流合作周在沈阳举办

2024辽台经贸交流合作周25日在辽宁沈阳开幕。活动以“振兴谱新篇，融合创未来”为主题，聚焦两岸产业创新合作，支持台商台企共享东北振兴发展机遇，共有来自两岸的近300名嘉宾参加。

国台办：赖清德置台湾民众于“台独引战”险境，必遭失败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5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赖清德日前有关言论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只能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持续进行谋“独”挑衅，鼓吹“倚外谋独”“以武谋独”，置台湾民众于“台独引战”险境，严重背离历史大势，必遭失败。

两岸企业家聚三亚共谋深化合作共赢发展

以“融合、创新、共赢”为主题的2024台商峰会25日在海南三亚开幕，两岸企业界代表约200人参会。

2024年两岸（厦门）艺术节启幕

以“情深‘艺’浓·两岸共融”为主题的2024年两岸（厦门）艺术节25日晚在厦门闽南大戏院启幕。艺术节期间，闽南大戏院的舞台将迎来共计12部18场高品质剧目，包括台湾优人神鼓《墨具五色2.0》、朱宗庆打击乐团音乐会《动能∞无限》、“声声不息”台湾神秘失控人声乐团音乐会、台湾演员王耀庆参演的交响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军工解码：现代战争中战斗机的常用战术

(上)

□ 石稼

现代战争中战斗机的常用战术包括多种策略和技术，展示了现代战斗机在应对复杂战场环境时的多样化策略和技术应用，体现了科技发展对空战形态的重大影响。

作战行动中的单机基本战术

超视距空战战术

超视距空战俗称“看不见就打”的空战，指在双方飞行员目视范围之外，针对本机机载探测系统搜索跟踪的空中目标，或友军提供指示引导的空中目标，利用中/远距空空导弹发起攻击的空战模式。空空导弹分类中，一般将射程10公里内的称为近距格斗导弹，射程在10—100公里的称为中距空空导弹，射程在100公里以上的称为远距空空导弹。在海湾战争中，第一次出现了中距空空导弹击落飞机数超过近距格斗导弹击落飞机数的情况，标志着超视距空战时代的到来。

作战原则

超视距空战是“进攻为

主、防御为辅”的一种主动进攻战术，战斗机在综合火控系统、机载武器和外部情报源支持下，可以实施近乎360度全方位、全高度的超视距攻击，从而将空中拦截线向敌方一侧前推，保证本方空域内各类目标的安全。基本作战原则是“先敌发现、先敌打击、首攻奏效、机动防御”。组织超视距空战的关键是要进行目标敌我识别和目标分配确认，在本方预警探测力量指挥引导和电子战力量支援掩护下，掌握机载雷达开机时机和中/远距空空导弹发射时机，通过通信数据链实时感知战场态势，利用战斗机先进性能实施主动进攻。

超视距空战的主要特点包括6个方面：

攻击范围广。目前的中/远程空空对空导弹一般均具备全天候、全高度、全方位攻击能力，部分先进型号还具有“发射后不用管”能力，从而使得战斗机的攻击范围随着机载雷达探测距离和导弹射程的增加而急

速扩展，甚至可以实现无禁区、无死角攻击，但同时也增大了误击的可能性。

安全性较高。由于战斗机一般在本方雷达探测区内或敌方预警探测区外围发起超视距作战，因此对于周边战场态势和空情的掌握比较全面，在发起超视距攻击时，自身安全性能够得到基本保证，被敌方先手攻击的可能性较小。

隐蔽性较强。当超视距空战的作战对象由空中预警机或地面预警探测体系等发现和跟踪时，战斗机初期可凭借本方情报支援和目标引导进行主动接敌机动，隐蔽性较强，能够尽可能保证攻击发起的突然性，从而提高导弹的命中概率。

强调迎头攻击。超视距空战中，为有效缩短攻击前战斗机火控系统和导弹的准备时间，达成“先敌打击”的要求，强调优先采用战斗机机头正对敌方目标的迎头攻击战术。

强调首发命中。在双方都处于超音速飞行的情况下，发

起超视距攻击的机会可能只有1—2次。因此,强调战斗机在发起攻击时能够同时攻击敌方多个目标,或者对一个目标进行连续饱和攻击,从而提高命中概率。后续随着双方距离的急速拉近或拉远,将失去超视距空战的先决条件。

战术动作要求低。战斗机在进行超视距空战时,对机动性要求不高,战术动作的转换节奏较慢。加之机载综合火控系统和中/远距空空导弹性能的显著增强,跟踪锁定目标和装定诸元等准备时间缩短,对战斗机发射前飞行姿态的要求也就相对减少。

作战流程

超视距空战按时间先后顺序可分为战术巡航、接敌占位、搜索跟踪、识别决策、发射制导、退出评估、准备二次超视距攻击或转入近距空战等7个作战步骤。

战术巡航阶段。根据敌方空中目标的大致方位、距离、速度和航向,按照指挥中心要求,提前起飞进入空中待战区,巡航待命过程中,战斗机应始终保持对敌方威胁方位的关注,并完成综合火控系统和导弹武器的各项准备。由于距离较远,战斗机自主获取的目标信号并不

精确,甚至无法稳定跟踪,因此战斗机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转入下一个作战步骤。若采用超视距引导攻击方式,且战斗机的空中待战区处于本方雷达控制范围内侧的安全空域,则战斗机可以采取静默飞行模式,避免过早暴露,后续行动由指挥中心负责指挥控制。结束战术巡航转入下一个作战步骤的时机,需要根据敌我战斗机的作战性能和战场态势等综合决定。

接敌占位阶段。当决定发起攻击时,需要根据战场实时态势规划接敌占位航线,战斗机沿接敌占位航线飞行时,应保持较快速度迅速占领攻击阵位,并尽可能隐蔽攻击企图。飞行员需要不断评估敌机攻击我机的可能性,时刻关注机载雷达系统、告警系统、电子战系统、敌我识别系统等信息,以防遭到敌方目标先手攻击或其他潜在目标的突然攻击。接敌占位过程中可以视情进行电子战掩护或由其他兵力进行佯动,如实时战场态势发生不利变化,可放弃攻击或转入防御。

搜索跟踪阶段。战斗机在接敌占位过程中,机载雷达系统捕获敌方目标后,随着精度不断提高,由搜索状态转入跟

踪状态,跟踪稳定后,利用综合火控系统获得目标特征、方位角、高度、距离、接近速度和航迹预测值等,通过通信数据链与本方预警机或指挥中心提供的战场态势信息进行对比,同时保持对空域内其他目标的搜索跟踪。搜索跟踪阶段需要确保战斗机与本方指挥网络的实时通信与信息共享,确保对作战态势的精确掌握。如实时战场态势发生不利变化,可放弃攻击或转入防御。

识别决策阶段。战斗机综合火控系统在扫描跟踪过程中,敌我识别器按确定顺序向空域内各个目标发出识别信号,对所有应答结果进行处理,并将识别结果告知飞行员。飞行员根据识别结果与上级分发的空情态势,做出战术决策并上报。在多机编队情况下,战斗机编队可采用合作或非合作式目标识别策略对空域内的所有敌方目标进行模式识别,以区分目标的种类、属性、威胁程度,以便飞行员对多个敌方目标进行威胁判断、目标分配及确定攻击顺序。敌我识别分为程序识别、技术识别和目视识别等3类,程序识别是预先严格规定本方所有参战兵力的活动区域、时间、航线、高度等要素,

技术识别是依靠敌我识别器和数据链等技术手段进行目标属性判别。超视距空战中的敌我识别主要依靠程序识别和技术识别，识别结果不明则严禁发起攻击。

发射制导阶段。战斗机在明确1个或多个打击目标后，将目标纳入中/远程空空导弹的发射包线，根据目标的位置、速度、高度和航向等实时信息，通过综合火控系统自动装定中/远程空空导弹的发射诸元，选择导弹的制导模式，选定发射点，准备进行超视距攻击。抵达发射点后，发射导弹，并根据导弹发射后的制导要求决定是立即转入下一阶段，还是保持对目标的指示引导。这个阶段，飞行员应努力争取“先敌打击”的条件，面对敌机随时可能进行先手攻击，飞行员需要实时根据战场态势和敌机性能，自主决定是继续攻击还是转入防御。在对多个目标同时攻击时，要再次确认目标分配和攻击顺序是否合理，避免遗漏敌方威胁目标，或者重复打击同一个目标。

退出评估阶段。战斗机在完成中/远程空空导弹发射或导弹引导过程后，可以根据任务完成情况选择转向退出作战



/ 战斗机发射 AIM-120 中程空空导弹。

空域，在做好防御准备的同时，观察评估打击效果，为后续行动提供决策依据。

准备二次超视距攻击或转入近距离空战阶段。若第一次超视距打击效果不理想，或本次作战任务没有完成，则战斗机需要根据不同的任务类型、实时态势和备弹情况等，综合决定是否发动第二次超视距攻击，当作战态势极为不利时，可以放弃攻击行动并退出作战空域。需要强调的是，战斗机能否展开第二次超视距攻击，不是完全由自己决定的，若一方战斗机选择超音速脱离，则空战基本宣告结束；若双方战斗机均决心

再战，则双方将进入第二次超视距空战，或者迅速转入近距离空战阶段。

整个超视距作战流程中，不同作战阶段的衔接非常紧凑，各阶段之间的界线比较模糊，部分操作步骤可以在相邻阶段内同步进行。各国关于超视距空战的作战条令和作战流程不尽相同，上述作战流程仅供示意和参考。

组织实施

战斗机在不同作战任务和战场环境下，组织对不同类型敌方空中目标进行超视距攻击时，可以选择最合适的超视距进攻战术。在转入对来袭中/

远程空空导弹的防御时，也应遵循相应的防御战术。在信息化战争中，战斗机在无指挥引导下，依靠本机机载系统进行超视距空战的可能性极低。战斗机在有指挥引导下进行超视距空战的进攻和防御战术主要包括：

迎头接敌进攻战术。作战对象：敌方战斗机、战术侦察机、预警机、轰炸机以及其他机种。前提条件：本方战斗机机载雷达探测距离和中/远程空空导弹射程均等于或高于敌方，即本方处在均势或优势条件下。实施要点：敌方目标应处于本方战斗机水平方向 $\pm 25^\circ$ 以内，避免因本机改变航向等原因，导致敌方目标短时间偏出本机雷达探测范围而丢失，从而影响目标探测和稳定跟踪。攻击低空目标时，一般采取低空接敌、攻击前爬升至高于目标1000—3000米的攻击策略。攻击高空目标时，一般采取低于目标2000—4000米高度发起攻击的策略。战斗机使用的空空导弹若是“发射后不用管”类型，则发射导弹后，同时减速，进行大过载、大坡度转向脱离。否则，战斗机发射导弹后开始减速，并保持对目标的跟踪探测，引导导弹飞向目标，待导

弹末制导头开机后，做“U”型回转或大坡度转向退出。

斜向迂回进攻战术。作战对象：敌方战斗机。前提条件：本方战斗机机载雷达探测距离和中/远程空空导弹射程均低于敌方，即本方处在劣势条件下。实施要点：接敌阶段，将敌方目标处于本方战斗机水平方向 $\pm 25^\circ$ 以内。当双方运动到距敌方导弹最远射程外适当距离后，引导战斗机进行大弧度水平转弯，并与目标航向形成交叉，使敌机雷达难以捕获。待运动到敌机雷达探测区外侧时再转向切入，同时雷达开机捕获目标，待参数稳定后发射导弹，然后立即半滚倒转或大坡度转弯退出。由于本方战斗机斜对目标高速运动，导致雷达开机探测时可能无法捕获目标，并且敌方目标相对本机存在较大的旋转角速度，会致使导弹命中率明显下降。若超视距攻击未命中目标，也可以考虑加速前冲，以大范围超音速蛇形机动方式抵近对方寻求二次打击或近距空战机会。

隐蔽接敌进攻战术。作战对象：敌方战斗机、战术侦察机、预警机、轰炸机以及其他机种。前提条件：本方战斗机具备优秀的隐身性能和超音速

巡航能力，即第四代战斗机可以采用。实施要点：利用本方战斗机隐身性能好的特点，在指挥引导下，寻找敌方地面预警探测体系的盲点，在防守薄弱的时机，超低空突破对空探测圈外围，隐蔽接近目标所在空域，在进入导弹射程后，立即爬升到有利高度对目标发动迎头突袭，随即转向退出。在敌方有预警机升空值班的情况下，选择空中预警机的多普勒盲区，利用其下视探测能力相对较弱的特点，抓住其改变航向的时机，在外围本方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下，实现低空隐蔽接敌。

摆脱锁定防御战术。现代战斗机普遍装备脉冲多普勒雷达或有源相控阵雷达，随着雷达性能不断提升，想要摆脱敌方战斗机机载雷达的跟踪锁定已经比较困难。若是面对脉冲多普勒雷达，则可以尝试利用多普勒雷达工作原理进行超音速蛇形机动，通过速度和角度的变化实现对雷达的欺骗干扰。若是面对有源相控阵雷达，则较难摆脱跟踪，可尝试采用 90° 侧转机动，机尾正对敌机远离机动，以及电子干扰等方式。

规避导弹防御战术。当战斗机雷达告警系统发现来袭导弹信号后，应立即综合运用电

子干扰、红外诱饵和紧急机动等方式规避来袭导弹。对于半主动制导方式的导弹，应重点规避敌机机载雷达的锁定，降低敌机引导能力。对于主动制导方式的导弹，应在释放干扰的同时做大过载机动动作，力争飞出导弹攻击的侧边界，或摆脱主动制导头开机后的搜索扇面。必要时，可以在导弹来袭方向高速侧转，从而增大目标线角速度，迫使导弹增加过载，扩大主动制导头的动态误差，导致命中精度下降。

武器使用方案。在超视距空战中，针对敌方预警机、轰炸机、战斗机等不同目标进行导弹攻击所使用的攻击方案均有所区别，一般情况下是对每一个目标发射1枚中/远程导弹，但考虑到不同导弹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命中率，以及稍纵即逝的良机，有些情况下需要采取饱和攻击或连续攻击的方式，对同一目标发射多枚导弹。

近距离空战战术

在近年的几场局部战争中，由于参战双方作战实力相差悬殊，战场信息“单向透明”，近距离空战几乎没有机会发生，因此出现了近距离空战是否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争论。从辩证的角度看，虽然超视距空战的重

要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渐凸显，但近距离空战仍是未来不可避免的重要作战样式，特别是当参战双方在制信息权上处于均势地位时，战场信息“双向透明”，双方战斗机的指挥通信、雷达探测、敌我识别等装备有极大可能遭到强大的电子压制、通信干扰和网络攻击，使其作战性能大幅下降甚至无法工作。当超视距空战无法达成作战效果甚至无法组织实施时，是选择立即退出战斗，还是选择“短兵相接”+“空中群殴”的近距离空战，就完全取决于双方指挥员的作战决心和飞行员的战斗意志了。

作战原则

作为战斗机诞生以来就存在的空战样式，近距离空战的战术已经非常成熟，制空战斗机就是按照近距离空战需求研发的终极格斗兵器。随着信息技术和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近距离空战已不局限于视野范围内的空中格斗，其概念和范围均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细分为亚音速近距离空战和过失速近距离格斗。在不同气象和光照条件下，5—8公里一般是飞行员肉眼可以目视发现敌机的最大距离，而新型近程空空导弹的最远攻击范围已达到10—15公里，因

此，一般将双方战斗机相距8—15公里以内进行的战斗称为近距离空战。

近距离空战的基本作战原则是“攻防一体、机动灵活、扬长避短、力争先手”。在进入近距离空战后，由于现代近程空空导弹性能不断提高，双方可能出现“同归于尽”或“不死不休”的情况。因此近距离空战中，飞行员需要不断通过机动动作，主动谋求先手攻击权，并做好攻防状态实时切换的应对准备。先退出空战一方将面临另一方巨大威胁，需要抓住时机，配合大过载机动和电子战手段方可实施。

近距离空战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4个方面：

攻防转换快。战斗机进入近距离空战后，会降低速度以增强机动性。由于距离近，机动性强，攻防角色的转换会非常快。双方飞行员的任何一个合理决策或错误动作都可能导致优劣势互换，特别是被对方提前预判出自己下一步行动时，将导致严重后果。

危险系数高。由于双方战斗机距离接近，一方机载雷达或后向目标探测器一旦锁定目标发射导弹，则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很短，需要立即做出机动

规避和电子对抗动作，因此危险系数高。随着导弹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近距离空战的危险系数会越来越高。

机动性要求高。近距离空战对战斗机的机动性能要求很高，需要做出各种亚音速、甚至过失速机动动作来占领发射阵位或摆脱跟踪锁定。近距离空战已不再局限于尾后攻击方式，而是根据战斗机的综合火控系统与近程空空导弹使用要求，在保证自己不被敌方击落的前提下，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导弹发射条件而进行大过载机动。

对导弹要求高。现代近程空空对空导弹一般均具备离轴发射或越肩发射的全向攻击能力，未制导头性能出色并且弹体机动性极高，加上现代头盔瞄准具的帮助，使得导弹成为近距离空战胜负的关键。近年的空战模拟和演习中反复证明，在装备同一代近程导弹的情况下，不同型号战斗机机体性能上的先进无法对应换来近距离空战中的优势，各型战斗机被导弹击落的概率基本相同。

作战流程

近距离空战是一个快速变化的作战过程，按距离远近可细分为中近程转换阶段和近距离格斗阶段。中近程转换阶段一般

在8—15公里，近距离格斗阶段一般在8公里以内。在中近程转换阶段，除战斗机要抛弃外挂油箱，降速至1倍音速或亚音速以外，战斗机的作战流程与超视距攻击流程类似。近距离格斗阶段主要包括机动占位、锁定目标、发射制导、机动防御等4个作战步骤。

机动占位阶段。机动占位阶段是近距离格斗中最重要的一环，根据敌方战斗机的相对位置和本机近程导弹特点进行各种亚音速大过载机动，力争占领发射阵位，确保达成导弹发射条件。在躲避敌方战斗机火控雷达锁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持飞机较大的角速度和一定的飞行高度。

锁定目标阶段。根据近程空空导弹性能和实时战场态势，由机载雷达、后向目标探测器或数字头盔锁定敌方目标。目前近程空空导弹一般为红外成像导引头或复合制导导引头，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离轴发射能力，部分先进型号甚至允许飞行员选择敌机的座舱、机体或发动机等具体部位进行瞄准攻击。

发射制导阶段。为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一旦综合火控系统提示飞行员目标锁定完成

后，应立即发射近程空空导弹。根据实兵演习和实战经验，部分国家战斗机在对目标发射导弹前，会主动释放红外干扰弹，以防遭到其他作战平台锁定。

机动防御阶段。机动防御与机动占位是贯穿整个近距离空战全过程的两个同步环节，机动防御主要依靠亚音速下持续的大过载、大转角、变速变高等机动方式规避敌方战斗机锁定，力争化被动为主动。在敌方战斗机发射导弹后，综合采取光电对抗和大过载机动的方式规避导弹，必要时进行过失速机动或超低空飞行。

组织实施

近距离空战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敌方战斗机，爆发近距离空战的前提条件是双方战斗机都有继续战斗的意愿，且均装备有近程空空导弹。在这种情况下，可按照进攻战术和防御战术两类来进行简要介绍。需要指出的是，近距离空战中战斗机对敌方导弹的防御成功率不高，主动进攻并避免对方发射导弹就是最好的防御策略。

不可离轴发射导弹的进攻战术。当战斗机处于尾追状态时，飞行员按一定的机动方式保持占位优势，并在战斗机到达射击位置、满足射击条件时，

对机头指向的敌方目标进行攻击。常用的攻击方式包括纯追踪、前置跟踪、纯碰撞等战术。目前，这类近距空空导弹已很难适应现代空战要求。

可离轴发射导弹的进攻战术。具有离轴发射能力的导弹，其离轴角一般在 $\pm 90^\circ$ 以内，即这类导弹能攻击位于战斗机前半半球的目标。战斗机不需要采取尾追方式锁定目标，只需要将机头在一定误差内对准敌机直至锁定，即可具备发射条件。为使目标处于机头前半半球区域内，同样需要通过连续的机动占位来实现。

为达成占位发射的条件，需要采取亚音速机动和过失速机动。其中，亚音速机动主要是需要战斗机根据双方态势，长时间保持最大的转弯速率和加速，从而获得占位机会和锁定时间。过失速机动是指战斗机在主动“失速”条件下仍能保持机动作战能力，并能将战斗机的能量优势立即转变为位置优势，使战斗机能快速将机头指向目标，从而获得更多的导弹发射机会。典型的过失速机动动作包括“眼镜蛇机动”“大迎角机头转向”“J-急转机动”“榔头机动”“钟摆机动”“大迎角下滑倒转机动”以及“库尔



/ 近距空战想象图。

彼特斤斗”等。

可越肩发射导弹的进攻战术。此类导弹近距空战中不但能攻击机头前半半球目标，还能攻击机尾后半半球的目标，真正做到 360° 全向攻击。因此，战斗机无需进行过多的占位机动，飞行员可以在攻击目标的同时，专注于对敌方来袭导弹的防御。

过失速机动防御战术。以“眼镜蛇机动”为例，各类过失速机动在摆脱敌机机载火控系统或导弹末制导头跟踪时，配合光电对抗手段，能够达成一定防御效果。

常规机动防御战术。比较常见的机动防御战术包括逃逸战术、侧向正切战术以及迎头

偏移战术等，在进行这些机动战术时，均应配合电子对抗和光电对抗等同步实施。

逃逸战术，即最大限度地增大双方战斗机的距离以摆脱敌方攻击。一般是具有较高飞行速度的战斗机决定退出空战时采用该战术，通常需进行超低空飞行。侧向正切战术，即从侧翼高速正向切入敌方战斗机前半球的瞄准禁区，使其无法机动占位和发射导弹。

迎头偏移战术，即当双方迎头对冲时，在保持敌机位于本机机头前半区的情况下，进行高速外侧曲线机动，使敌机火控系统跟踪不稳定，无法达成导弹发射条件。■

发扬黄埔精神，为促进祖国统一 发挥黄埔人的独特作用

——参加纪念黄埔百年活动有感

□ 陈蔚东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一百周年。作为海外黄埔亲属代表，我应邀参加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深感荣幸，倍感振奋。通过参加纪念座谈会，特别是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参观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与来自海内外包括台湾地区的黄埔同学及其亲属进行交流，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黄埔军校的辉煌功绩，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黄埔精神的实质内涵和在新时代的现实意义，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今黄埔人所要努力践行的使命担当。

我的黄埔情结

我的父亲陈寿颐是黄埔 12 期学员，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兵总指挥部工作。1938 年，他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1940 年，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做军务部参谋。1942 年，考取陆军大学正则班 19 期，毕业后被遴选到陆大兵学研究院 13 期做研究员。

曾先后担任陆大战术教官、将官班教官，陆军总司令随从参谋、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随从参谋等职。1949 年，父亲完成了在美国指挥与参谋大学的深造后，听闻南京解放毅然决定回国。不久，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军政大学任教员、研究员。1951 年，受刘伯承邀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军事教员。1954 年后，他被任命为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并先后在南京市人大和政协以及民革担任职务。

我对黄埔军校的认知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那时，父亲协助中共南京市委为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落实起义投诚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当时有许多黄埔同学找到父亲，要求他帮助落实政策。父亲总是热情接待他们，尽心尽力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解决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同时他还慷慨接济了

一些生活拮据的同窗。一些台湾和海外黄埔同学给他来信表达诉求，他及时同有关部门联系，帮助他们解决留在祖国大陆的亲属遇到的问题。从父亲对黄埔同学的关心我能感受到他的黄埔情感，也让我开始了解黄埔。

1985 年，父亲来信告诉我，他去北京出席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还参加了负责联络苏、鲁、皖、赣四省黄埔校友的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筹建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他说，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就是为了团结身边的黄埔同学，联系在台湾和世界各地的黄埔校友，凝聚一股强大的爱国力量，发扬黄埔精神，为祖国统一服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念念不忘在台湾和海外的黄埔校友，不辞辛劳地接待了许多到祖国大陆探亲访友的同窗，向他们介绍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多年来，

黄埔军校同学会已成为海内外黄埔人亲情交流的重要平台。正是父亲的影响，使得黄埔精神在我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正是这段印记，使我为自己是一个黄埔后代而感到骄傲，也使我心甘情愿地为祖国统一大业出一份力，做一点事。

记得40年前我刚到澳大利亚自费留学时，认识的第一个当地华人就是来自台湾的黄埔后代。虽然那时候两岸同胞由于多年未有往来而彼此陌生，但有着黄埔父辈这个共同点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旅澳多年，我又陆续认识了一些黄埔同学和亲友。海内外的黄埔人碰到一起总是格外亲切，黄埔军校的历史情缘，使不同背景不同意识形态的人能够互相交流。在那种一见如故的信任感中，我强烈地感受到黄埔精神的巨大凝聚力和黄埔人的深厚情谊。亲爱精诚，黄埔同学情常在。而黄埔后代之间也有着有一种天然的纽带，当知道对方父辈是黄埔同学时，我们就会立刻亲近起来，每一次遇到黄埔后代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正是因为有黄埔同学的情意在，才会有黄埔后代的情缘在。

为了发动更多的黄埔人为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贡献智慧



陈寿颐与南京黄埔同学拜谒中山陵。

和力量，我发起倡议成立一个能够把旅居在澳大利亚的黄埔军校同学和亲友联系起来的社团。这个倡议得到全澳各地黄埔人的积极响应。当澳大利亚黄埔军校联谊会宣布成立时，无论是高龄的黄埔同学，还是年轻的黄埔后代；无论是来自祖国大陆的黄埔亲友，还是来自台湾或是海外的黄埔同学及亲属都踊跃参加。大家都怀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发扬黄埔精神，促进祖国统一。

发扬黄埔精神

众所周知，黄埔军校在中国近代史和军事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不仅培

养了众多杰出的军事政治人才，成为中国将帅的摇篮，还形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以“爱国、革命”为基本内容的黄埔精神。

成立黄埔军校，就是为了反对国家分裂。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凡是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为祖国的统一而努力奋斗。”建立革命的军队，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他创办黄埔军校的初衷。“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正是在黄埔精神的鼓舞下，广大的黄埔同学团结作战，敢于牺牲，在反分裂、促统一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在东征北伐中

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己任，为结束军阀割据、驱逐外国侵略者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把国家大义放在第一位，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黄埔先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浴血奋战，使黄埔精神得到洗礼和升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埔同学积极投入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他们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使黄埔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黄埔精神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在特定时期的生动反映。在黄埔同学身上体现出的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亲爱精诚的团结精神，英勇作战的牺牲精神，恪尽职守的奋斗精神，对黄埔后代有着深刻的影响。黄埔后代与黄埔精神有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与渊源，传承黄埔精神是我们黄埔后代义不容辞的责任。

黄埔精神象征着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在祖国统一的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要是真心秉承黄埔精神的人，就必然反对国家分裂，拥护祖国统一。我的父亲把他大半生的精力投入到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和平

统一大业之中。我是黄埔后代，我为有爱国革命的黄埔父辈而感到荣耀。黄埔精神一直感召和激励着我，我要把黄埔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贡献力量。

促进祖国统一

实现国家统一是黄埔人之为奋斗的目标，是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心愿。如今两岸还处于分离状态，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是我们黄埔后代光荣神圣的使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岛内政治局势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事实，更阻挡不了两岸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分裂势力背弃民族大义、背离民心，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祸害。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活动，严厉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分裂罪行，坚决打击一切“倚外谋独”“以台制华”罪恶行径，台湾同胞才能安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才能过上和平安宁的好日子。

由于两岸长期分离，许多台

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缺乏足够了解，特别是多年来“台独”分子肆无忌惮地大搞分裂活动，猖狂地宣扬“台独意识”，使少数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存有很深的误解，对发展两岸关系持有相当的疑虑。近年来，祖国大陆从遏制“台独”，顺应岛内民意，争取台湾民心等方面调整对台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两岸关系的新思想、新战略和新主张。一方面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坚决遏制“台独”势力；另一方面主动出台了一系列惠及台湾民众切身利益的措施，得到了绝大多数台湾同胞的肯定，也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两岸的互利合作以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父亲的12期同窗好友郝柏村将军是一位有着深厚民族情怀的黄埔人。他一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国家统一，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赢得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赞誉。他身上鲜明的标签就是坚决反对“台独”。他的名言“我不讲反‘台独’我只消灭‘台独’！”表明了一个黄埔生坚定的爱国立场，是岛内黄埔校友的榜样。作为黄埔后代，我非常钦佩这位黄埔前辈反“独”促统的态度和勇气，更敬重他从未

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铮铮骨气。

随着两岸各界交流的深入，两岸黄埔同学和后代的来往也在不断增多。为纪念黄埔军校建校一百周年，台湾许多黄埔同学奔赴祖国大陆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台湾黄埔同学代表还在纪念座谈会上做了发言，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共鸣。这充分说明黄埔精神是两岸共同的精神家园和历史记忆，同时也表明黄埔这个情感平台在今后的台海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黄埔同学和亲属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以黄埔情缘为纽带，密切与世界各地黄埔同学及亲友的联系，尤其是要加强与台湾黄埔同学和后代的联系，以黄埔精神推动两岸反“独”促统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同志仍须努力

当前，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一意孤行地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严重威胁台湾同胞安全福祉，引起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和不满。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任重道远。



/ 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领导和工作人员合影，左二为陈寿颐。

在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的黄埔同学和亲友是传承黄埔精神的一个独特群体，是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要发扬黄埔精神，赓续黄埔情缘，为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为促进祖国统一勇担时代重任。

我们黄埔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是事关国家利益的核心问题，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针对所谓“大陆没有管治台湾这么多年，两岸怎么统一？”的谬论，我们要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们，尽管祖国大陆和台湾尚未统一，但这不是中国

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并没有改变祖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事实上，“九二共识”就是在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的，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黄埔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分裂祖国的言行。“台独”分裂势力违背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针对所谓“大陆应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以示诚意”的谬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祖国

大陆的武装力量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国家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是对“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军事震慑。我们相信大多数台湾同胞都是反对“台独”的，他们对祖国大陆日益强大的国防力量并不感到担忧。“台独”势力虽然人数极少，但绝不能低估其破坏力。只有强大的军事武装力量，才能遏制“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图谋，才能狠狠打击分裂国家的行径。

我们黄埔人要耐心细致地做好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针对所谓“台湾的民意是要保持现状”的言论，我们要坦率诚恳地告诉他们，中国的统一是包括 2300 万台湾同胞在内的 14 亿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民意。“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就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途径。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充分考虑了两岸的实际情况，细致入微地照顾到台湾民众的真实感受和切身利益，只会为台湾同胞带来福祉。事实证明，两岸之间签订的协议都最大限度地达到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的目的，既有利于两岸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又使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们黄埔人要千方百计地



/ 陈蔚东题“黄埔军魂，爱国赤心”。

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凝聚更多的力量。两岸同文同宗，都认同中华文化，这种文化认同就是历史民族情感的认同。两岸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弘扬和传播增强了岛内的民族认同，为促进祖国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我见到来自台湾的黄埔同学都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他们都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都希望两岸的统一让台湾人找回做“中国人”的光荣感。

我们黄埔人，特别是旅居在海外的黄埔人要积极热情地投入全球范围内的反“独”促统

运动，宣传“一国两制”，利用一切机会敦促旅居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争取旅居国的主流社会及舆论对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与同情，赢得国际社会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实现中国统一大业的支持。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他还说过：“凡是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为祖国的统一而努力奋斗。”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包括祖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我们的黄埔先辈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一代黄埔三代亲，天下黄埔一家人，这是黄埔人中流传的一句话。它表明，广大黄埔同学和亲友拥有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目标。“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须努力”已成为黄埔人一致的呼声。我们海内外的黄埔人应该团结起来，众志成城，让黄埔精神后继有人，薪火相传。让我们高举黄埔旗帜，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黄埔军校澳大利亚联谊会会长）

和平将军张治中（下）

□ 张静生

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为促进祖国统一作贡献

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接着，东北、华北野战军对平津实行包围，中原、华东野战军大举南下，直奔淮海，寻找国民党军队主力进行决战。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于1949年初发表《新年文告》，向共产党发出了求和声明，声称“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政府派出了由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包括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在内的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来加派聂荣臻参加）组成的和平代表团进行谈判。赴北平前，张治中两次到浙江奉化溪口面见蒋介石。

4月1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当天晚上6点，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6人来到他们下榻的六国饭店看望，并



/ 张治中。

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4月2日至12日，双方代表个别谈话，交换意见。从8日起，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分别会见国民党代表团的6位代表。4月7日，李宗仁通过张治中向毛泽东致电，表示谋取国内和平的诚意。毛泽东于4月8日给李宗仁复电。国共双方的广播电台和报纸都播报、刊登了李宗仁和毛泽东的往来电文，对和谈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和平谈判也不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

的阻挠和破坏，他们制造反动舆论，对张治中和代表团施加压力。谈判期间，张治中等围绕周恩来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认真研讨，提出修改意见。4月15日，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16日，黄绍竑和屈武带文件回南京。20日晚，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和其他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谈最终破裂。

从4月21日凌晨起，西起

湖口、东至江阴的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向各地进军。此时，身在北平的张治中提出要回南京复命。毛泽东、周恩来得知后十分忧虑，担心他回南京后的安危。无论张治中回去复命的态度多坚决，他二人都决定要把张治中留在北平。

1949年4月24日，周恩来兴冲冲地来到了张治中下榻的六国饭店，对他说：“文白先生，上海方面又派专机来了，我们一起去机场接一下客人。”周恩来的这番话令张治中颇感疑惑：“谁来了？”周恩来笑笑说：“你很熟悉，见面就知道了”。于是周恩来和张治中一起乘车直奔西苑机场。机舱的门打开，张治中的家人走下了飞机。那一刻张治中激动无比，感激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

经过深入思考，6月26日，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他做出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留在北平，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为革命作贡献。

此事一出，在海内外产生了



/ 张治中与李宗仁等在一起。

深刻影响。毛泽东对张治中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社评，“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许多爱国人士反映，“这篇声明检查了过去，展望了未来。呼吁国民党惩前毖后，和中共推诚合作”。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历程。”

参加新政协，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1949年6月，张治中应邀参加在北平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在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张治中做了大量工作，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国旗的设计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最终被采纳一事。

1949年6月15日，距离开国大典仅余三个半月，新政

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其中的第六小组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的成员都是来自于文艺界的知名人物，比如马叙伦、张澜、郭沫若、田汉、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小组成员，联合起草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并上交中央政治局审核。提案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同，周恩来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审阅修改。

7月15日，全国各大刊物，《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都在醒目位置刊登了这份启事，消息被火速传开。距离《启事》发布仅30天，筹备会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2992幅国旗设计图。一番筛选



/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后，第六小组选出了30多幅设计图。周恩来指示将选好的设计图编成一册，每幅只写编号，便于最终选定。

9月21日，600多人到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按照计划，政协全体成员被分为11个小组，分别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内容。

国旗复字第3号图，用热烈的中国红做整幅作品的基色调，左上角高高悬挂一五角星，

下方几厘米处绘有一黄色横杠，代表黄河。整幅图用红黄两色作配，又融合华夏几千年的文化元素，看上去简洁大方，极其符合主题要求，成为毛泽东心中的首选。张治中却反对这一方案。一向耿直的他决定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意见。见到毛泽东，张治中开门见山道：“主席，我认为3号采用横杠的设计构思，有很大的不妥。”“红底代表国家和革命，那么中间这一杠，不就成了分裂国家和革命

吗？”张治中的话引发了毛泽东的思考。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邀请第六小组成员再次商讨国旗、国歌、国徽等问题。毛泽东提及张治中的建议，决定放弃复字第3号图：“我看座各位不反对这面国旗的，恐怕有四分之三，但这样总不够圆满，还是要选一幅让全体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再想一想。”毛泽东静静聆听了代表们对复字第3号和复字32号的看法，

随后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复字 32 号五星红旗这个图案简单明了，寓意也很好，象征着国家与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这样看来，这个图案设计得很有意义！陈嘉庚、梁思成等人也赞同毛泽东的说法，到会人员基本上都赞成复字 32 号。自此，五星红旗成为国旗的最终方案。1949 年 10 月 1 日，30 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亲自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为祖国和平统一奔走呼号。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先后被西班牙、荷兰、日本侵占。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祖国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台湾，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支持下，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对抗祖国大陆，台湾海峡两岸分隔对立，台湾问题由此产生。

自台湾问题产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坚定不移的历史任务。受中共中央委托，张治中自 1949 年就开始了去台人员的争取工作。1950 年 1 月，张治中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率领工作小组前往广州

秘密从事台湾回归的工作。主要是通过滞留香港的故旧好友去做台湾国民党重要人物的思想工作，劝其率部或个人回归祖国。1950 年 3 月 11 日，毛泽东给张治中发了一封电报，称张治中现在从事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希望他“刻意经营，借收成效”。3 月 20 日，毛泽东再一次致电张治中，邀他到北京商谈此事。半个月之内，毛泽东与张治中互通了四封电报。

1950 年 6 月初，张治中与周恩来商量后，决定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信劝其放弃反共主张。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计划搁置。1954 年，张治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做了一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广播，历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号召逃往台湾的故旧“只要你能弃暗投明，就必然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的宽大待遇”“全国人民已经伸出手来，希望你们勇敢的走上这条生路，主动地尽自己一切可能靠拢祖国和祖国人民，使台湾早日得到解放”。这是祖国大陆对台广播中较早的一篇原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讲话，在台湾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张治中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发表演讲、

发表文章、做广播讲话，呼吁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

为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张治中主动做战犯战俘的工作。1956 年 5 月 22 日至 30 日，根据全国政协的安排，张治中分批会见了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李仙洲等 26 名战俘战犯，向他们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程远大，国家好了，个人也会有前途。党和政府准备对他们宽大处理，分批释放，希望他们努力争取。这些人获释后，都为加强两岸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1956 年夏，张治中根据党和国家提出的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在回答《团结报》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我认为这是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殷切最诚恳的态度，我相信台湾的绝大多数人是会同意接受的。”1957 年 3 月民革中央举行的三届二次全会上，张治中又专门就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1958 年 10 月，张治中撰写题为《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的文章，号召台湾的故旧回到祖国怀抱。文章字里行间充满感情：“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

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20世纪50年代后期，蒋介石先后委派宋宜山和曹聚仁等人回祖国大陆探听情况，张治中经常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

20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国内经济建设遇到了困难，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两岸对峙加剧，张治中继续为沟通两岸关系做工作。他曾先后给蒋介石、蒋经国及陈诚写信，对台湾当局很有影响。在给陈诚的信中，张治中希望他能够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两岸和平统一贡献力量。陈诚通过有关渠道捎信给周恩来和张治中，称要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的。他还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在他的言论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大陆”。1965年3月，陈诚病逝。当时台湾当局有些人想在陈诚的遗愿中加上“反攻大陆”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蒋介石也不同意修改。这充分说明，中央对台工作是有成效的。后来在政协的民主人士会议上，周恩来说我们对台湾不断通气、传话、传信，这些工作是有成



1962年春节前，周恩来同张治中（左一）、傅作义（右二）、屈武（右一）合影。

效、有影响的。这实际上也是对张治中工作的高度肯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追求进步，追求光明，因而在历史转折关头

能作出正确的抉择。他为人正派，襟怀坦荡，对中国共产党直言不讳，肝胆相照。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从言到行，他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正如邓颖超在《张治中回忆录》的序言中所言：“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文白先生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世代代为人民所纪念。”

先母胡严淑铭的黄埔情缘

□ 胡葆琳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我的父亲胡靖安便毕业于此。他是黄埔军校第 2 期学生，历任黄埔军校第 6 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少将武官、蒋介石侍从室中将副主任等职。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

1940 年夏，我的母亲严淑铭与父亲共结连理，从此结下黄埔缘。



/ 1976 年，胡靖安夫妇在上海合影。

第一次遇见父亲

1937 年 7 月初，母亲随家人到庐山避暑时遇见中学同学王民英，王民英已经结婚，爱人是蒋介石的私人专机驾驶员徐焕升。

某日下午，母亲应邀到王民英的住处小聚，适逢一位青年军官到访，徐焕升为母亲介绍：“这位是委员长侍从室的少将高参胡靖安，陪委员长到庐山开会。”转身又向那位青年军官介绍母亲：“严小姐是民英的

同学。”

王民英随即拉着母亲到一边闲聊，她小声说：“他们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靖安是 2 期生，焕生是 6 期生，靖安现在在委员长身边工作。”母亲不由得对他们刮目相看，这是她第一次遇见父亲。

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王民英夫妇和父亲立即随蒋介石返回南京。外祖父一家也匆匆回到上海，外祖父安排全家迁居武汉并办理好母亲的转学

手续后，急往南京处理商务。

武汉再遇父亲

我的外祖父严凤鸣是末代秀才，曾任北洋政府河南信阳总司令，之后弃军从商，创办全国军用印书出版社。南京沦陷前夕，他带领员工将所有设备和物资全部推入江中，不给日军留一张纸片。

由于江面已经封锁，外祖父一行只能走陆路逃亡，不幸的是，外祖父路上突发心脏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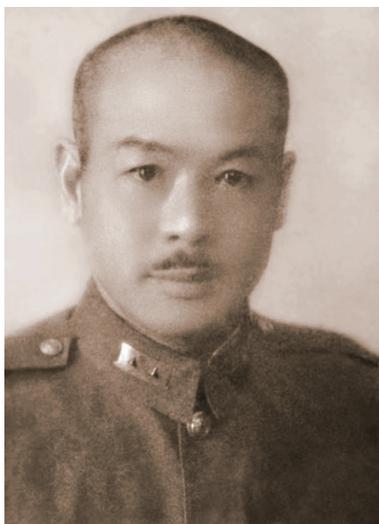
历经千辛万苦到汉口时已奄奄一息，一家人悲痛万分。次日，母亲随管家去武昌购买棺木后乘渡轮回汉口，渡轮行到江中心时，一艘政府专用快轮驶近，她隔着玻璃窗赫然看见站立船头的父亲，父亲也发现了母亲。

渡轮缓缓靠岸，母亲随人群下船时听见有人叫自己，闻声望去，父亲在岸上向她招手：“局势这么紧张，你为什么还不走？”“因为家父病重，危在旦夕……”母亲忧心忡忡地回答。“请把地址给我，我去拜访伯母，告诉她武汉危急，你们必须立即分批撤离。”父亲向母亲要了地址后，便与母亲告别。

当外祖母得知部队即将撤退的消息后，立即安排子女们先去重庆。母亲辞行时紧紧握住外祖父冰凉的手哭个不停：“爸，不孝女走了，您老多保重。”她知道此一别便是永别，忍不住失声痛哭。外祖父气若游丝，颤声道：“快走！严家子孙决不当亡国奴！”这是外祖父留给子孙后代的临终遗言，落地有声。

不是亲人更胜亲人

几日后，外祖父突然醒来，双眼凝视远方，外祖母赶紧在他耳边细语：“孩子们已经平安



/ 1938年底，晋升陆军中将的胡靖安。

到达重庆。”恰在此时，父亲到访，他一边向外祖父鞠躬，一边恭恭敬敬地说：“伯父，您老放心，我会照顾好您的儿女。”外祖父缓缓闭上眼睛，安然离世。

外祖母抵达重庆后，郑重其事地告诉儿女们：“靖安不仅为你们的父亲送了终，还帮助我办理好后事，他不是亲人更胜亲人，你们以后要称他大哥。”

台儿庄大战时，父亲冒死三进三出台儿庄传达密令。每当他深入前线，外祖母一家便提心吊胆，得知台儿庄大捷，大家欢欣鼓舞。1938年底，父亲晋升陆军中将军衔，全家人为他高兴。

母亲和父亲喜结良缘

1940年夏，母亲和父亲在重庆结婚。

婚前，父亲对母亲说：“我是军人，军人时刻准备为国捐躯，你嫁给我就要做好随时成为寡妇的准备。”母亲听了，毫不犹豫地地点头。战争时期一切从简，他们的婚礼简单而温馨，来宾除亲友外大部分是父亲的黄埔同学。

婚礼上，父亲牵着母亲的手来到众人面前，他指向一长排英姿勃勃的青年军官道：“他们都是我的生死之交、草鞋朋友。”大家纷纷表示祝贺，并唤母亲为大嫂。

于是，年仅25岁的母亲不仅成为黄埔亲属，还是一些黄埔同学口中的大嫂。

1941年，日军调动飞机集中轰炸重庆，有时一日轰炸两次。一日傍晚，母亲刚从外祖母家的防空洞回到自己家中，又闻空袭警报，她只得再由勤务兵搀扶着前往隧道防空洞。由于身怀六甲走得慢，赶到防空洞时里面已经满员，他们只能就近躲进一个积水的小防空洞中。警报直到晚上11时方才解除，筋疲力尽的母亲回家倒头便睡。凌晨时分被急促的拍门声惊醒，原

来外祖母听闻隧道里闷死了上千人，急忙领着小女儿和儿子赶往隧道，只见遍地死尸，他们顾不得害怕，提着油灯在一排排尸体中寻找，结果没找到便来到母亲家中。舅舅严森心有余悸地对母亲说：“姐姐，我好怕在隧道里看到你的脸，真的好怕。”

父亲闻讯赶回，见母亲安好便立即奔赴前线。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父亲和母亲在全面抗战之初结为夫妻，此后一直聚少离多。

母亲的中国心、黄埔情

1975年3月，父亲回到上海与全家团聚，母亲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然而，世事难料，父亲竟然一病不起，母亲心如刀绞，全家人忧心如焚。

1978年3月2日凌晨，父亲与世长辞，享年75岁，于3月11日上午举殡。许多上海的黄埔同学和亲属前来吊唁，全国各地的黄埔同学发来唁电，有的特地远道赶来送父亲最后一程，还有一些黄埔后代前来帮忙。

遗体告别时，母亲凝视父亲消瘦的脸庞，想到他回家仅3年就走了，禁不住哀思汹涌，



/ 2005年9月，胡严淑铭出席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

悲恸欲绝。我们兄弟姊妹更是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1979年秋，我随母亲移居香港，不久便去台湾看望亲友和父亲的黄埔同学。父亲的黄埔同学见到我们都非常高兴，关怀之情溢于言表，有的说我长得像爸爸，有的回忆起和父

亲的往事……大家百感交集。

母亲之后经常往返于内地和港台之间，不是为两岸黄埔同学和亲属寻找亲人，就是协助台湾老兵回乡寻根拜祖，或者为两岸黄埔亲属的交流牵线搭桥……她总是不辞辛苦、甘之如饴。

1984年6月，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母亲主动赠送沙发等家具。在她看来，黄埔军校同学会是黄埔同学和亲属的家，她作为黄埔亲属必须表示一点心意。母亲很乐意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组织的联谊活动。她说：“每次活动都可以见到台湾来的黄埔同学和许多黄埔后代，大家亲如一家。”

1996年11月，母亲和我应邀赴广州出席黄埔军校旧址重建落成典礼。母亲很郑重地对我说：“这是你爸爸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我知道，爸爸是2期毕业，1927年回校担任入伍生政治部主任。”我连连点头道。“军校修复工程需要资金，我觉得你应该有所表示。”母亲的话提醒了我，我随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可以捐资人民币10万元。

2005年，母亲受邀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获颁抗战纪念章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大阅兵。后来，她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你爸爸曾经在德国留学和工作，又奉命前往欧洲各国和北美考察，亲眼目睹了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深知中国积贫积弱，一直盼望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当时，我望着

眼前雄伟壮观的阅兵场面，心情无比激动，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今天，中国终于强大了’，我替你爸爸看到了。”母亲的爱国之情深植于心。

母亲还欣然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和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大会，并参加在台北、武汉、上海举行的“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以及黄埔军校同学会每年组织的各项联谊活动。

2014年9月，我和儿子江山创办的大中华会和上海海外联谊会在香港合作举办第五届“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暨纪念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活动，200余名来自海峡两岸的黄埔师生、亲属及各界嘉宾欢聚一堂，共叙黄埔情谊，共促祖国统一。在论坛开幕前夜的欢迎晚会上，主持人宣布“今年是胡靖安将军遗孀胡严淑铭夫人百岁寿辰”，两岸黄埔人共祝母亲生日快乐，温馨的局面体现了“天下黄埔是一家”的深厚情缘。

母亲辞世

2019年9月10日凌晨，母亲在香港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6岁。9月17日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领导和香港各界人士前来吊唁，出席告别仪式的嘉宾除远道而来的亲友外，还有来自台湾的退役将领和两岸的黄埔后代，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各地的海外联谊会、黄埔军校同学会以及亲朋好友纷纷发来唁电并致赠挽联和花圈。

母亲是将门之后，曾祖父随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获赐黄马褂、封状元巴图鲁（能文能武大将军）称号。

母亲是黄埔将领夫人，婚后与丈夫聚少离多、荣辱与共，含辛茹苦独自带大4个子女，为丈夫守住一个家。

母亲以身为黄埔亲属为荣，黄埔情结贯穿了她的一生，她积极参与两岸黄埔师生和亲属的交流活动，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母亲的一生经历百年沧桑，见证时代巨变，面对风起云落，始终保持大家风范，从容淡定，富贵情不骄，坎坷志不移。正是：沧桑坎坷情何堪，风起云落心如常；纵然笑看百岁身，日过西山意犹酣。

今年是先母逝世5周年，谨以此文表示最深切的怀念，亲爱的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殷殷之情皆源家风 寸寸丹心皆为家国

——忆我的父亲孙白琳

□ 孙华嵘 孙华岑

2016年3月3日,在我的老家河北保定高阳县西庄村,隆重举行了纪念孙承宗诞辰453周年庆典活动。作为孙承宗的后裔子孙,我和三弟孙华岑很荣幸被邀请。活动中,我们受到高阳县县委和相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并获赠一本《高阳县志》。让我惊喜的是,在《高阳县志》“高阳县籍黄埔军校生名录”中,看到了我父亲孙白琳的简介:孙白琳,黄埔第10期;入校时年龄,24岁;入校时间,1933年9月;籍贯,高阳县西庄村。父亲的名字虽然被载入了家乡史志,但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怀,他在时代变革中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精神品质却鲜为人知。

父亲孙白琳,1911年10月出生在河北高阳县西庄村。9岁时由祖母崔雪琴接到北京读书。1925年,父亲进入祖父孙岳创办的保定育德中学完成中学学业。1929年,父亲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体育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留学日本的父亲



/ 孙白琳。



/ 1932年,孙白琳报考黄埔军校时
在南京留影。

立刻回国考入黄埔军校第10期,立志学成后报效祖国。

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父亲从小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26年祖父抵抗日军进犯一事对父亲产生了深远影响。3月12日,日本军舰护送奉军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对此,国民军进行制止。日舰不但不听,反而开炮炸死炸伤国民军士兵19名。任作战前敌总指挥的祖父立即下令开炮还击,迫使日舰撤离。这就是近代史上的“大沽口事件”。事后,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会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却遭到了段祺瑞执政府的血腥镇压,酿成三一八惨案。祖父痛斥段祺瑞当局残杀学生的罪行,并通电全国“自解直隶督军本兼各职”,以示与段祺瑞决裂。祖父爱国、爱民的行动对正在读书的父亲震动很大。父亲感到自豪的同时,认识到祖国的领土与主权不容侵犯,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 黄埔军校七分校大门。

父亲考入黄埔军校，家里人都很高兴。父亲初入军校即按规定先接受3个月的入伍生教育，期满后以接受军官教育为主，学习军制、兵器、筑城、战术、通讯、后勤等。父亲天资聪明，悟性很好，又曾是体育系高材生，再加上勤奋好学，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父亲遵循与人为善的原则，与学友相处融洽，并主动帮助同学共同进步，颇得师生赞许。毕业

后，父亲留校被授予中尉军衔。

1935年军校放暑假，父亲从南京回北平省亲，路过东交民巷使馆区日本领事馆门前时，看到荷枪的日本兵正对当地百姓咆哮辱骂并举枪示威，非常气愤。早在日本留学期间，父亲就感受到了日本国内弥漫着浓烈的军国主义气氛。如今在自己的国家又看到如此飞扬跋扈的日本人，他更加认识到局势的严峻。在北平度假期间，正

逢高中毕业的妻弟陈来甲（我的大舅）面临升学与否的选择，父亲便劝他报考黄埔军校。大舅便听从父亲劝导考入黄埔军校12期。军校毕业后，大舅投身抗战前线，参加过长沙保卫战，远征过印缅战场。1949年大舅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改革开放后，海峡两岸有了联系，大舅来信提及我父亲，字里行间表露出对他的敬佩。他写道：“我之报考军校，完全

受白琳姐夫指导。那年（1935）你们的父亲（黄埔军校10期）放暑假，由南京回北京和我见面。那时日本侵华，北京局势日紧，学生无法安心读书，所以，他劝我报考军校，这也是决定我生的关键。……还有一点告诉你们，白琳姐夫能力极强，遇事极果断，对己对人要求标准很高……”

1937年抗战军兴，为加大基层军官培养力度，同时安置沦陷区流亡学生，大部分战区陆续成立了黄埔军校分校。第七战区也在西安王曲成立了第七分校，胡宗南任主任，顾希平为副主任，教育处处长是吴允周。父亲调任七分校军事教员。此时，前方战事日趋激烈，基层军官伤亡很大，急需补充。军校一方面加大教育力度，压缩学习周期；同时又在各地举办培训班、学生队练习营。1938年，父亲调任七分校（驻兰州）15期学生队上尉队长。学生队主要由来自各地的流亡学生组成，他们思想复杂，散漫习气严重。由于缺乏正面宣传教育，面对当时局势，一些青年学生意志消沉、精神颓废，思想极不稳定。有些人不愿受拘束，进入练习营不久便悄然逃走。父亲意识到要将这些青年学生

培养成思想明确、意志坚定、纪律严明、具有一定军事素养的抗日军人，并非易事，深感责任重大。

在学生队，父亲除了负责管理、训练外，还抽时间对学习落后的学生予以补习指导，生活上给予体贴照顾，同时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西北冬季寒冷，父亲洗脸从不用热水，还经常到河边用冰冷的河水擦身，学生目睹，纷纷效仿。父亲适时鼓励、引导，借此培养他们的意志，激发他们不怕苦的精神。在父亲严格管理和耐心教导下，学生的思想认识得到提高，精神面貌有了改观。那些文化程度低、思想不安定的学生，最终也安下心来接受训练，由练习营顺利进入军校正规生行列，在后来的抗战中作出了贡献。

1940年，应新编第1军军长邓宝珊邀请，父亲来到新1军工作，担任上尉教官。邓宝珊是父亲的姨父，他的夫人崔锦琴是祖母崔雪琴的妹妹。父亲职务升迁，也算是亲人的提携吧。作为一名黄埔毕业生，父亲的愿望是带兵打仗。不久，父亲请求调到部队基层见习，希望通过这一途径逐步实现自己的愿望。但在黄埔系和杂牌



/ 邓宝珊。

军矛盾尖锐的新1军里，父亲郁郁不得志，感到十分苦闷。

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兰州是中国重要的国际战略物资中转站，苏联援华物资经兰州运往各抗日前线，因此成为日机野蛮轰炸的重点目标。为了保障兰州的安全，兰州南北山头先后配备了高射炮部队、防空照明及防空情报网。是年底，父亲调离新1军，到甘肃省全省防空司令部任职，负责安排、指导甘肃各地防空工作人员的防空知识讲授和防毒、救护等防空技能训练，终日忙碌。

1941年6月23日，父亲的姨母——邓宝珊夫人崔锦琴和她的两儿一女在兰州枣树沟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时，由于防空洞坍塌而遇难。此时，邓宝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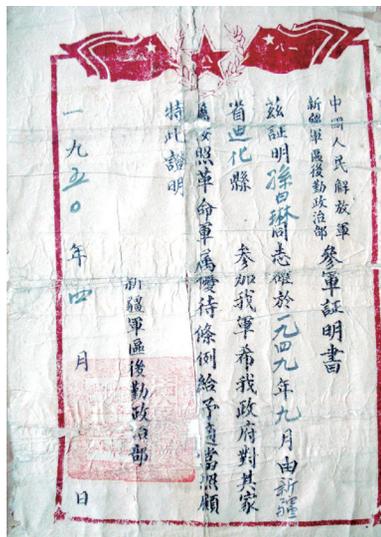
正在榆林忙于抗日军务脱不了身，丧事只能由在兰州的父亲与从西安赶来的大伯共同办理。

父亲姨母遇难一事对父亲刺激很大，让他愤懑、内疚的同时更感到了一种责任。由于公设的防空洞屈指可数，老百姓防空意识淡薄、防空知识欠缺及防空设施不完善，每遇空袭警报响，避难人群混乱不堪，造成拥挤、踩踏、窒息以及民间防空洞因坍塌造成伤亡事件屡屡发生，为此，民间防空亟需指导。1941年7月，父亲参与了制订《兰州防空注意事项十一条》的工作，后来在督促改建防空洞、防空壕的工作中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有段时间，父亲随身带着防毒面具四处奔波，时常数月不进家门。记得我童年贪玩，经常戴着父亲放在家里的防毒面具，在院子里挥舞父亲闪亮的指挥刀。由于业绩突出，父亲多次立功受奖，职务也得到提升，不久担任了甘肃防空司令部汽车运输大队大队长，从此奔波在甘（甘肃）新（新疆）公路这条重要的国防通道上。1944年，父亲调任新疆供应局汽车运输大队上校大队长。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长相英俊、气宇轩昂，保持着严谨

的军人风度，但他留存的照片很少。在他保存的一本装帧漂亮的《黄埔军校同学录》里，我见到过一张他军校时的照片。此外，还有一张他60年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证”完好地保存着。这张参军证印制虽显粗糙，但它却蕴含着父亲识大体顾大局的一段故事。

1948年兰州解放前夕，父亲携家眷随军退到新疆。进疆后，父亲在陶峙岳部工作。其间，父亲积极配合陶峙岳办理新疆和平起义事宜。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十分紧张，陶峙岳及新疆政府主席鲍尔汉派员赴塔城、叶城、阿克苏、伊犁、哈密等地做驻军的动员工作，动员各级军官认清形势、转变立场、弃暗投明。同时命令各单位领导做好本部门人员的工作，随时听命，响应起义。任新疆供应局人事室上校主任的父亲，对全国的形势、新疆的出路认识是很明确的，他对新疆和平起义持有坚定立场，颇得陶峙岳赞许和信任。1949年9月25日，父亲带领新疆供应局全体人员成功举行和平起义。随后，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定为团级干部，到新疆军区政干校学习。父亲毕业后调回兰州，1952年被错误对待，



/ 孙白琳参军证。

结束了戎马生涯。1983年4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部发文指出：“经复查认为：当时对孙白琳同志作清洗出队的处理是错误的……决定撤销1952年5月的决定，恢复其起义人员身份，从1952年5月起改办复员。”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给父亲补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军人证明书”。

父亲的一生是追求进步的一生。国家危难，抗战军兴，他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关键时刻，面对民族大义、人民安危，他坚定立场，弃暗投明。父亲这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歌颂。

从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到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傅正模求学历程

□ 傅克刚 傅小平

傅正模，字镜磨，1904年2月20日出生于醴陵枫林市乡（今枫林镇）。傅正模祖辈世代以耕读相传，家境较为殷实。其父傅学知出生于1881年，受时局影响，傅学知弱冠时就对清廷积弱、屡受西方列强欺凌而愤慨不已。此后更是与革命党取得联系，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了同盟会在湖南的组织洪江会，并于1906年参与了同盟会策划的“萍醴浏”起义，后因清廷镇压，起义失败。傅学知负伤，被迫返家疗伤，因他平日乐善好施得到乡人庇护，侥幸躲过厄运。傅正模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过程中不断受到父亲革命思想及行为的影响。

1916年，傅正模12岁时考入了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浏阳县金江高等小学校。对于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傅正模来说，这是一所比较理想的学校。傅正模不仅积极向学，而且关心时事政治。在这里，他学习了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并奉为信仰，这为他日后前往



/ 傅正模。

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奠定了基础。

1920年夏天，傅正模完成学业后升入长沙县长郡公学学习。长郡公学成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并定校训为“朴实沉毅”。长郡公学历史悠久，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几任校长思想进步，主张推行国民军事教育，主张国家实行共和制。不仅如此，公学还重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学生关心社会、走向社会，不能只是在学校里“死读书”。傅正模在这样的革命氛围中完成了

初中学业。

赴粤求学路坎坷

1923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发表宣言，公开主张推行三民主义。不久，陈炯明在广东组织的叛乱被平息，陈氏通电下野。孙中山在重新获得广东军政大权之后，已不再对由军阀统帅的队伍抱有希望。因此，孙中山计划开办一所真正拥有革命意志的军官学校，为拥护革命的军队提供可靠的基层骨干，使革命政权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在此情况下，孙中山授权大元帅大本营军政部部长程潜筹办军校。

为了办好军校，程潜提议先在黄埔岛试办一个陆军教导团（辖两个学兵连，300多人），以培养军队基层骨干为目的，待教学条件成熟再扩建为学校，专事培养初级军官。

1923年10月22日，教导团如期开办。与此同时，程潜派遣亲信李明灏和柳漱风秘密前往长沙先行招生，为即将成

立的军校储备生源。

李明灏、柳漱风和程潜同属湖南醴陵籍，都对醴陵有着特殊感情。因此，当李明灏、柳漱风抵达长沙后，决定由李明灏坐镇长沙面向全省招生，柳漱风则继续前往醴陵定向招募醴陵籍学生。

柳漱风抵达醴陵县城时，已经是11月下旬，他在入住维新旅社后便通过一些特殊渠道（如教育界和商界的进步人士）散布消息。由于是广东革命政权的军校招募学生，很快引起了醴陵地区不少进步学生的关注，当时正返乡省亲的傅正模便是其中之一。

傅正模的父亲傅学知是革命元老，又曾与程潜有过一面之缘。当傅正模试探着向父亲提出南下投考革命政权军校的想法时，傅学知当即表示了赞同之意。有了父亲的许可和支持，傅正模便毅然前往维新旅社找柳漱风报名。

三天后，傅正模根据通知于上午8时前往醴陵县城的涑江学堂参加考试，考试内容是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四门笔试以及口试。由于傅正模在就读初中时成绩优良、身体素质过硬，加上父亲所灌输的革命理念，使他顺利通过考试，

此后又根据指示前往长沙育才中学集合。

傅正模抵达长沙后，结识了在长沙通过考试的陈赓、李默庵、宋希濂、刘戡和李文等人。他们一同前往育才中学集中，接受李明灏的训话。李明灏先是对录取的学生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随后介绍了革命根据地广州的一些情况。最后，李明灏强调“革命政府还很穷，不能发给路费，需要你们自筹。你们可以分批地走，二三十人一批、十几人一批都可以，可以自行组合，希望能在半个月内动身，到广州后会有人招呼你们”。当李明灏告诉他们前往广州的路线后，傅正模便立即返回醴陵筹措路费。

考虑到当时的粤汉铁路只修到衡阳，湖南军阀又与广东处于战争状态，如果要从湖南进入广东，势必会遭到军方的盘查，还有被指为奸细的风险。即便避开军方，又很容易遭到湘南土匪的威胁。因此，要从湖南进入广东，只能先北上汉口，经水路至上海，再南下香港转广州。

1923年12月下旬，傅正模在拿到父亲提供的路费后，前往长沙小吴门火车站与陈赓、李默庵、宋希濂、潘佑强、彭

杰如、文志文、肖赞育、胡琪三等人汇合。

这支队伍由陈赓领队，他们登上火车先是北上前往武昌，随后坐轮渡抵达汉口，两天后，乘坐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火轮沿长江一路顺流而下到上海，三天后又乘坐外轮从海上南下前往香港，再继续乘船前往广州。整个行程历时近20天，抵达广州时已经是1924年1月中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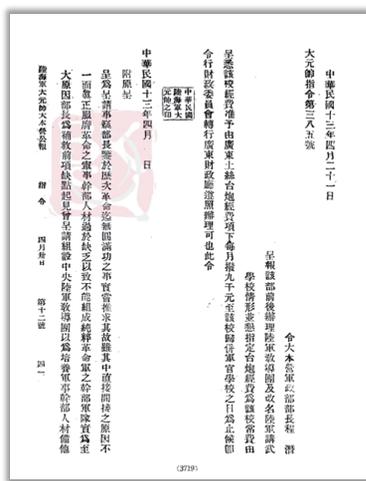
傅正模等人了解到孙中山要开办一所军校（即后来的黄埔军校），目前仍在筹备，便都以为他们是即将进入这所军校的学生。考虑到军校还在筹备，便相约耐心等待下去。殊不知由李明灏等从湖南招募的学生即将进入的是由程潜督办并兼任校长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而不是传闻中的黄埔军校。讲武学校由程潜定下位于广州小北登峰路上的北较场作为校址，但因原有营房较为破旧，正在维修，一时无法把学生安排进去，也不能开学。学生统一暂住越秀公园东北角的关帝庙，所需一切费用都由军政部承担。

讲武学校初习武

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基

础是先期成立的陆军教导团。校本部设有秘书室、教务组、总务组、军需组（兼管军械）、医务组。兼任校长的程潜任命军政部军衡局局长胡兆鹏、大本营直辖陆军第4旅旅长张振武兼任副校长，军政部军需局局长周贯虹兼任监督，铨叙科科长李明灏兼任教育长。为了充实教职人员队伍，程潜以军政部部长的身份从各处军政机构中抽调优秀人员，其中不乏当时的“名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来担任队职或教官。

讲武学校的第1期学员有400余人，生源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从湖南秘密招考的青年学生；其二是陆军教导团的学兵；其三是从驻广东的滇、粤、桂、湘各军招收的没有接受过军事教育的下级军官和军士。程潜根据三部分学生的实际情况，决定编成4个队。其中第1队、第2队由湖南青年学生组成，考虑到这些学生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因此在教授时学科、术科并重，以大教程（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为主，预定学习时间为一年。其余人员编为第3队、第4队，由于这些学生都受过军事训练，有的还有多年行伍经验，



教导团改名为陆军讲武学校的大元帅令。

因此主要实施术科教育，以小教程（典范令）为主，预定学习时间为6个月。

1924年4月24日，讲武学校终于正式开学了。然而，对于等待许久的不少青年学生来说，这个时间拖得太长了。在此之前，孙中山授权由蒋介石任校长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也开始公开招募学生，这直接导致一些已经等得不耐烦的青年学生改考了黄埔军校，例如陈赓和宋希濂。他们进而又动员其他学生改投黄埔军校，不少人因此动心，且采取各种方法投奔黄埔军校。

对于傅正模来说，陈、宋的邀请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在舆论宣传上，即将开学的黄埔军校从各个方面都要好

过讲武学校。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孙中山真正要重点发展的革命军校。但是，傅正模和大部分学生都决定留下来继续等待讲武学校开学之日，他们认为讲武学校主要以湖南人为主，大部分同学虽然还没有一起学习，但在等待开学的几个里已经相识，有的还成为知交好友，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照应。加上他们已经受到程潜、李明灏等人的安置和照顾，自然不便再投入一点都不熟悉的黄埔军校。就这样，傅正模等人终于坚持到了开学之日。

开学当天，400余名学生列队整齐。他们穿着崭新的草绿色卡其布军服，头戴无边军帽，精神抖擞地参加了开学仪式。根据校方的分配，傅正模被编在第1队（队长廖士翘）第1区队（区队长林柏森）。在同一区队学习的还有左权、蔡升熙、陈明仁、李默庵、刘嘉树、刘戡、张镇等人。当时校方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给每名学员配备了一套单棉灰布军服、一套草绿卡其布军服、一副绑腿、一双皮鞋、两条军毯、一床白被单、一件雨衣、一支广州石井兵工厂制造的七九步枪，以及配套的50发子弹。

每天，在炽热的阳光下，傅正模紧咬牙关，和同学一起全副武装地从黄花岗或瘦狗岭到军校往返跑步。通过艰苦的训练，傅正模的体格越来越适应军旅生活。严格的训练使讲武学校声名远播，然而校方的管理却依然沿袭旧军阀的作风。学生如果违反纪律，队长和区队长便使用随身携带的军刀施以背砍的惩罚，至于拳打脚踢、负重长跑、跪打手板等更是家常便饭。几乎同时开办的黄埔军校则以政治教育为特色，以理服人的教育方式显得十分人性化。两相比较，使讲武学校逊色不少。

事实上，讲武学校注重的是军事教育。程潜主张军人不问政治，他的目标是将军校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基层队职军官，疏忽了对学生的革命理念教育。在政治教育方面，校方仅仅印发了关于三民主义的小册子。上政治课时，政治教官照本宣科，显得十分乏味。校方的这种安排，使不少立志革命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因此，不少学生私自跑出学校，前往广东大学听孙中山或廖仲恺的政治演讲。在此期间，他们与同样来听课的黄埔军校学生打成一片，并在交流中对黄埔军校加深了了

解，这也促使更多的讲武学校学生逐渐萌生了改投黄埔军校的想法。

1924年10月10日，第3队和第4队学生按照教学计划完成学业，并在孙中山的亲自主持下受领毕业证书。这些学生此后被分配到攻鄂军（程潜兼总司令）所属各部见习，一个月后派任连长、排长、军需官、副官、书记员等职。攻鄂军中不少军官的军阀习气较重，使不少已经在军校训练中领教过惩罚手段的第1、第2队学生倍感失望。在黄埔军校学生的影响下，希望改入黄埔军校继续学业的想法成为大部分讲武学校学生的愿望。

1924年10月，在广东商团叛乱期间，讲武学校第1队和第2队学生在14日夜奉命开赴广州市区维持治安。这些学生进入市区时与同样奉命维持治安的黄埔军校第2队和第3队学生相遇，彼此都以演习为由，要求市民不要惊慌，默契地完成了任务。在这次交流中，傅正模等人获悉黄埔军校即将成立教导团，这是由孙中山亲自过问并抽调进步军官组成的革命部队，而能进入该部服务的只能是黄埔军校的优秀教职员和学生，这使包括傅正模在内的不

少讲武学校学生萌生了请求并入黄埔军校，并在黄埔军校毕业的想法。

商团叛乱平息后，讲武学校有传闻第1、第2队学生将提前毕业，并被分配到建国赣军任职。这一突发情况使众学生更加失望，如此事属实，那想要投身黄埔军校的愿望将成泡影。为了并入黄埔军校，第2队的同学张伯黄最先付诸行动。他在同学之中进行串联，并趁所有同学在教室晚自习的机会号召有志并入黄埔军校的同学开会商讨出路。

会上，张伯黄极力主张同学们联名请求讲武学校的校方同意将第1队和第2队学生并入黄埔军校继续学业。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赞成，他们推选出12位同学作为代表，连夜偷偷跑出讲武学校进行活动，做好申请并入黄埔军校的准备工作。这12人以陈明仁为首，其余同学有张伯黄、胡焕文、杨润身、刘梓馨、文起代、胡琪三、李默庵、袁朴、谢任难等人，傅正模亦是其中一员。

傅正模等12人在寻机离开讲武学校后集中于华宁里的客栈中。第二天一早，众人便一同前往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

廖仲恺家中，希望能得到廖仲恺的支持。接着，他们又拜访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秘书，并成功说服这位秘书代为请求鲍罗廷给予支持。第三天，12人一同前往黄埔军校位于长堤的办事处，在得到准许后乘坐“南洋”号轮船抵达黄埔岛，得到总值星官钱大钧的接见。钱大钧当即表示会将请求转达给蒋介石，并要傅正模等人返回广州市区等待消息。随后，12人通过外出采购食物的同学，将进展传回了讲武学校。

在傅正模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同意了讲武学校学生希望并入黄埔军校完成学业的要求。但是，当蒋介石派遣代表与监督周贯虹接触时，遭到了周的严词拒绝。而且周贯虹在知悉事情经过后，下令将傅正模等12人予以开除，并扣押了带头的陈明仁。

开除和扣押事件发生后，讲武学校的学生群情激愤，纷纷抗议。当时的总值星官李国良无力制止，不得不把陈明仁从禁闭室里提出来给学生讲话，要求学生立即解散回去睡觉。校方见事情已有无法控制的迹象，便由区队长林伯森、惠济、乐钧天在第二天出面调解，以校方取消开除和扣押为条件，

让学生全部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陈明仁、傅正模等人则认为校方采取手段过激，且曾经对廖仲恺和鲍罗廷派出的代表许诺不对12名代表作出处罚，因此认为校方出尔反尔，毫无信誉可言。于是，12人在陈明仁的带领下甘愿被开除，连夜离校，跑到一所小学借宿。次日一早又将军服脱下，交回学校以示决心。与此同时，陈明仁等人又前往黄埔军校请求加快办理并入事宜，并继续依靠外出采购的同学返回校内联络，商定每天推出12人作为代表与校方交涉，如被开除，次日再派12人。经过三天，又有36人被校方开除。周贯虹见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尽管他声泪俱下地请求剩余学生留校完成学业，亦无济于事。

周贯虹被迫接受现实，同意将讲武学校第1队和第2队学生并入黄埔军校另行组队完成学业，但他也要求蒋介石不得收留第一批被开除的12名学生。也就是说，傅正模等12人虽然为同学们争取到并入黄埔军校继续学习的机会，但他们却因周贯虹的强烈要求而很可能无缘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新天地

1924年11月19日上午8时，讲武学校除去已经离校另谋他就的学生外，计有148人列队出发前往南堤码头。在那里，他们静静地等待着黄埔军校派来的接收代表、他们曾经的教官王俊的到来。

在这148名学生中，傅正模等12名促成合并的代表也赫然入列其中。根据讲武学校和黄埔军校的协议，傅正模等12人是必须排除在并入黄埔军校学生之列的人员，此时怎么会出现在队伍中呢？原来，当周贯虹向蒋介石提出这项要求时，蒋介石在孙中山的许可下，为了稳住周贯虹并尽快促成合并事宜，便示意商谈代表王俊答应其要求，待学生按照协议离校后再把傅正模等12人编入队伍，等周贯虹发现想要反悔时已来不及了。正因如此，傅正模等12人才会出现在这里，并使他们免除责罚，成功进入黄埔军校继续完成学业。

在王俊的带领下，讲武学校的学生分乘两艘小火轮向黄埔岛驶去。登岛时，岛上茂密的大树、青翠的草丛使学生们感觉神清气爽。不久之后，学生们止步于一排洋房前，正前方大门上“陆军军官学校”六个

队长，正是先前迎接他们入校的王俊。

入学当天，蒋介石组织军校教职员在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他勉励学生们要继续专心学习，为将来国民革命的胜利打好基础。此外，蒋介石还带领众人一起朗诵孙中山所写训词，接着又领唱黄埔军校校歌。

李默庵回忆，校方除了举办欢迎仪式外，为使第6队学生尽快融入黄埔军校，不仅要求教职员和已有各队学生与第6队学生加强交流，课余活动也要做好合理“衔接”。在住宿安排上，校方特地将离校本部最近、房子较好的第5队学生宿舍腾空，改由第6队学生入住。每天早晨出操，校军乐队为第6队奏乐迎送，校方领导也赶来参加，这一方面使人感到出操、训练是很神圣庄重的事情，另一方面也让第6队学生感受到校方的欢迎和重视之意。

第6队下辖三个区队，分别由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的周振强、冯剑飞和王副乾担任区队长。傅正模和另外46名同学编在了周振强的第1区队。12名并校代表中，陈明仁、李默庵、张伯黄、谢任难、刘梓馨、胡焕文、袁朴被编入第1区队，

杨润身和胡琪三被分配在第2区队，文起代被分配在第3区队。

根据校方要求，第6队成立时学生要集体加入国民党，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学生的理想和信念使一部分人选择加入了共产党。第6队学生因政见不同开始分为两派，即便是12名并校代表也因信仰不同而分别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些人中，傅正模、陈明仁、袁朴、胡焕文、刘梓馨、胡琪三决定加入国民党，李默庵、张伯黄、杨润身、文起代、谢任难则决定加入共产党。

第6队学生在讲武学校时，军事课程的学习其实已近尾声。因此当他们进入黄埔军校后，主要以政治课程为主，军事课程仅是增加演习次数和稍加补习。第6队的政治课程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三民主义浅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中国国民党史》等。

李默庵曾回忆：“这些课程，理论不是很深，联系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学后使人眼界大开，思想很受震动，颇有收益。授课的方式主要是由政治教官讲授，开展政治讨

论，进行自习和考试等。当时的政治教官水平很高，课讲得也好，特别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常常亲自为我们讲课。”傅正模等第6队学生，就这样度过了紧张而又有趣的两个多月黄埔军校生活。

1925年，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决定抽调部队组成联军出师东征，黄埔校军因成立不久，训练时间短，所以一开始未被列入东征军序列，经蒋介石和廖仲恺的力争，方获准加入右路军。

2月1日至3日，黄埔校军以教导第1团和第2团为主力，第2期学生总队和第3期入伍生总队第1营等部为预备队，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分三批由黄埔岛乘船出发，参加第一次东征。

黄埔校军作为右路军右翼攻击部队，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东莞。校军开拔之际，士气高昂，他们列队整齐，高唱校歌，怀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向着目标前进。2月4日，校军顺利占领东莞，师生士气倍增。2月10日，校军在平湖又击溃了救粤军第5军。

2月14日，校军和建国粤军将淡水城包围。第2期学生总队在经过平湖大捷后，都想

直接参加实战，为攻占淡水作出贡献，因此，包括傅正模在内的学生80余人主动申请加入到攻城奋勇队中。

2月20日，校军接到命令继续向平山方向对节节败退的陈炯明救粤军发起追击时，傅正模所在的第2期第2队接到了在淡水就地毕业的命令。

第2期学生在教学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应于9月6日毕业，为什么蒋介石会让第2期学生提前毕业呢？原来，为了适应党军的不断发展，以及东征时各部队因伤亡需要补充基层军官等原因，蒋介石决定让已经接受过完整军事教育的第2期学生总队步兵第2队学生，即原本由讲武学校转入黄埔军校的这148名学生提前毕业，第1队和第3队学生则仍然按照原计划继续施以军官速成教育。更让傅正模等第2队学生意外的是，第2队奉命脱离第2期，改列入第1期，并恢复原先第6队的番号。至于第2期第3队则同时改称为第2期第2队。

也就是说，诸如周振强这样原本作为学长的区队长，反而与傅正模成为同期同学。不过由于第一次东征的继续，以及此后杨希闵、刘震寰两部的叛乱，使得第1期全部5个队

的学生在5月20日才正式领取毕业证书，至于毕业仪式则又推迟到了6月25日才予以补办。

值得一提的是，第6队虽然没有和前4队共同学习过，但在毕业生中同样名将辈出，除了傅正模外，著名者还有左权、蔡升熙、陈明仁、刘戡、李默庵、陈大庆、丁德隆、刘嘉树、刘咏尧、王劲修、彭杰如、李文、李铁军、梁恺、张镇等人。

傅正模在淡水结束了学业，这也意味着他将正式踏入军官的戎马之途。在当时，被分配到野战部队是一种十分崇高的荣誉，因此有关系的学生已经取得了这一荣誉，而那些等待分配的学生也大都书写报告，申请进入野战部队服务。傅正模自然是申请者之一。但当分配命令下达后，却使他很失落，因为他被调回军校去了。

校方认为，傅正模在学期间术科成绩优秀，且作风正派，返校任职有利于对后续入学的黄埔学生树立正确的军人形象。傅正模戎马生涯中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入伍生总队第2营第5连第3排少尉排长。

在当年讲武学校的12个学生代表中，袁朴被分配到教导第1团当少尉排长，陈明仁

到教导第2团当少尉排长，胡琪三到教导第3团当少尉排长，张伯黄到广宁农军当少尉助教，李默庵、谢任难到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尉宣传员，胡焕文、刘梓馨、文起代三人则与傅正模一样被分配到入伍生总队当少尉排长。在与分配到野战部队任职的同学们道别之后，傅正模与李默庵、陈明仁等人收拾行囊，踏上了返回黄埔军校的路途。傅正模从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到黄埔军校的就学历程也就此结束。

（作者傅克刚为傅正模幼子，傅小平为傅正模长孙）

主要参考资料：

- 1.《傅正模将军传》傅克刚、胡博著，香港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 2.《黄埔军校年谱长编》陈宇编著，华文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 3.《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和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 4.《国民革命军东征文献》惠州市档案局（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6月版。
- 5.《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李默庵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版。

哈军工创建和发展中的黄埔军校学员

□ 李世辉

1924年6月，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这是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新型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被誉为“将帅的摇篮”。毛泽东曾以不同视角对黄埔军校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肯定。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强调：“从前有个黄埔，那里表现着一种朝气，这种朝气也就代表着一种倾向。黄埔和陕公一样，同学是从各地方来的，又分布到各地方去。那时的黄埔是要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它是那时中国进步的缩影。我们陕公的方向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这个方向我们要坚持下去。”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强调：“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它教成了几万个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它还要造就大

批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29年后，即1953年9月，为培养军事技术军官、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苏联的援建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技术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在哈尔滨成立。毛泽东曾说要把哈军工建设成中国的第二个黄埔军校。哈军工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高层次人才。哈军工办学13期，共培养了12000多名合格毕业生。据不完全统计，哈军工走出的两院院士有30多位、省部级以上领导20多位、将军200多位，其成才比例之高，堪称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奇迹。

黄埔军校的创办，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它为国共两党培养了许多军事将领和军事骨干，为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对中国军事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黄埔军校培养的学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军

事技术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与发展，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黄埔1期学员、哈军工首任院长陈赓大将

毛泽东一直认为，办好一所军校，首先是选择一位好校长。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1953年3月26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粟裕上报的《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中作出了“同意”的批示后，谁担任院长、牵头创办军事工程学院成为首要问题。中央领导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亲自点将，决定从朝鲜前线调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陈赓，委以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重任。

为何选择陈赓担此重任，可以从1952年6月2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会见陈赓的对话中得出一些答案。在会见中，毛泽东告知陈赓，经过商量由他担任院长兼政委负责

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当陈赓表示恐怕难以担此重任时，周恩来说了陈赓可以胜任、是我军最适合人选的理由，即“你住过黄埔军校，办过红军步兵学校，还带过红军干部团，你干不了，别人连你这点经验也没有啊”。可见陈赓的黄埔军校经历，是中央遴选他牵头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同学录》（1924年5月—1924年11月30日）中记载了陈赓如下基本信息：陈赓，年龄20，籍贯湖南湘乡二都，通讯处湖南湘乡二都柳树铺羊吉安陈立本堂交。陈赓1944年5月29日撰写的《我的自传》中简要回顾了自己报考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等经历：

是年底（即1923年年底，笔者注）党派我至上海转广东，投入程潜所办之陆军讲武学校。一九二四年K·M·T（即国民党，笔者注）改组，创办黄埔军官学校。我以革命青年不应该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积极主张武校（即陆军讲武学校，笔者注）合并军校，我并以身作倡，首先退出该校，考入黄埔。是后武校同学相率来归，以至全校合并黄埔，



/ 陈赓。

改编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充学校入伍生连，第三期副队长，第四期步科连长。

陈赓在自传中没有提及自己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的优秀表现，这是革命家的一种自谦。2007年7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陈赓传》中有关陈赓被誉为“黄埔三杰”的权威阐述：黄埔军校第1期有600多学生，而陈赓却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这不是当时学校领导封的，是被学生们所公认的。他们3人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作战身先士卒，各方面起表率作用，是群众自动推举出来的领袖人物。当时人们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这不仅肯定了“三杰”的地位，还说出了他们的特点。

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委任

陈赓创办军事工程学院，是英明之举。陈赓在军事工程学院筹建之初就公开表示：“我办不好军事工程学院，誓不为人。”如果没有这位好院长，就不能在那样短的时间，以那么高的速度和质量建设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高级军事工程学院。这可以从当年诸多参与创办、建设哈军工的人物回忆中得到答案。开国少将刘居英，1954年2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他是陈赓主要助手和接班人，是军事工程学院第二任院长。2002年9月，他在《深切怀念陈赓同志》的发言中表示：

从1952年开始建设，1953年就开学了。这个速度别说不懂行的，就连懂行的都摇头，都说这个速度根本办不到。我们哈军工的老同志一致认为离开陈赓谁也办不了。他找总理签字要人，敢把总理堵在洗手间里让总理签字，谁敢！办哈军工只有靠他。哈军工能够办成、办好，陈赓同志是第一功。

开国少将李懋之，协助陈赓全程参与了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工作，且多年担任学院副院长，他在回忆录《陈赓大将

创建哈军工》中谈道：

陈赓大将是哈军工的建院元勋，是哈军工的军魂。没有陈赓，不可能在三四年内高速度、高质量、高标准地建成60万米的一流校舍；没有陈赓，不可能在三年内建设起2000多名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使军工成为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典范，没有陈赓，不可能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教员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提高了大家办好学院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没有陈赓，不可能使学院很快走上正规化，形成哈军工特有的优良传统作风；没有陈赓，不可能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接见、关心、支持和指示建院方针，使学院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援，高速度地完成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建任务。

195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出通知：任命陈赓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仍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并未因在北京而放松对军事工程学院的领导工作。除了函电电话指示工作之外，军事工程学院人员凡去北京都向陈赓汇报学院工作情况。陈赓也抽空回军事工程学院几次，指导



/ 李懋之。

工作。1960年11月8日，陈赓抱病坚持给主持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的领导和党委写信，对调整后的学院工作提出六点建议：(1)抓思想；(2)发挥老教授的积极性；(3)培养更多更好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科学队伍；(4)大力抓科学研究工作；(5)要改善教师、学生的生活；(6)要给教授、教员、学生以充分研究和自习的时间。1961年3月16日，陈赓因心脏病治疗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58岁。陈赓虽然去世了，但他的办学思想——对祖国，以祖国需要为第一需要、心怀国之大者；对教师，海纳百川、择天下英才而重用之；对学生，以教学为中心、培养又红又专人才；对干部，大胆任用、放手使用；对技术，瞄准尖端、敢

为必成等，一直引领着军事工程学院的发展，至今仍是军工分建高校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哈军工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埔军校3期学员、哈军装甲兵工程系创系系主任徐介藩少将

1952年6月3日，周恩来总理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写信，提出了派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要求。两国政府经过谈判，签订了关于援助中国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协议。7月底，苏联政府派来以奥列霍夫空军中将为为首的四人专家设计组。8月5日至31日，陈赓院长和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徐立行，同苏联专家设计组乘飞机到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南京、上海，最后回北京，调查研究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条件。最终专家组认为，鉴于目前的技术力量，不可能同时开办各军兵种的军事工程学院，只能办一所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学院按军兵种设5个系，即空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海军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工兵工程系。显然，如何找到适合的人才，担

任以上5个系的系主任、领头人，成为军事工程学院开张运行的重要前提。最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五大系系主任得以配齐：一系空军工程系，系主任唐铎；二系炮兵工程系，系主任赵唯刚；三系海军工程系，系主任黄景文；四系装甲兵工程系，系主任徐介藩；五系工程兵工程系，系主任唐凯。5位系主任均为专家型领导，其中3位有留学经历，唐铎、徐介藩均在苏联工作20多年，赵唯刚在苏联和日本都留过学；3位后来成为开国少将，分别为唐铎、徐介藩和唐凯。

其中四系装甲兵工程系系主任徐介藩为黄埔军校3期学员。黄埔军校学员作为军事工程学院五大系之一的创系主任，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黄埔军校学员对学院发展的贡献。

徐介藩，原名徐齐邦，1901年7月21日出生于安徽省灵璧县南蒋庄。1923年9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安徽军阀镇压革命运动，徐介藩等30余人被开除学籍，并遭到通缉。在安徽一中老师掩护下，逃往南京私立东南高级中学，插班就读高三，此时改名徐介藩。1924年夏，徐介藩报考东南大学，学校得知他是被安徽当局



徐介藩。

通缉的学生，拒绝录取。于是，徐介藩回到家乡固镇，其间他得知老朋友许继慎、彭干臣等人都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于是南下报考黄埔军校。1925年1月，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步兵科入伍生第4连。在《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通讯录》（1925年1月至1926年1月17日）中记录了徐介藩的基本信息：徐介藩，别字戒繁，年龄23，籍贯安徽灵璧，通讯处津浦固镇来永。从黄埔军校第3期起，军校实行入伍生制，将1200多名学生编入入伍生第1、第2、第3营，接受入伍训练。1925年6月，编为正式学生，改设3个大队，内分为9个步兵队和一个骑兵团。所以徐介藩也是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入伍训练教育之后，于1925

年6月被正式转入黄埔军校第3期步兵科。在黄埔军校期间，陈赓作为中共黄埔军校负责人之一为徐介藩履行了入党手续，实现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作为黄埔军校在读学生，徐介藩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之役，参与援助省港罢工等，以上经历为他之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1925年底，徐介藩转入广州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

1926年6月，在苏联顾问建议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选派航校部分学员到苏联留学，徐介藩被选送到苏联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学习。1928年10月，徐介藩奉命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年级插班学习政治。后来徐介藩被先后安排到苏联公安部、共产主义国际东方部工作。1948年3月，徐介藩申请回国获得苏联批准，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祖国。回国后，基于徐介藩在俄语方面的特长，中共中央东北局提议，后经罗荣桓拍板，安排他到东北编辑局担任俄文编辑，出任《毛泽东选集》俄文总编辑。1949年2月，调至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工作。1946年6月，徐介藩随刘少奇带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出色完成了笔译

以及日常总务工作。1949年10月，徐介藩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级参赞。1949年底至1950年初，随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出色完成了俄文笔译工作，为顺利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出了贡献。1950年6月，根据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在苏联赤塔设立领事馆，党中央派徐介藩前往赤塔筹建中国总领事馆，出任总领事兼党支部书记。1951年4月，中央把徐介藩从外交系统调到朝鲜前线，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翻译，协助彭德怀处理日常军务。

1952年6月，徐介藩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后经周恩来总理推荐，参与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基于徐介藩在苏联学习航空的经历，陈赓最初决定让他担任空军工程系主任。所以1953年春，徐介藩的主要工作是筹建空军工程系。5月，唐铎来到哈军工，陈赓权衡再三，考虑到唐铎在苏联空军服役28年，又是军校教官和航空兵器专家，就与徐介藩商量，拟调整他和唐铎的工作岗位。徐介藩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调任装甲兵工程系主任。那时候这个系才79人，困难很多，他与系政

委江洪涛密切配合，为创建装甲兵工程系努力工作。徐介藩工作作风民主，生活简朴，全力抓教学科研，想尽办法引进人才，博得各方面一致好评，为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59年11月上旬，陈赓经过深思熟虑，正式向中央军委建议，为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形势发展要求，建议把军事工程学院常规兵器系和某些系里的常规专业分别交给有关军种、兵种，帮助各军种、兵种单独建立自己的工程技术学院；军事工程学院集中力量办尖端专业，为军队建设培养更高级的科技人才，也就是后来的“尖端集中、常规分散”方针。同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作出决定，将军事工程学院的炮兵、装甲兵、工兵3个工程系分出，分别成立炮兵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于1960年11月至1961年5月分4批前往西安，成立装甲兵工程学院，徐介藩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从1952年年底到哈尔滨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到1961年5月离开，徐介藩在军事工程院工作了近10年，是军事工程学院具有代

表性的建院元勋、名将名师。

黄埔军校6期学员、哈军工五系教员黄德馨，黄埔军校4期学员、哈军工高级俄文翻译王剑秋

关于黄埔军校6期学员、军事工程学院工兵工程系教员黄德馨，黄埔军校4期学员、哈军工高级俄文翻译王剑秋，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当中，没有太多的信息。目前仅能从哈军工校史专家滕叙究先生所著《哈军工传》中看到一些记载。

黄德馨，1907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工兵科。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同学录（第一总队）》（1928年4月23日至1929年5月15日）中记录了黄德馨的基本信息：黄德鑫，别号绍义，年龄21，籍贯湖北应城，通讯处应城北街鸿胜永转。1929年8月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选派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明治大学数学研究馆、日本陆军炮工学院深造4年。1933年10月学成归国，任工兵学校教官多年。黄埔军校14期工兵科学员钟汝轼在晚年回忆文章《我的黄埔生涯》中写道，他于1938年2月初考入黄埔军校第14期工兵科；1938年2月下旬，他

们转到江西靖江，编为工兵学校学生队第1连第3排进行步兵基本训练，队长为黄埔军校6期学员黄德馨，连长为黄埔军校7期学员姜翼龙。滕叙究先生所著《哈军工传》中指出，黄德馨抗战时一边率部抗击日军，一边加紧培训学员，成为当时中国工兵界的著名专家。1948年升任国民党工程署副署长、中将衔署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黄德馨于1949年在昆明弃暗投明，毅然参加云南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军事工程学院成立后，黄德馨在工兵工程系担任教员。

1953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给军事工程学院颁发的《训词》中强调：“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当时基于国内的基础和条件，建设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技术院校非常困难，要想“尽快上马、快出人才”，寻求苏联帮助是必经的途径。哈军工的校史记载：从1953年4月至1960年8月，苏联选派来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的苏联顾问、专家累计158名。其中1953年8名，1954年54名，1955年20名，1956年7名，1957年30名，1958年39名。



/ 黄德馨。

由此，在全国选拔高水平的俄文翻译，能将苏联选派的顾问、专家的高深专业知识，以及他们的见解、主张、思想等准确翻译出来，成为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军事工程学院遴选的诸多高水平俄文翻译中，有一位具有黄埔军校学员身份，这就是1952年8月陈赓亲自挑选的军事工程学院高级俄文翻译王剑秋。通过《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同学录》（1926年1月17日至1926年10月）可知，王剑秋当时在步兵科8连，基本信息如下：年龄25，籍贯山西临晋，通讯处山西临晋县航子镇。哈军工校史专家滕叙究先生所著《哈军工传》中记录，王剑秋是山西省临晋县人，1925年从西北大学投考黄埔军校，为黄埔第4期生，192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

（作者为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资料：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任学文《永远的“哈军工”》，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李懋之《陈赓大将创办哈军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陈赓《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

《陈赓传》，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7月版。

《陈赓大将纪念文集选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滕叙究《哈军工传（上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7月版。

滕叙究《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8月版。

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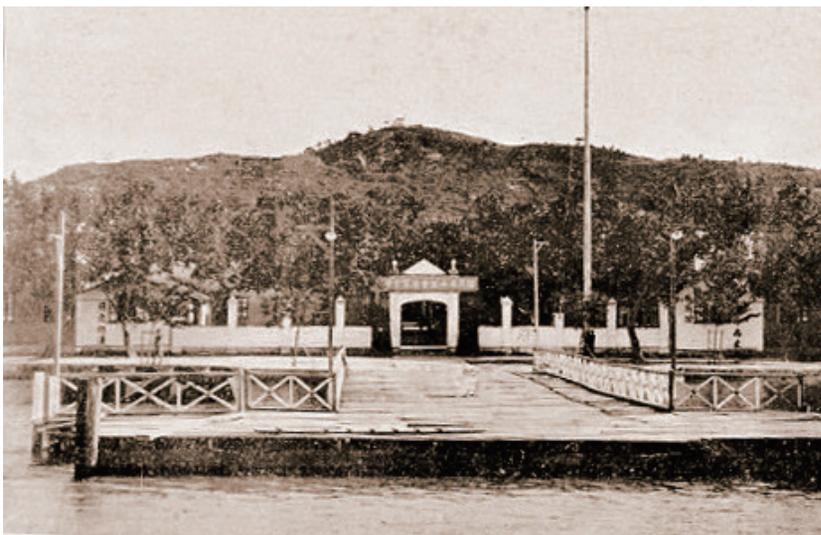
吴新明《王牌军校——哈军工》，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黄埔军官学校”校名之佐证

□ 单补生

黄埔军校在广州黄埔时期（1924—1930），校名自“陆军军官学校”始，先后易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最后以“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结束，校门一共悬挂过四块牌匾，校名均为民国元老谭延闿所题。那时民国元老中以书法著名的有于右任、张人杰、谭延闿三人，因于右任、张人杰两人不在广东，故向谭延闿敬求墨宝。谭延闿书法取意唐代颜真卿，得浑厚灵逸之妙。其楷书点如坠石，划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竖画多用悬针法，起笔沉着稳重，顿挫有力，使人感到貌丰骨劲，味厚神藏。

笔者为搜集黄埔史料，常奔波于各旧书店，时有收获。旧书店的魅力，是与它坚持开架售书分不开的。光顾者可站在书架前，自由自在地随意翻、拣、查、阅，哪怕一本不买，也不用担心店主给脸色看，生意人讲究进店为客，待客生财。有一次逛东安旧书店，在民国版书架上意外翻出一本“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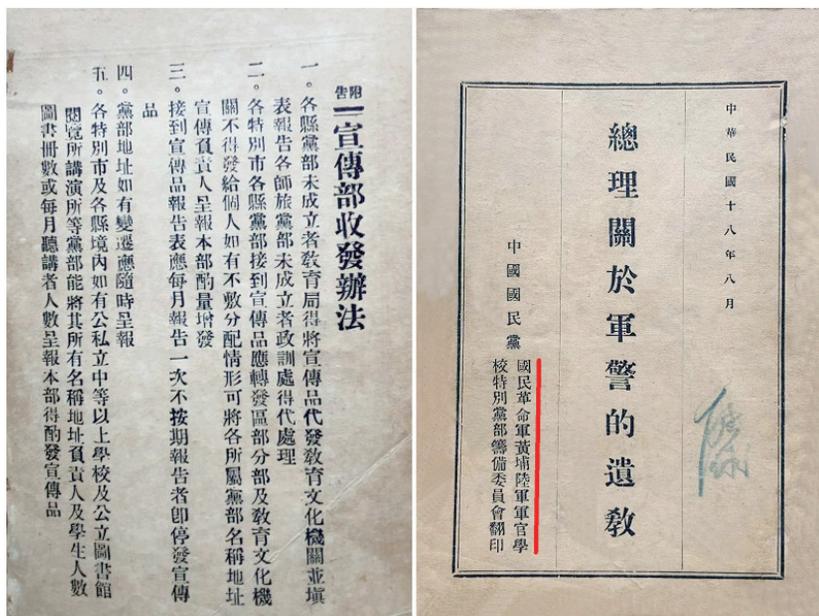
/ 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牌匾。

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材，书名《总理关于军警的遗教》，铅印，32开，平装，240页，1929年8月由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特别党部筹备委员会翻印，承印者是广州市财政厅前的光东印务局（又称光东印务书局，1928年设立，1931年停办，出版期间曾为军校印制政治军事教材），封面右下处有蓝笔签名“雁冰”二字。据店主讲：“这是沈雁冰——著名作家茅盾的笔迹。他1927年曾当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28年7月，离沪赴日。1930年4月，从日本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书记。此书页面干净无公章私印，有附告说明，属私藏外流。”

该书封二为附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收发办法》：

一. 各县党部未成立者，教育局得将宣传品代发，教育文化机关并填表报告；各师旅党部未成立者，政训处得代处理。

二. 各特别市、各县党部接到宣传品，应转发区部分部及教育文化机关，不得发给个人。如有不敷分配情形，可将各所属党部名称、地址、宣传负责人，呈



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材。

报本部酌量增发。

三. 接到宣传品报告表，应每月报告一次，不按期报告者即停发宣传品。

四. 党部地址如有变迁，应随时呈报。

五. 各特别市及各县境内，如有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及公立图书馆、阅览所、讲演所等，党部能将其所有名称、地址、负责人，及学生人数、图书册数或每月听讲者人数，呈报本部得酌发宣传品。

读后细品店主所说“雁冰”签名本的来路，似信非信，有待考证。

是书收录1912年至1923

年孙中山先生对南北方军警界演讲21篇，其中有篇《在北京军警界欢迎会上之演讲词》，时间是1912年9月1日午后1时，地点在北京万牲园（动物园）畅观楼。该楼为皇家行宫，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始建，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竣工，设计者是留学英国海归学士、满族人傅佰锐（1875—1926）。建筑为欧式风格七楹两层，正门上方有珐琅二龙戏珠镶嵌匾额，书楷体“畅观楼”三个大字。楼基座为灰色，楼体为土红色，显得庄重大气。畅观楼两边不对称，东边为圆柱形三层楼，楼顶为一圆形平台，有一圈紫铜制作的欧式花饰栏杆，



/ 北京畅观楼。

在此可俯瞰远处，实为观景台。西边为八角形两层楼，屋顶有一座似中式须弥座的基座，托住八角锥形屋顶。楼内的陈设、器具以西洋式为主，楼上、楼下均有特制的各式沙发。楼西二层东西两室内各置一铜床，帐褥皆黄色，为慈禧、光绪来此休息之所（曾两次小憩）。楼南几步之遥有一座白石小桥，名南熏桥，桥南东侧有一铜狮，西侧有一麒麟，均口能喷水。畅观楼周围环水，绿树掩映，环境清幽，宁静舒适。

北京军警界为孙中山先生

开欢迎会，首选畅观楼隆重其事，由总统府军事处处长冯国璋致欢迎词，孙中山先生致答谢词。孙中山讲述了军警对于国家的意义及责任，并指出：“专制时代之军警，专为保护皇室，残害同胞；共和时代之军警，则为捍御外侮，守卫同胞，共享利益。”会后，孙中山与北京军界欢迎人士合影留念。

笔者认为，黄埔文献史料是认识和研究黄埔校史的基础。本书亮点是封面有校名“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是黄埔7期第2总队冠名，该总队文献

史料存世凤毛麟角，民间难得一见。机不可失，故买之作为研究佐证。

黄埔本校校名之由来

黄埔校史记载：1929年4月至6月间，代校务何遂、教育长李扬敬，政治训练处主任戴季陶先后辞职，中央先派黄珍吾（海南文昌人，黄埔1期）继任政治训练处主任。7月31日蒋介石又委派林振雄为教育长。林振雄（1888—1964），广东惠州人，广东陆小、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0



/ 林振雄。

期毕业。他是孙中山先生任命的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又曾任黄埔军校管理部主任，即由其代行校务。1929年9月10日，蒋介石令本校由“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更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本校直属中央，增加“黄埔”二字，以存黄埔光荣历史。9月18日，蒋介石致电林振雄：“整理校务淘汰腐员，应分几个时期，不可操之过切，致生反感，应付环境可与（黄）珍吾妥商。”1930年1月10日、20日，蒋介石两次致电林振雄要求他速来南京商议。林振雄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示有关事宜，表示“如奉谕回校，即前往整理”。1930年9月7日，蒋介石电令准黄埔第7



/ 黄埔军校孙总理纪念碑。

期学生毕业出校，同日又发电令“第7期毕业后着即停办”。19日，教育长林振雄条谕各部处厅队办理结束事宜。

黄埔本校于1928年5月录取入伍生800余名，编为第7期2总队。12月25日入伍生修业期满，举行升学分科（步炮工）考试。1929年1月14日开始授课训练。1930年8月修业期满，22日实施野外演习，25日至27日为测图学习。9月1日至3日举行战术实施，6日至9日进行学科考试，26日举

行毕业典礼。计毕业学生666名。林振雄在第7期同学录序言写道：“现第七期诸生，又届毕业矣……惟本届同学录出版，适值本校停办时期，循览是编，不无特殊感想，本校今日之命运，已如修蛇赴壑，夕阳在山。”学生出校后，成立校务委员会暂时维持校务，同时由官生协同组织经济审查委员会、保管委员会等，达成了黄埔军官学校停办的善后任务。10月24日，校务结束。尔后，继承黄埔本校光荣革命历史，努力

奋斗以完成孙中山与先烈未竟之遗志的，就是南京本校了。

林振雄教育长平生立定报国宏愿，致力于近代军事教育并卓有建树，其主持工作，决策果断，勇于担当责任。例如，黄埔军校在当年设计孙中山纪念碑时，原没有计划铜像安放其上，建筑设计仅是一座纪念碑。铜像是孙中山生前的日本挚友梅屋庄吉竭其个人资产铸造的四尊铜像之一（南京中央军校、广州中山大学、澳门孙中山纪念馆各一），由日本雕塑家牧田祥哉敬作，筱原金作工场铸造。1930年5月，梅屋庄吉亲自护送赠予黄埔军校的铜像，乘坐日本客轮“大洋丸”抵达上海，转乘“琼州”号轮船，于5月28日到广州。5月31日下午，黄埔军官学校开会欢迎梅屋庄吉先生。有关部门原定在孙中山广州蒙难8周年暨军校建校6周年纪念大会上举行孙中山铜像揭幕典礼，后因纪念碑工程尚未竣工而延期，这时就有了把铜像放在碑顶的动议。纪念碑高19米，雄伟壮观，而铜像高度仅有2.5米，重约1吨。中国传统建筑讲究上下左右的平衡，各类雕塑的主体一般比较高，而基座则相对低矮。军校内纪念碑和孙中山铜像的高



/ 黄埔军官学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

度之比为7.6:1，显然不合惯例。林振雄原拟将铜像放置在纪念碑前，当见到以孙中山向民众发表演讲的姿势为造型，气势磅礴，栩栩如生的铜像时，他决定将之放置纪念碑之上，理由是：“总理为本党民众导师，特择定军校纪念碑之上为建立总理铜像地点，使民众万世瞻仰。”

又例惠州“黄埔军官学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之建立。

1925年10月，东征军进攻惠州城时，以北门为主攻方向，13日部队发起了总攻击。守城敌军约5000人，装备精良，在陈炯明的干将、第6军军长杨

坤如的指挥督战下，负隅顽抗，战斗非常激烈。攻城部队伤亡惨重。第4团团长刘尧宸和副营长谭鹿鸣（共产党员、党代表）英勇牺牲，第一天未能攻入城池。14日，周恩来临临指挥，第1纵队纵队长何应钦亲自督战，终于下午4时许攻克惠州。历时30小时的攻城战斗，东征军牺牲官兵241人，五眼桥附近战地布满了将士的忠骸。

1930年3月，林振雄为缅怀东征阵亡的军校官兵，决定在惠州城北门前方、西湖五眼桥侧建立“黄埔军官学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该碑高约5米，由碑座和碑身两部分组成，

周围以炮弹模型作围栏，炮弹间用铁链相连。碑身为花岗岩，长条方形，正面阴刻楷书大字“黄埔军官学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系林振雄题。碑座四周嵌4块石碑，前后两块为大理石。前面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亲笔手书“精神不朽”，后面刻林振雄题字“气壮西湖”。左右两块墨石均刻有此役牺牲的烈士英名，其中有中将刘尧宸等。该碑曾被毁，1992年10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在五眼桥东侧依原碑模式复建此碑，以彰显黄埔先烈之精神。

孙中山北京记事二则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并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月13日，孙中山为了促成国家的南北统一提出辞职（4月1日正式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新举临时大总统”。7月，袁世凯电函邀请孙中山到北京会见，共商国是，同促民国。

前大总统称先生。1912年8月24日17时30分，孙中山乘坐火车由天津抵达北京前门东车站。当时的前门东车站就在正阳门箭楼东侧，袁世凯为孙中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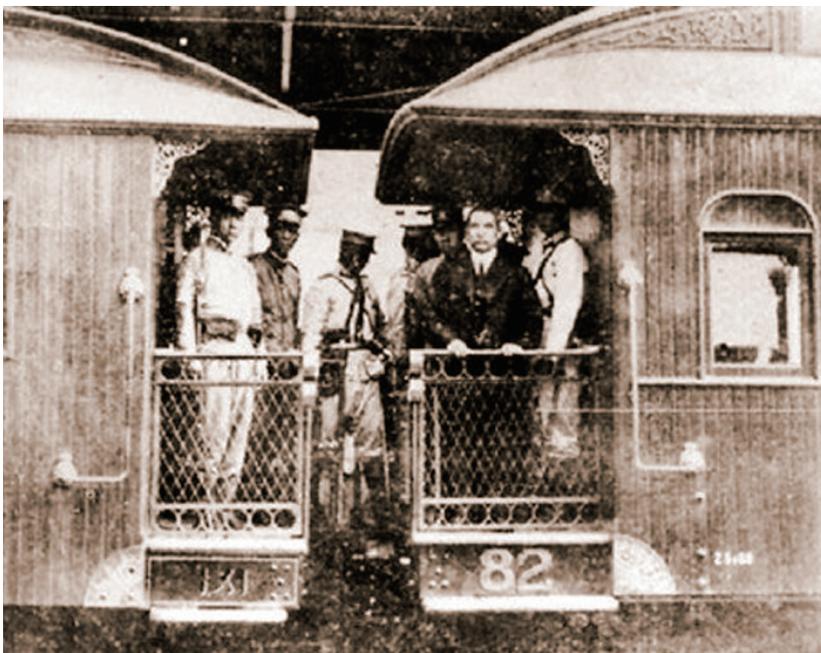
/ 孙中山。

特命开启以前只有皇帝才能通行的正阳门箭楼城门，乘用大总统的朱漆金轮双白马轿车，迎接孙中山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原大总统府）下榻。之前，袁世凯为表示谦卑礼让，自己把大总统府搬迁至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大楼，即今张自忠路北面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内。接待事务由大总统府礼官黄开文主持，有人问：前后两位大总统初次会见如何称呼？黄开文答：“这次大总统谆谆吩咐，对孙中山要恭敬备至，民党对他称先生，我们也要称他先生，一定留心先生面前不要称名道姓。”袁世凯主动先拜会，乘一辆双马轿车来到迎宾馆大门外，黄开文开了车门，对袁世

凯说：“先生在台阶上面专诚迎接总统了。”孙中山乃由内客厅步行出来，站在台阶口准备迎接。当袁世凯走到台阶最高两级时，孙中山向前走两步，前来握手，袁世凯亦肃然趋前握手，说：“先生路上一定很辛苦吧。”两人边说边走到内客厅中间坐下，娓娓而谈。当晚8时，孙中山到临时大总统府出席了袁世凯举行的欢迎宴会。席间，袁世凯亲自为孙中山执盏，略谓：“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孙中山表示：“本人愿在十年之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大总统在同一时期训练精兵一百万。”袁世凯一听，高兴得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回报一声“大总统万岁”。其实，孙中山非常反感“大总统万岁”，之前曾批驳：“万岁”两字本是封建皇帝硬要官民称呼他的，我们革命的先烈为了反抗“万岁”，牺牲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血？所以个人“万岁”要不得。孙中山在京期间，据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描述，双方长谈共计13次，“论事最为畅恰”。9月9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特授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而孙中山也并非

完全放弃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取，只是限于自身实力的不足暂时屈就。

国民党之名缘。孙袁会见第二天（8月25日）上午10时，孙中山第一次莅临北京湖广会馆，出席在京中国同盟会会员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说：“过去革命都靠全国同胞的支持和赞助，不完全是同盟会会员之功。今后搞建设也是群策群力，方能成功。要以调和党见、容纳异才为宗旨。”楼上楼下与会3000人热烈鼓掌，欢声雷动。13时，孙中山又在此参加国民党成立大会。中国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五政党合并组成国民党，发布《国民党政见宣言》，文曰：“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故颜其名曰国民党。”大会因新政纲删掉了“男女平权”这一项而发生争执，孙中山说明是因为合并之各党意见不一致。他认为“男女平权”是对的，此时政纲虽未列入，将来随着国家文明进步，必能实现。孙中山先生演说约两小时，听众掌声不断。大会选出以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理事9人，阎锡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于右任等参议30



/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在离开天津赴北京的列车上。

人。当时各大报馆争先报道，如《正宗爱国报》《民权报》《民立报》《申报》等都登载大篇幅文章。

孙中山北京之行，自8月24日由天津抵达北京，至9月17日离京赴山西考察，历时25天。期间，孙中山出席官方和社会各界欢迎会20余次，还接受了《时报》《中国报》《大陆报》《亚细亚报》《新支那》以及路透社等媒体记者的采访，并会晤各国公使，使同盟会暨国民党在北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在当选正式大总统后，仍视国民党为眼中钉，于11月

下令解散国民党。从此，国民党在国内的组织活动便告停顿。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参考资料：

- 1.《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1936年版，1990年龙文出版社影印。
- 2.《广东省志文物志》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2007年。
- 3.《广州民国日报》1930年5月29日。
- 4.《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尚明轩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



1926年6月5日， 燕塘检阅黄埔军校 第五期入伍生部第一、第二团

□ 贾晓明

燕塘自古为广州城外的军事重镇，黄埔军校建立后，黄埔师生曾频繁利用燕塘营地、操场进行授课、训练和驻扎。1926年3月以后，黄埔军校第5期陆续分批考取入校，初为入伍生，分驻广州燕塘等地。6月5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到军校燕塘校区检阅黄埔军校第5期入伍生部第1、第2团。1936年后，这里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第四分校，成为黄埔军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燕塘为广州城郊军事重镇

燕塘地区自古就是广州城外的军事重镇。早在清朝，因燕塘“地势宽敞”，广州驻防清军就在燕塘划出“旗营官地”，安设营盘驻扎。每年春秋两季，清军在燕塘举行大规模操演。又因该地“前抱高峰，足敷施放大炮”，清军把炮营演练场地也设在这里。每年11月，其炮兵和火枪兵还要在这里操演大炮、火枪1个

月（后“出于保护火炮及节约弹药”的考虑”，改为半月）。

1862年，洋务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丁日昌被清廷派到广东督办火器。抵达广州后，丁日昌发挥自己通晓火器制造的专长，在燕塘亲自设计“监制成功短炸炮36尊、炮弹2000余颗”。第二年，他又在广州燕塘设炮局，仿制西洋大炮及炮弹。

清末爱国将领刘永福也曾在燕塘一带驻军，清政府曾拨款1800两白银，在三两个月内在燕塘为其部署修建营房。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刘永福从燕塘率部出征。

20世纪初，效仿西洋军队装备及训练方法建立起来的新军在广州成立后，大部分部队就驻扎在燕塘，并建立了学兵营。不少新军官兵在此地积极从事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1910年2月11日，同盟会会员、新军军官倪映典等在燕塘发动起义，起义新军从燕塘出发向广州进军。

燕塘还是中国航天的发祥

地之一。1911年2月，“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带两架飞机和制造设备回国，两广总督张鸣岐为冯如在燕塘地区划定飞机制造和飞行场地，冯如便在燕塘建立广东飞行器公司，其为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后来，张鸣岐得知冯如与孙中山多有联系，拒绝了他进行飞行表演的要求。与此同时，比利时飞行家范登堡受安利洋行的邀请，到广州进行飞行表演。4月5日，范登堡在燕塘找到一片开阔的草地进行修整。三天后，范登堡驾驶一架双翼机从这里起飞。这架飞机成为广州天空上的第一架飞机，这片草地亦成为广州历史上的第一个机场。武昌起义爆发后，11月，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冯如与他的飞行助手从燕塘加入革命队伍，并带去他的两架飞机。广东革命军政府由此组成飞机队，为革命增添了新力量。

1912年8月25日，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冯如在燕塘机场

进行飞行表演，向民众宣传革命与航空。当飞机在瘦狗岭上空飞行时，因操纵系统失灵坠落，冯如严重受伤，不幸遇难。

1911年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成立，不久陈炯明任代都督。陈炯明调集新军攻击旧军队和各路民军，又将各路收编为新军。“二次革命”期间，驻燕塘的新军哗变，炮轰都督府，陈炯明仓皇逃走。

龙济光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进入广州后，燕塘驻军被其遣散。此后，入据广州的各军队，继续利用燕塘的设施驻军、训练，并在燕塘开办过一些随军军校，如“李耀汉的肇军讲武堂，林虎的第二军讲武堂，李烈钧的滇军讲武堂，李济深的西江讲武堂，谭延闿的湘军讲武堂，李福林的第五军讲武堂”等，后来进入黄埔军校的教官，有不少在这些军校执教过。

黄埔军校时期的燕塘校区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师生曾频繁利用燕塘营地、操场授课、训练。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同意后，准备组建一支革命武装——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简称“铁甲车队”）。周恩来亲自指导铁甲车队的组建工

作。他从黄埔军校调来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三人，再加上廖乾吾、曹汝谦二人，负责具体的筹建事项。铁甲车队的队员，绝大部分是由中共广东区委从青年工人、农民中挑选出来的。11月底，铁甲车队正式成立，驻防地就在燕塘。

因广大爱国、有志青年积极报考黄埔军校，1926年，入伍生人数剧增，以至黄埔岛校址无法全部容纳。经黄埔军校高层研究，选择燕塘设置为入伍生训练基地，不久即发展成为黄埔军校燕塘校区。1926年9月3日，毛泽东在这里为黄埔军校师生作报告。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率第4军第11、第13师留守广州大本营。后来，第4军的这两个师合称“第8路军”。李济深一面处理黄埔军校的日常事务，一面在燕塘校区办了“广东守备军干部教导队”（后来的第8路军军官教导队、军士教导队）训练班，培训半年结业。不久，李济深又申办第8路军干部学校，校址仍在燕塘。

1927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计划

以广州的黄埔本校作为军校预科教学用地，实施入伍生教育，南京实施正式军官生教育，入伍生在黄埔本校受训期满后再迁移到南京升学。1927年11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1928年3月6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广州的黄埔本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在燕塘设置入伍生部训练第7期军校学生，于是南京和广州两校并存。其间，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未认同李济深在燕塘开办的第8路军总指挥部的干部学校属于“黄埔序列教育”性质，南京方面下令第8路军总指挥部将干部学校取消。第8路军军官教导队、军士教导队“部分优秀生插班进黄埔军校”也未获批准。

1929年初，蒋介石担心广东方面倒向新桂系，将李济深骗到南京后软禁，任命陈济棠为第8路军总指挥。陈济棠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将大批军官和军士编入第8路军军官教导队、军士教导队，集中在燕塘培训，借此乘机培植自己的势力。

同年冬，新桂系军队犯粤，陈济棠将教导队调往前线参战，获得胜利。此后，陈济棠进一步

认识到军事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将教导队扩办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宁粤分裂期间，第8路总指挥部改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陈济棠任总司令，随即与南京分庭抗礼。此时正值黄埔军校第7期学生受教育时，故在第7期毕业后，南京便停办广州黄埔军校。

陈济棠在燕塘开办广东军事政治学校

1931年，陈济棠在原黄埔军校燕塘校区，将原第8路军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扩编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自任校长，“以示延续黄埔广州本校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血脉”。民间为了将其与先前的黄埔军校区别，俗称为“燕塘军校”。

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延续黄埔军校系列校务管理，聘任管理学科与术科教官数百人，主要源自广东第8路军军官教导队、军士教导队的军官，还聘请了广东省政府教育、民政、财政、建设厅的有关科长及各高等学校教授、讲师兼任授课教官，并设法招收了一批黄埔第6期、第7期毕业生担任队长等职。后设立政治部，管理军校党务。为强化对他的“忠诚”，陈济棠经常到校察看或集合全体师生训话，还不

时带着军校官佐到粤军第1师坟场去宣誓，大意是“永远忠于陈总指挥，紧跟陈总指挥走”。

广东军事政治学校设置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预科、军官班、政治深造班、政治班、入伍生队、化育班等，学生完全按照陈济棠所属部队例行军事化管理，新入校学生先进行半年的入伍生训练，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然后分科编入各班进行军事与政治训练。学科内容主要有政治学与军事学，学员只要学习政治学、经济学、国防地理、中外历史、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日语、地方财政、地方自治、地方建设、地方教育、民法、刑法、宪法、语言文学、史记、循吏传、孝经、四书等课程，都由省政府各厅科长或大学教授授课。军事学科主要有步兵操典、战略概论、筑城学、测量学、地形学、战术纲要、野外勤务、战斗射击、兵器学、爆破学、航空学、外军战例等科目。术科训练和黄埔军校基本相同，学生学习典范令等，并开展野外训练。

1931年夏，燕塘军校正式招收第1期学生。1934年7月30日，举行第1期学生毕业典礼，校长陈济棠检阅学生操典并致辞嘉勉。其间，燕塘军校还陆续

招收各种班别(期)学生，以及各期军官训练班、军士训练班等。据统计，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共招收学员3期、军官班8期、政治深造班2期、军事深造班1期、经理班1个队，以及高射炮兵队、战车队、迫击炮兵队训练班各1期。其中，高射炮兵训练班、战车队训练班、迫击炮兵队训练班、特务人员训练班等训练班，这些训练班招收粤系军队中挑选出的士兵进行轮训，没有固定的修业时间，训期3个月或半年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政治深造班和“化育班”。

政治深造班开办的目的是培养广东省各级政治干部，从1932年开始先后举办了两期，学员近1000名，成立一个大队，下设5个中队。该班高级组为第1中队，普通组为第2至5中队(在职的县参议员也调集在这个班轮训)，修业时间两年。政治深造班的日常生活，也完全采用军事管理。在学期间，学员一律不许外宿。星期天放假，早上从学校集队步行到东较场解散，才各自回家，下午6时就要回到学校。因为大部分学员都是有家室的人，对此颇有意见。学习科目以“政治为主，军事为副”。除了平时的学、术科训练之外，入学

一年后，政治深造班还组织学生分组去广东全省各县考察，以一个月为期。

为了拉拢各少数民族，陈济棠还在燕塘军校举办过“化育班”，招收少数民族青年进行为期一年的军政教育培训。据记载，学员到学校后，发给服装，每月发津贴费一元，用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每天早餐吃粥，午晚两餐干饭。周一至周二看一次无声电影。每月允许在星期日或其他假日去广州市区逛街一次。学习内容有关军事、政治、文化、生产技术等课，一般都是上午在课堂上课，下午下地劳动。

从广州分校到第四分校

1936年，陈济棠反蒋失败，蒋介石乘机分裂陈济棠部队，说服了陈济棠的第1军军长余汉谋倒戈，导致陈济棠被迫通电下野，由余汉谋接管该校并自兼校长。1936年秋，燕塘军校被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命名为“中央军官学校广州分校”，行政系统隶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由蒋介石担任。

燕塘军校被接管时，第2期提前一年毕业，新招收的第3期生尚未入学。依照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部要求，燕塘第1期学员学籍比叙为黄埔军校第11

期，第2期学员比叙为黄埔军校第12期。

中央军官学校广州分校设立之初，有各种兵科、学生队、教导队、训练班、各期预科学生大队。因程度不一，于是悉依新制，对此前学生进行甄别，分别编入学生总队及列入入伍生营。燕塘军校原第3期学生作为黄埔军校第12、第13期学生，毕业后有资格投考陆军大学。1936年至1937年间，广州分校招收第14、第15期学生3000多人。1936年冬，第4路军的军官总队共4个大队约1000人，编入该校。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机轰炸广州，广州分校校部迁往白云山，学生总队迁往龙眼洞上、下元岗，军官总队迁往肇庆。12月，由于战事吃紧，分校大部迁往西江上游德庆县，部分迁到罗定县。

1938年1月，广州分校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2月，第14期第7总队在广西桂平成立，分甲、乙两级。9月，第14期甲级生毕业。同年夏，军校招收第15期学生1400多人。10月，广州沦陷，本分校奉命迁移到广西宜山、德胜、东江一带教学，校部设在宜山，其间，学校新组织战地视察团，到各战区

视察实战情况，以备将来重新编辑战术教科书。由于迁校后已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和训练，部分学生前往湖南零陵工兵学校受训。随后，第四分校继续招收第16期、第17期学生。同时，分校还陆续招收过学员总队、军官训练班、特别训练班、军官研究班、重兵器训练班、参谋勤务研究班、军官教育班等训练班。

1939年12月广西昆仑关战役期间，第四分校全体师生受命开赴桂南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完成任务后即回师宜山照常受训。不久，第四分校再迁贵州独山等地，并招收第19期。军校迁往贵州独山后，师生克服重重困难，自己修建校舍，驻地设队部、讲堂、图书馆、宿舍、饭厅、伙房等，学生还开辟了一条校本部铜鼓井至独山县城的公路，命名为“黄埔路”。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学校仍然严格教学。当时，分校课程设置繁多，分军事课和普通课。为了对日作战，军校还特设了日文课程，对日本的政治、军事、社会等进行研究。在独山期间，对学员的考试没有任何放松——每周由本队测验一次，每月由各科教官考试一次，每三个月由总队小考一次，每半年由校本部统一组织大考一次。军校学生毕业

红土圣地黄埔缘

——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办学地江西省瑞金市

□ 谢周逢 方亮

提起江西省瑞金市，大家都知道这里是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地，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而鲜为人知的是，瑞金还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简称黄埔三分校）的办学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中国人民流离失所，大好河山惨遭践踏，中华民族临着一场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中国军队损失惨重，抗日军政人才紧缺。为适应持久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在各战区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分校，授权各战区司令长官在其战区后方择



/ 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学员总队部旧址（瑞金象湖镇上阳巷杨氏宗祠）。

地建立军分校，并以战区番号赋予军分校番号。

考虑到瑞金盛产大米、大

豆、茶油、砂金等，物产丰富；日寇肆虐赣北大地，瑞金属战区后方，社会局势相对安定；瑞

（接前页）

后，被分配至各抗日战场，多在各部队担任排、连级军官。在独山期间，分校开始招收华侨爱国青年，并成立华侨大队，后成为华侨总队（即26总队）。1944年，由于战事日趋紧张，第四分校师生奉命撤往遵义待命，最后选定

湄潭为新校址。

抗战胜利后，第四分校奉令裁撤。学生全部拨归黄埔军校成都本校，凡未完成课程的各大队，分别将炮、工、通信兵科学生转送各专科学校代训。入伍生团未升学学生，也分别参加

第20期学生升学考试，转往志愿兵科学学校继续学习。所有教职员及各总队、入伍生团干部拨编成立军官总队，归中央训练团管训。第四分校的燕塘原校舍划归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第二分校。



金东连福建长汀、南经会昌寻乌而接广东，西面、北面也有公路可达湖南、安徽、浙江等地，交通较为便利。1939年初夏，辖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瑞金成立黄埔军校第三分校。此后黄埔三分校辗转上饶广丰、福建建阳多地办学。1945年11月，黄埔三分校奉命裁撤。6年多时间里，培养学员近6000名。一批批黄埔三分校学子牢记“打倒列强”“以血洒花”的铮铮誓言，刻苦学习、刻苦训练，练就了克敌制胜的本领，展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尚情怀。他们怀揣“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报国之志，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战场，前赴后继，浴血沙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河山，捍卫民族尊严。

多年后，山河巨变，地覆天翻。如今，瑞金人民锐意进取、担当实干，用勤劳和智慧换来了今日的幸福生活，绘就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图景。

山河锦绣 三省通衢

瑞金因“掘地得金，金为瑞”而得名，位于江西省南部，武夷山脉南段西麓，赣江东源，贡水上游，面积约2448平方公

里，丘陵地形占80.35%，森林覆盖率为75.6%，平均海拔162米，年平均气温18.9℃，年平均降雨量1710毫米，不寒不热，不湿不燥，宜人宜物，是千里赣江之源、“中国绿色名县”。

古代，瑞金与周边各县之间只有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运输只能人挑马驮。到1934年和1935年，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为“围剿”留在当地的红军游击队，修筑了瑞金与外界相连的四条公路。受自然条件及当时生产力水平影响，路面狭窄、高低不平，“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据当地老人回忆，从瑞金到赣州开会，要提前一个星期通知，提前三天出发。从瑞金去广昌，短短的140多公里路程，需要在石城停宿一晚。

“要想富、先修路”，穿山越岭、大道通途一直是瑞金人民的心愿。近年来，瑞金人民齐心协力，扎实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公路总里程达3436.92公里，其中国道、省道232.057公里，高速公路95.4公里，农村公路3109.463公里，已形成以2条高速公路（济广高速、厦蓉高速）、4条国道（G319、G206、G323、G236）、2条省道（S541、S453）为干线，

县、乡道路为支线的公路网络体系。依托高速公路和国道，瑞金市已基本形成“二纵二横”交通网，瑞金拥有承东启西、联通南北的“双十字”型的区域性对外战略通道。赣龙铁路完成了扩能改造，纵贯瑞金南北的鹰瑞梅铁路正在建设施工，昌吉赣高铁已经开通，瑞金机场已建成，实现试飞通航。

如今的瑞金，一条条大路内通外连，一座座大桥跨江越河，一个个隧道穿山越岭……，普通国省干道纵横交错、联线成网、通城达乡，呈现出一幅大道通衢畅八方的壮美画卷。

群英荟萃 民风淳朴

万里彩云飞，青山碧水人陶醉。瑞金的自然之美毋庸置疑，其人文之鼎盛更是中外闻名。古今瑞金籍名人有明末“江西五大家”学者之一的杨以任、清初著名诗人杨枝远、清初哲学家罗有高、戊戌变法重要理论家陈炽、民主革命家张鱼书、教育家周邦道。

瑞金的一方沃土走出了将星璀璨，同样养育了千万勤劳智慧的人民，形成了具有瑞金特色的民俗、民风，诠释了客家人重孝悌、讲仁义、重教育、重节俭、讲礼仪的精神内核。

瑞金是纯客家地区，先民自中原而来，传承、保留了许多传统文化，在婚俗方面也要合乎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要求，但在叫法上略有变化。“纳采”这里叫“看亲”或叫“看妹崽子”，中间还有“查家”或称“看婿郎”的环节，所谓“查家”就是到男方家实地调研，看看房子、探探家底。“问名”叫“送庚帖”，将女方的生辰八字交给男方。订婚俗称“签红单”，对应“纳吉”，卜算男女双方的八字是否相合，如相合则把议定彩礼和嫁妆之事，用红纸写好，故谓之“签红单”。哨节，俗称“送果子”“送定”，亦是古礼之“纳征”。男方要在端午、中秋、春节三大节日送礼给女方，就是给岳父岳母送年节礼。迎亲俗称“归门”“归亲”，女方称“出嫁”，古礼为“亲迎”。除以上“六礼”之外，还有“礼赞”“坐性子”“三朝回门”“哭嫁”等习俗。

结炉砌灶，瑞金人称为“打灶头”“作灶头”，称厨房为“灶下”。灶在瑞金人的心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各家各户的灶上设灶君神位、神牌或画像，认为这是关系到一个家庭兴衰福禄的头等大事。因此，在“打灶头”之前，不但要请风

水先生拣日子，还要对灶头的方向严加考究，他们认为“灶门向西，向戌亥方者，主散财；向南方者，主口舌、争斗；向北方者，主病灾……”除了方位之外，还有一些禁忌是不能触碰的，比如灶门不能正对着厨房的大门，那样会招来厄运；如果家里有井，灶门也不能向井，因为水火相克，等等。

瑞金人新居落成，装修完毕、打好灶头后，要择吉时（一般凌晨两三点）举行新老交接的“过火”仪式，仪式中要在老灶膛生火，烧水、爇米、蒸饭，用松明在老灶膛取火种，寓意薪火相传。随后，点松明火的家人领头，挑饭甑和锅碗瓢盆的居中，端食品的随后，还有一人拿装有六只蟑螂的袋子，兴高采烈一起前往新屋。这时，新厅堂的大门敞开，预先安排的家人在门口鸣放一长串爆竹迎接。一家人依次行进新屋，将松明火种点燃新灶膛中的柴火，饭甑安放在厅堂的桌面上，锅碗瓢盆依次安置，袋子里的六只蟑螂在厨房内放生，以示家人与小生灵和谐共处，六六大顺。女主人用干玉米粒爆出一锅白花花香喷喷的米花，寓意蓬蓬勃勃兴旺发达。全家人围坐在厅堂的桌前喝着

烫滚的米酒，品尝着香脆可口的爆米花，并适量地盛些米饭，就着便菜当早点。在欢声笑语中，迎来清晨的曙光。

珍馐美味 独具特色

瑞金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是纯客家聚居区，是一个红色、绿色、古色并存的都市，她的饮食文化吸收了南北方的饮食特色，又积累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饮食精髓，兼顾营养和口味，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让无数外地游客流连忘返。瑞金菜概括来说就是“麻麻搭搭、茕茕嘎嘎、咸咸辣辣”。其中，瑞金牛肉汤、饭包肉圆、红军焖鸭、客家擂茶是瑞金美食的代表。

瑞金牛肉汤是瑞金人招待贵客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以牛肉为主料，注重火功，讲究原汁原味、汤鲜肉嫩，相传起源于南迁的客家人。“五胡乱华”时期，客家人的先祖为了躲避战乱往南方迁移。迁徙他乡的客家人极重仪式，为表达对祖先的尊重会把宝贵的耕牛宰杀用于祭祀，祈求在新的居住地能够平安顺利。而祭祀过后的牛肉就会采用客家菜“余”的做法制成牛肉汤。后来有一位名医游历至瑞金时发现许多村民因天寒得了冻疮得不到有效治疗。这位名医采



/ 瑞金牛肉汤。



/ 红军焖鸭。



/ 瑞金肉丸。



/ 客家擂茶。

用食疗的办法治疗冻疮，在牛肉汤里加了生姜熬煮，村民们喝下后冻疮很快就好了。瑞金牛肉汤的这种做法也流传至今：新鲜牛肉切丁加入红薯粉混合抓匀，水开后将牛肉一点点地放入，加入适量盐、鸡精、花椒粉调味，待牛肉汤汁浓稠时盛出，再根据个人口味添加葱花、芹菜、生姜末、辣椒、酱油等配料，一道美味可口的牛肉汤就做好了。瑞金牛肉汤还承载了客家人支援革命的红色记忆。苏区时期生活条件艰苦，红军平时的伙食主要是糙米、青菜和极少的植物油、盐。瑞金老表犒劳红军最好的营养品就是牛肉汤。因频繁的作战及恶劣的自然环境，疟疾在苏区盛

行，在药品紧缺的情况下，牛肉汤还是当地医生治疗疟疾常开的一味“药方”。因此瑞金牛肉汤被誉为“红军神药”“第一红色小吃”，与南瓜汤并称“红军两汤”。

瑞金肉丸是瑞金传统的特色名菜，有全精肉丸、羹子肉丸、饭包肉丸数种，用料不一，各擅其胜。其中最具地方特色的便是全精肉丸。它以腰板肉（均为猪肉，取其肥而不腻）、鸡蛋、薯粉为主料，将其剁烂搅拌并充分揉搓后，用汤匙间成丸状，放在蒸笼中蒸熟。吃时沾点配有胡椒粉的酱油，味道鲜美。

红军焖鸭因是红军女战士

肖月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妻子）所创而得名，也叫“李德鸭”。方法是鸭肚内塞进甘草、枸杞、党参等10余种滋补中药及生姜、大葱，然后用泥锅将鸭子焖3个小时，焖好的鸭子既有滋补作用又更加香嫩爽口，这道菜经后人不断改进烹调方法和配方，已经成为瑞金最受宾客喜爱的菜肴之一，供不应求。

擂茶是客家人独具风味的食品，在瑞金世代相袭，广泛流传。擂茶是将适量的大米加进芝麻、花生、绿豆、黄豆、茶叶、桔皮等擂制后，熬煮而成。擂茶风味独特，清香、微苦，呈灰绿色，稀糊浑浊，喝时加些香油，十分可口。

瑞金人辛勤劳作后，喝上一碗擂茶顿时神清气爽。擂茶中有部分中草药，能起到解毒、通气、清凉以及开胃、解乏的功效，瑞金不论乡下人还是城里人，男女老少都爱喝擂茶。擂茶不仅可以充饥，又是应时的饮料。农妇们擂好茶，煮熟后满满一盆端上桌来，左邻右舍围坐一起，边喝边聊，喝不完的擂茶，扯不完的家常。

畚乡盛景 未来可期

绿披原野山欢笑，乡村间，

恰是入仙境

畲女靓影姿卓越，凤凰装，
笑靥如桃花

歌声美妙绕山头，对歌台，
只把喉叫破

每逢五月十五日，禾神节，
欢喜把龙舞

红色渊源深长久，安治桥，
揭竿起暴动

这是一首瑞金民谣，民谣中提到畲女、安治就是指的泽覃乡安治村畲族村。泽覃乡是为纪念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而得名。安治村建村于明朝中期，因所在地“庵子前”谐音“安治前”而得名，1987年批准设立安治畲族村。走在村中，溪水潺潺，玉带环腰，草青水绿，鱼游浅底，人来不惊。满眼青翠掩映着白墙、黛瓦、吊脚楼，栋栋畲族民居错落有致。晚风吹过，摇曳着屋檐下的灯笼，激起层层稻浪，风中带来泥土芬芳，也夹着丰收的稻香。夕阳透过山林，给村庄铺满金黄，鸡犬相闻、蛙声一片，能唤起你的乡愁，满足你对桃花源的向往。

畲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散居在东南部闽、浙、赣、粤等境内。畲族自称“山哈”（“哈”畲语意为“客”），图腾盘瓠，有长篇叙事史诗《高皇歌》，



/ 畲族竹竿舞。



/ 泽覃乡安治村。

主要姓氏有盘、蓝、雷、钟四大姓。安治畲族村位于瑞金南部，东与福建长汀县四都镇比邻，处于瑞金通往福建、广东的交通要道上，总户数 253 户，总人口 1150 余人。其中，畲族 118 户、427 人，占全村总户数的 46.6%，总人口的 37%。

淳朴勤劳是安治人融入血液的品性。数百年来，他们祖祖辈辈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只为果腹温饱、繁衍生息。1930 年 4 月 2 日，安治人民发动了“安治暴动”，以武装

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革命的最初尝试，并取得胜利，掀起了瑞金革命斗争的高潮。94 年过去，安治村传承的红色精神滋养了这片土地，也鼓舞着这里的村民自强不息，他们充分运用“红色、绿色、古色、少数民族特色”四色资源，通过改善道路交通环境、发展脐橙产业、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打造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绿色生态的脱贫之路。2019 年 12 月，安治村入选第一批国家森林公园乡村名单。

政策洼地 创业乐土

瑞金多“金”，自然资源丰富，拥有江西省最好的太阳能、风能资源，石灰岩、白云岩、萤石等矿产储量居江西省前列。瑞金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和企业上市“即报即审、审过即发”绿色通道等国家政策，被特别赋予设区市级和部分省一级审批管理权限。瑞金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总面积66平方公里，已建成14平方公里，配建有500千伏、220千伏、110千伏各等次输变电站，建有日处理1.5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和国家西气东输二级分输站，以及200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同时也与昆山经开区、宁波经开区开展“飞地”合作。

瑞金坚持把工业摆到发展的首要位置，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区和海西经济区的协作发展，蓄力打造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优选地。近年来，坚持围绕主导产业“建链、补链、强链”，形成以精工智造为首，纺织服装、绿色食品、文创玩具为重点的“1+3+N”产业体系。精工智造产业以铜精深加工、精细材料、精密装备和能源电子为主，形成铜

基材料和铜系列精密产品、光电照明和显示、装备制造和静音导轨、比例伺服阀等工业母机核心功能部件产品系列，目前精工智造共有57家规模以上企业，2023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240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营收总量的70%。下一步将引进和培育高性能铜基新材料及系列铜产品的精深加工、高精度工业母机功能部件及智能装备制造、新型储能装备及能源电子系列产品等产业优链强链项目，预计2025年实现产值超400亿元。纺织服装产业坚持走集群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路径，已集聚企业200余家，形成以前纺加工、织造染整、品牌鞋服为重点方向的产业细分领域集群，2023年实现规模以上企业营收46亿元。目前正在积极打造首个赣南纺织服装印染数字化共享中心，大力引进高密织、高弹性、高透气和高耐磨面料织造和后端品牌鞋服制造等项目。绿色食品产业依托现有农产品资源优势，已集聚企业80余家，形成以预制菜、山茶油以及旅游休闲食品、代餐食品等为主的产业集群，2023年实现规模以上企业主营收入突破13亿元。目前正在进一步大力引进旅游休闲

食品、功能保健食品、代餐食品和农特产品深加工等产业项目，加速建成江西绿色食品工业重要创新区、全国旅游消费商品主要加工输出地。文创玩具产业形成以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类文创玩具制造产业集群，聚集了30余家企业，2023年实现规模以上企业主营收入12亿元。

斯人已去犹忆影，海棠花开魂依旧。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100年来，黄埔师生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救国救民的历史洪流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在黄埔精神的激励下，国共两党的黄埔革命军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荣辱、民族兴衰和时代变迁紧密相连，在革命、建设、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交往做出了重要贡献。

瑞金作为黄埔军校三分校的办学地，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欢迎海内外黄埔组织、黄埔同学、黄埔亲属寻根问祖、研学探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黄埔精神，深化黄埔情缘，带动更多的海内外同胞共同为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二十一)

□ 熊子杰

第二十一章“古人开荒于前，造福于后”：湘军开辟的台湾三条横贯山路

台湾三条知名横贯山路全都是湘军所开辟的，真是“开荒于前，造福于后”。

近年来台湾旅游的游客超过千万，约400万人来自祖国大陆。当大陆同胞来到台湾风光明媚的屏东海岸、苏花公路、中横公路等地，惊叹壮丽美景时，可曾知道有多少清末湘军为开辟这些古道而牺牲生命；今日游览时，我们后辈是否也应缅怀这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人？台湾人在受惠于前人牺牲生命、徒手开凿出来的古道时，可曾想过这些先民都是来自祖国大陆离乡背井、横渡惊涛骇浪的黑水沟、来台协助沈葆楨开山抚番的湘军。没有他们当时的牺牲，就没有今日的台湾。

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清廷在沈葆楨积极建议下，终于决定建设台湾。依据左宗棠的治台理念，沈葆楨的台湾建设



/ 今日苏花公路。

蓝图，首要的就是开山、开路、抚番。因此决定在台湾开凿北、中、南三条东西向山路，开山的军队主要为湘军，由罗大春、夏献纶、张其光、吴光亮等人主要负责，他们虽非湖南籍将领，但都属左宗棠麾下的湘军成员。罗大春（江西人），原本出身绿林，由于协防杭州时城陷入罪，左宗棠为其开释，纳入湘军。他以提督身份统领十三营，与夏献纶共同负责苏花公路古道开辟。张其光（广东新会

人），为左宗棠麾下总兵，负责台湾南路开路。吴光亮（广东英德人）是左宗棠部下，以南澳镇总兵来台，他负责开辟最长一段265公里的中路。他曾任台湾挂印总兵，与孙开华、袁闻柝共平番乱，后又参与台湾八卦山抗日战役。

清末湘军开路过程千辛万苦。由于少数民族的反对，清军须冒着生命危险开路，许多湘勇因此死在台湾的深山乡野。所以，每开凿完一段山路，各

路将领都会立碑、碣等，纪念这些辛劳付出的湘勇，感谢各路神明的护佑。笔者将相关开山、开路的碑、碣、匾、庙、像、墓等一一整理出来，以缅怀湘军先贤的牺牲付出，并告慰这些湘军在天之灵。碑墓是死的，故事是活的，恩情是永恒不灭的。

中路：“八通关古道”

吴光亮负责开拓中路，自今日南投县竹山经八通关横贯中央山脉而抵达花莲玉里，全长 152.64 公里。这条路俗称“八通关古道”“八童关”或“八通关”（Bantounkoa），都是台湾邹人对台湾最高峰玉山的称呼。吴光亮完成开路后，便以“八通关”命名这条中路道路，取其四通八达之意。

此路于 1875 年正月开凿，同年 11 月完工。吴光亮为纪念此一贯穿中部山脉通道，于古道沿途，勒碣题迹，计有：“开辟鸿荒”石碣、“化及蛮貊”石碣、“万年亨衢”石碣、“山通大海”石碣（已佚）、“圣迹亭”（鹿谷乡新寮段）、“德遍山陬”碑、“过化存神”碑（已佚）、“私人番境撤禁告示”碑等。

凤凰山寺位于今南投县鹿谷乡凤凰村庙口巷 12 号，为吴



/ 吴光亮铜像。

光亮于 1876 年所创建。吴光亮题“佑我开山”匾，如今仍留庙内。吴光亮曾题“万年亨衢”“山通大海”“过化存神”三碣，仅有“万年亨衢”还在，“山通大海”与“过化存神”碣都毁于山洪。“万年亨衢”碣现在凤凰谷内，刻于大石上，“万年亨衢”意谓“道路开通，商旅往来便捷，世代受惠无穷”。“山通大海”碣虽已遗失，1988 年南投县政府复刻“山通大海”于陈有兰溪桥旁巨石上，以缅怀前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凤凰山寺将此二碣的墨宝悬挂寺庙两侧，供信众瞻仰。

“开辟鸿荒”石碣位于南投县集集埔草岭脚浊水溪畔巨石上，字长 35 厘米、高 1 米，行



/ “万年亨衢”碣。



/ “开辟鸿荒”碣。

书横写，现定为一级古迹。巨石上方建有“思源亭”。“开辟鸿荒”石碣无落款，无法确认是否为吴光亮所题。不过根据专

家考证，此碣应是吴光亮所题，因为他是“八通关古道”的开辟者，而他的“万年亨衢”“山通大海”等石碣，也都没有落款，所以此碣也应是他的手笔。

“化及蛮貊”石碣乃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云林抚垦局委员陈世烈所题，该石碣旁之小径，为昔日通往水里之古道。由“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门口延“台16甲省道”往水里方向行驶，一路可达“化及蛮貊”碣的入口，再往乡间小路下行，大约1公里可抵石碣处。“化及蛮貊”石碣在昔日“八通关古道”洞角路边，为记述抚番开垦功绩而设，碣上另有“钦命布政使銜署台澎兵备道陈方伯抚番开垦处”字样，现为一级古迹。

位于花东纵谷中路拔仔庄，今蝴蝶谷入口的“昭忠祠”，为纵谷中路重要地标。开拓中路时，吴光亮、张兆连所率湘军千里迢迢离乡背井来此，历经瘟疫瘴疠、水土不服等，许多病故者均葬于富源附近。在开垦富源拔仔庄及富源小学校舍兴建时，发现许多湘军古墓、遗骸，经善众拾骨聚冢，建庙修祠，起初以“有应公”或“义民庙”称之，台湾光复后改为“昭忠祠”，这些湘军才得有安息之处。“昭忠祠”今是花东纵



/ 花莲昭忠祠。

谷三大忠烈祠之一，如今每逢农历七月中元节，多见当地居民前往祭拜，以感念湘军对拔仔庄开拓的贡献。

南路：“昆仑坳古道”

总兵张其光、同知袁闻柝负责修建“昆仑坳古道”。“昆仑坳古道”兴建最早，为台湾第一条开山抚番道路。当时路经番社之地，频遭少数民族袭击。1875年2月，沈葆楨上奏：“管带福靖、左营游击王开俊等入剿台湾内山狮头社番，遇伏阵亡；守备周占魁、杨举秀，千总杨占魁及勇丁93名随同战歿。”

1875年2月18日，沈葆楨为此再度来台督导战事，3月，以提督唐定奎所率淮军三路进剿狮头社，历经血战，5月终

于使各番社归顺，改其社名为“永平”“永福”“永安”及“永化”。此役清军战歿及瘴疫病亡者近2000名。于是，皇帝敕建凤山昭忠祠，以祀开山殉难之提督王德成、张其光、李常孚，总兵胡国恒，福建候补道田勤生等官兵。1877年，凤山昭忠祠完工。

《台湾文献丛刊》指出，清末开垦南部道路时，许多清军因故逝世，共有清官兵265名合葬于枋寮白军营，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白军营合冢、建祠竣工，春秋由地方官致祭。

北路：苏花古道

“苏花古道”北起苏澳，南至花莲港北岸，长约200里。1874年6月，夏献纶负责从南

澳开始开路，同年7月开至东澳后，罗大春接任续建，从东澳起开辟。同年11月，已开抵花莲港北岸，半年之后便已开通苏花古道，宽约3尺。苏花古道，后来陆续改称为“沿岸理番道路”“东海徒步道”“临海道路”等，今日被称为“苏花公路”。当年“开山抚番”“苏花段”的清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段地势险峻，山路两侧都是悬崖峭壁，修路的人一不小心就坠落悬崖命丧大海。因此，后人为感念这些牺牲者设立纪念碑及庙宇，以告慰英灵。苏花公路“开路英雄世代永生纪念馆”及“开路先锋爷庙”都是为纪念开通苏花古道时殉难的英雄而建。

苏花古道建成至今已130余年，许多路段已荒废，后来台湾当局将三段古道整建为步道，如今日的“苏花古道大南澳越岭段”其中一段就是罗大春等开发之苏花古道。

苏花古道完工后，1874年（同治十三年）10月，罗大春勒石纪念。“罗大春开路纪念碑”现存于苏澳南澳镇晋安宫旁的碑亭内。晋安宫中还有“里程碑”详记苏澳至花莲港的里程，碑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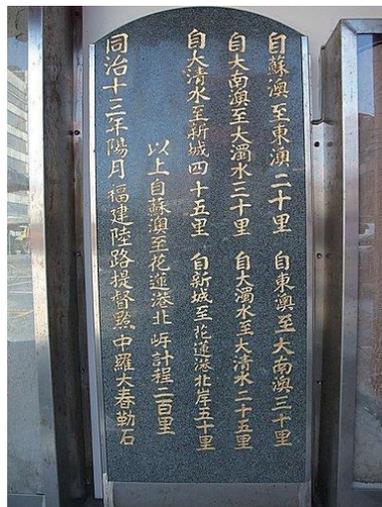


/ 苏花公路开路英雄世代永生纪念碑。

自苏澳至东澳二十里
 自东澳至大南澳三十里
 自大南澳至大浊水三十里
 自大浊水至大清水二十五里
 自大清水至新城四十五里
 自新城至花莲港北岸五十里
 以上自苏澳至花莲港北岸计
 程二百里
 同治十三年阳月福建陆路提
 督黔中罗大春勒石

罗大春开路期间，为提倡东部教育文风，曾捐银500元设立义学，当地乡民感念罗大春义举，特立“罗提督兴学碑”以表纪念。

1965年，有位修行者在苏澳金面山兴建日月宫，整地时发现许多清兵的古墓，后来在日月宫旁建造一座七层高的“忠灵



/ 罗大春开辟道路里程碑记。

塔”，收纳了这些清兵骸骨，并保存一些古墓碑。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这些古墓的主人应大多是来自湖南的湘军。

北路：淡基横断古道

北路的淡基横断古道是



/ 日月宫内湘军墓碑。

1892年（光绪十八年）所建，可说是台湾在清末的最后一条官道或清末最后一条军道。此道是淡水、基隆之间横向的一条古道，在台北阳明山公园范围内。古道上处处留有1884年中法战争中湘军的遗迹，这些被早年闽南音误念为“河南勇”的“湖南军”，不是移防调回祖国大陆，就是客死台湾，即使留下坟墓亦被视为无主坟墓，无人照料。河南营遗址在台北阳明山上擎天岗西侧约600米的鸡心仑附近。

南路：高雄甲仙镇海军墓

镇海军墓位于高雄市甲仙区小林里五里埔58号附近，1886年（光绪十二年），驻防台湾府城（即今台南市）的镇海



/ 日月宫外湘军墓碑。



/ 镇海军墓。

军提督杨金龙、台湾镇总兵章高元，奉巡抚刘铭传之命，率领军队以嘉义大埔为起点，向东开辟经甲仙埔、荖浓、宝来、关山，越八潼关（约今哑口）通抵大陂（今台东池上）的横贯道路（约今南横公路路线）。是年3月，杨金龙、章高元分别率领镇海中军的前营和正副两营等展开拓建工程，在今甲仙区小林里五里埔设置营垒驻防，兼作工寮。后因

夏季炎热，内山瘴气过重，军兵多数水土不服，病死者百余人，后葬于营垒东侧，现存坟墓有85座之多，即为镇海军墓。镇海军墓的墓碑有铭文者不多，仅27座，书写方式各异，且铭文由尖物刻出，简朴有力。由铭文可知这些官兵非同姓之家族兵，且大多来自湖南，多为镇海中军前营之官兵，立碑时间多为1886年5月至9月。📖